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双百」方针拯救了植物学家胡先骕

青年周恩来与「拒约运动」

一九五七年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蒋介石三度拟出兵朝鲜

史官的厄难

2008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总第101期

炎黄春秋

春 秋 笔

- 2 “双百”方针拯救了植物学家胡先骕 薛攀皋
 8 青年周恩来与“拒约运动” 刘武生
 13 1957年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 苏双碧 王宏志
 20 彭总和我军反腐败的“八八”指示 冯 征

陨 星 篇

- 22 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
 ——忆良师益友胡耀邦 牛克伦
 28 徐海东和他生死相守的妻子 崔向华
 31 雇工上将傅秋涛 蒋 杰
 34 人民炮兵开创者朱瑞 高 华

时 代 风

- 37 从东莞腾飞看邓小平理论的无穷威力 林 若
 40 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袁庚 卢 荻

人 海 浪

- 45 文艺界的“老黄牛”陆石 露 菲
 48 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 李秀清
 54 来自无锡的经济学家陈翰笙 邓加荣

遗 闻 录

- 56 蒋介石三度拟出兵朝鲜 张明金

古 镜 台

- 63 史官的厄难 刘 野

文 荟 苑

- 68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 柏能驹

九 州 景

- 72 友谊关谈史 孟凡夏 刘振贵
 76 二百里山川 五千年的书 魏亦霄

群 言 堂

- 26 无名英雄不能任其埋没 甘惜分
 78 说报刊的“图文并茂” 李 庄

编 读 窗

- 79 关于周作人研究的一封信 舒 芜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素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陈 渊

理 事 单 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美术设计\激光照排:

北京瑞和轩盛经济信息咨询中心

紫东图文设计工作室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双百”方针拯救了 植物学家胡先骕

□ 薛攀皋

1955年初，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在他的专著中，批评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这本是生物科学中学术是非问题的评论，却招致一场政治批判，胡先骕被扣上了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名。最后，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才得以摘掉这顶帽子。

胡先骕其人其事

植物学家、教育家胡先骕(1894—1968)，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近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

胡先骕字步曾，祖籍江西省新建县，出生在南昌的一个官宦家庭。他于1909年进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秋通过了江西省留学生考试，次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攻读森林植物学，1916年11月学成归国。他在江西省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期间，对当地的植物资源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察，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调查研究报告。1918年7月，他应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的生物学教授。1921年，该校扩建为农科本科，设六个学系，秉志、胡先骕等在这里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大

学生物学系。

胡先骕提倡“科学救国”。1922年，他同秉志、杨铨(杏佛)倡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秉志任所长，他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胡先骕又同秉志一起受委托负责筹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北京)，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他任植物部主任(后任所长)。1934年，他又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1948年，胡先骕因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先骕在生物科学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教学与科学研究人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大多出于秉志、胡先骕等人的门下。

胡先骕憧憬新中国。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南京，被他拒绝。后来又有人给他送往美国的飞机票，他又以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科学工作者，坚决予以拒绝。他与徐悲鸿、马衡、杨人梗等知名人士冒险参加座谈会并发言，力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以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为重，接受和平改编。新中国成立后，胡先骕把苦心支撑了20多年的民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完好地交给了国家。今天，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植物学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是在原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胡先骕在这里继续从事植物分类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种，创立了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胡先骕教授于1968年7月18日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一生中出版了20多部学术专著，发表研究论文140多篇。他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建立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

政治干预酿造胡先骕事件

胡先骕非常重视编写适合于中国大学生使用的教材。早在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执教时，他就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学》，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各大学主要的生物学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编著出版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1951)、《经济植物学》(1953)和《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等，深受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喜爱与欢迎。

《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是胡先骕应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几位教授的联名要求而编写的，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430页，涉及植物分类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内容翔实，附有164幅精确的插图，深得在校师生和农林干部好评。

《简编》是胡先骕一部纯学术的专著。该书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中，除了介绍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古典分类学的种的概念外，也提到了近来出现的许多“种的新概念”。说明这些新概念分别以生物学某些分支学科或

育种学的成就或方法为基础，总的目的在于使生物的概念，变得更加客观、更有广阔事实为依据，使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种的自然单位，是怎样演化而成的。胡先骕同时也指出这些新概念、新方法，目前都只应用于较少的植物类群的分类上，能否普遍应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胡先骕以高度责任感，还特别提醒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特别是苏联李森科所提出的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新见解。

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其例证是，在外高加索山区的小麦穗中发现黑麦的籽粒，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便会长出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虽然李森科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但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是经斯大林亲自看过、经联共中央批准的，因此，不仅李森科的追随者纷纷发表论文，支持李森科的“新见解”，报道他们发现

黑麦变雀麦、鹅目栎变榛树、橡胶草变无胶蒲公英、向日葵变寄生植物列当……报刊舆论也由于“斯大林、苏共中央不会有错误”的思维定势，不能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任何怀疑。

胡先骕根据1952年底起，苏联植物学界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论战情况，以及他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几十年所积累的丰富的分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明确提出：李森科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实验，方法与水平很低，研究工作不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的新见解必须予以根本否定。

《简编》出版后，胡先骕陆续受到政治批判，首



胡先骕

先是当时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胡先骕的《简编》对苏联进行政治诬蔑。

国内有些支持李森科主义的拥护者或刊物，也开始对胡先骕进行政治批判，认为《简编》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骕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他“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动机是不纯的”。

北京某高校六名讲师、助教联名写信：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建议立即收回已售出的《简编》，公开揭发其政治错误与学术错误，联名信还指责中国科学院允许其研究员胡先骕出版这样“反动”的书，说明中国科学院在学术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

对胡先骕及其《简编》的政治围剿，集中在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由于有关主管部门的授意，在纪念会的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声讨胡先骕所谓的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人民日报》在有关会议的报道与刊发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胡先骕。

纪念会的主题报告认为，胡先骕“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主题报告把胡先骕在《简编》中“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李森科）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的提醒，演绎成胡先骕“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主题报告指出这种错误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号召与会者“注意加以批判”。于是，在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纷纷谴责胡先骕“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

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领导的正确政策”。

“胡先骕事件”的后果，导致《简编》一书未售出的全部被销毁；中国生物学家在一段时间里，再也不敢公开发表不同于苏联李森科的见解或观点。

李森科是推行伪科学的骗子

为了弄清“胡先骕事件”的深远背景，真正记取政治干预学术论争的深刻教训，有必要对李森科的“新见解”及其在苏联的际遇作以下介绍。

李森科(1894~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1929年，他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春化处理技术”和“春化作用”的概念。那时，乌克兰常常发生霜冻，过冬作物大幅度减产。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调李森科来负责。

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的功绩在于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至于这种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弄虚做假。这样，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干预遗传学等学术争论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他必须借助政治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他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他谎称自己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验与推广的过程中，遭受到“阶级敌人”的种种打击，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他危言耸听地说，在春化处理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

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

这时,斯大林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鼓掌,并大声地说:讲得好,李森科同志讲得好!

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初战告捷。对春化处理有异议者不再说话了。尽管在乌克兰 50 多个地点进行了 5 年(1931~1936)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1935 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李森科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为确立自己遗传学的新概念,消灭与自己对立的遗传学派做准备。遗传学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同样被升级为揭露“人民敌人”的斗争。1938 年和 1940 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莫拉洛夫与前任院长、创立栽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和植物免疫性学说的科学泰斗瓦维洛夫被捕入狱(后屈死于萨拉托夫监狱)。李森科 1938 年取代莫拉洛夫成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40 年取代瓦维洛夫,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遗传学界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随着李森科的“新理论”、“新见解”的不断出笼,而重新展开。李森科为了把自己在遗传学上的敌人彻底打倒,进行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精心准备。

李森科深知自己的那一套“理论”难以令人信服,需要拉虎皮当大旗。他看上了毕生培育出了三百多个果树和浆果植物新品种,而深受苏联人民爱戴和尊敬的、已故的果树育种专家米丘林(1855~1935)。米丘林在丰富的育种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写成《工作原理和方法》、《六十年工作总结》等,但他从未说过自己创立过什么学说,或建立过生物学或遗传学的新体系。李森科却自称继承和发展了米丘林学说。李森科还用马列主义的辞句,自然辩证法的术语,包装自己的“新理论”、“新见解”,并美其名曰“米丘林生物学”(笔者注:应该读作李森科主义)。

在组织上,李森科取得科研机构的领导大



胡先骕编著的《植物分类学简编》封面

权后,在他力所能及的关键部门培植和安插亲信,甚至违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增院士必须由原有的院士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规定,暗中向苏联最高当局提出一个增加新院士的名单。1948 年 7 月 28 日,部长会议公布了增加 35 名新院士的法令,李森科的许多拥护者成为院士,院士大会的力量对比,一夜之间向李森科倾斜。

李森科认为,他一统天下的时机成熟,于 194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7 日,召开千多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做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包括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概括为几个方面,做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三千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

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八月会议”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冲击波,是因为李森科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是经斯大林亲自审查修改并由联共中央批准的。莫洛托夫说:“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党指导性影响下进行的。这里,斯大林同志指导性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为科学和实际工作开辟了崭新和宽广的境界。”李森科本人也春风得意地炫耀说:斯大林“直接校阅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个别地方应该怎么讲。斯大林同志关注着八月会议的结果。”

正是由于苏联最高领导人和联共中央政治干预,支持一派,压制并禁止另一派,李森科主义才在苏联风靡一时,成为生物学中不可侵犯的教义。

物极必反。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例如所谓的松树变为云杉,鹅耳枥树干上长出榛树,都是两者嫁接的结果;至于说栽培作物本身产生了自己的杂草(如黑麦产生野黑麦,燕麦产生燕麦草,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也被揭露全无事实根据。而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则坚持“八月会议”的结论,继续压制批评,但由于手中没有真理,“还击”也苍白无力。事态发展到1955年底,三百多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

李森科不甘心失败,伺机东山再起。1958年底,他为了取得赫鲁晓夫的信任,极力支持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他以夸大所谓育成含脂量高的奶牛新品种等骗取赫鲁晓夫的欢心。1958年12月,李森科抓住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

的机会,声称由《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是“西方帝国主义者阴谋”,那些批评他的文章都是“谎言”。李森科借此请求苏共中央予以保护。

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接踵而来的是重现了1948年“八月会议”后的局面,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学院院长。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在苏共中央列举赫鲁晓夫的诸多错误中,支持李森科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李森科也随着彻底垮台了。

胡先骕拒绝作检讨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

在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召开前,1955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中关村,看望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先驱者之一的秉志教授,告以在纪念会上将要批判胡先骕《简编》一书的“错误”。秉志明确表示反对批判胡先骕,并指出要胡先骕作检讨,既无必要,也不现实。秉志对李森科的学术见解,同样持否定态度,他坦率地批评许多人是盲从李森科。

对于胡先骕的批判,中国科学院是奉命行事,无论是副院长竺可桢,还是科学家秉志,都无能为力予以改变。

纪念会开过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稼夫、副院长竺可桢于11月5日,去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83号宿舍看望胡先骕,希望胡先骕写一篇学习米丘林学说的文章,借以承认关于苏联以政治力量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说法欠妥,并批评自己的错误立场。

胡先骕答应写学习心得的文章,但拒绝检讨。他在长达数万字的《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刊于《科学通

报》)一文中,把米丘林同李森科严格地区别开来。他高度赞扬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米丘林以60年漫长的时间从事改良果树品种,培育出了百多个优良果树品种,这便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与工作基础。他的工作方法 with 理论,都是生物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而学习,应该学米丘林的原著,“尤其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着重点是胡先骕亲自加上的)。胡先骕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出李森科的名字,但明确地表达了他反对李森科主义、反对伪科学的初衷不改。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胡先骕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本色,讲真话,坚持真理不低头。

“双百”方针救了胡先骕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双百方针酝酿的过程中,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言,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对当年发动批判胡先骕一事进行反思。

陆定一说:那个时候就是着重政治问题,因为胡先骕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这时,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回答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说: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还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这是一个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出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所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

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陆定一接着说: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参见《陆定一文集》第494-495页,“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但是,周恩来认为,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应该向胡先骕承认错误。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

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骕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百年恩来》,第1222~1223页)。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骕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骕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做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骕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胡先骕教授的冤案,才得以较快地平反,才得以推倒强加给他的政治罪名和不实之辞。他是有幸的。

一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名存实亡,许多善良的人们,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责任编辑 洛松)

青年周恩来与“拒约运动”

□ 刘武生

191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打着防德奥为名，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使中国军队充当反对苏联的附庸军，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地位。日本政府的侵略图谋，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首先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抗，随后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相继奋起抗争。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群众运动，史称“拒约运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拒约运动”，是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前奏。当时，周恩来正在日本留学，准备报考高等学校。但他仍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拒约运动”中，成为“拒约运动”的实际发起人之一。所以，无论是研究“拒约运动”，还是研究青年时代的周恩来，都不能不研究周恩来留学日本的这段历史。

令人庆幸的是，周恩来1918年留学日本期间的日记，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已选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南开大学编辑、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日记真实、系统地记录了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的活动，成为研究“拒约运动”和“拒约运动”中的周恩来的珍贵文献。

周恩来的这本旅日日记，起于1918年1月1日，止于12月23日。1920年秋，周恩来赴欧洲留学前，把这本日记和在南开学校的作文等装进一个柳条箱，委托他的同学××代为保管。天津解放后，这位同学的儿子把这个柳条箱送交天津市委，后转送中央办公厅。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大姐将《旅日日记》送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从周恩来留下的1918年的旅日日记看，3

月25日中日两国关于谈判和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互换公文，4月3日他就得知消息，并在日记中感慨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拒约运动”高潮时期，周恩来在5月2日至6月6日的日记中，除5月6日、8日、24日、25日和28日五天外，逐日记载有关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开展拒约的动态，以及他的感想和评论等。尽管这些日记记述的内容很简略，但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恩来对“拒约运动”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

“国事益坏矣”，密切关注留日罢学拒约的事态进展

周恩来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密切关照着事态进展。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七钟（指下午7时——引者注）往青年会学会话，课毕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里所说的“国事”，即指中日两国秘密谈判和签订军事协定的事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还记述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日学生首先发难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的情形。他写道：“近一、二日内，因中日新约行将成立，此间留学生有全体归国之议论。一高生殷汝潮首先发难，一高同窗会开会赞成之，举代表八人，四处游说，发布传单，征集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意见。”

周恩来在此后几天的日记里，连续记述了各省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情况。

5月3日日记：“晚至青年会上课，闻留日学生发起全体回国事。”“一高同窗会今日实行，宣布归国主张，办法未议。戍域学一高，发难中，有破指血书者。”

5月4日日记：“今日各省同乡将以开会，议

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事。下午三数省（留日学生）表决归国。”“吉林同乡会首先于今日下午开会，表示赞成归国。奉天省继之。晚间亦有数省（留日学生）表决赞成，闻为黑龙江等省。今晚总会集各省会长及评议员开解总会会议。”

5月5日日记：“直隶、河南、江苏、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山东、陕西等省（留日学生）均表赞成归国。”

5月7日日记：“早大昨日议决，停课归国。”“昨日议决回国者有广东、浙江等省（留日学生），至今日各省（留日学生）都全体表决矣。”

留日学生议决罢学归国后，从5月7日救国团先头队开始启程，随后分期分批陆续回国。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一些他送别同学回国和先头队催促全体归国的记载。例如，5月7日日记：“午间见希天等。下午送之至横滨。”5月9日日记：“（午后）三钟与轮扉至车站送涤非。”“刘钧（江西人）发布《回国应取方针》七条。”“江苏先头队有宣言书。”5月10日日记：“先头队六百余人发宣言书，促全体归国。”5月11日日记：“至本乡送涤愆。下午送蓬兄并及他友。”

从上述日记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的认识，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殷切地关注着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反对密约的事态进展，显然是他深感“国事益坏矣”。而他如此深切地关心国家大事，正是他爱国心诚、救国心切的具体体现。

“祖国危殆”，参与拟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

周恩来在5月5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外间议论益歧。余因蓬、涤、希三兄为返归主干人物，故今日首见涤愆与代议办法多条。”这则重要的日记，可说明三个事实：一是，张蓬仙、吴涤愆、王希天是主张罢学归国、以示拒约的主要骨干人物；二是，周恩来曾与“拒约运动”“主干人物”之一的吴涤愆一起，代为议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三是，其实周恩来也是一位“拒约运动”的“主干人物”。

在这天的日记中，周恩来还全文记录了这个救国团“组织方法”，除导语外，共有14条。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周恩来还写道：“五日

晚，各省同乡会、同窗会各干事或代表，聚议于一高聚（俱）乐部。”据此分析，很有可能，《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是在这个会议上议决的。对此《民国日报》5月13日的报道可作为旁证，报道说：“五日夜，集会于中华留日一高俱乐部，表决归国方针，联络全国，一致对外，并不干预内政。暂由留日学生组织团体于东京，定名曰‘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救亡团’，俟抵国土，共张反对之声，以为政府后援。”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组织救国团的目的、宗旨、方针和办法等，是“拒约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也是研究“拒约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我们在研究“拒约运动”的历史时，对于周恩来代为议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并在他的日记中全文记录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予以高度重视。周恩来胸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心壮志，1917年9月由天津登轮船赴日本，10月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京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其间，和王希天等交往频繁，经常互相访谈、通信。据周恩来旅日日记记载，王希天还两次资助周恩来。保存至今的一张周恩来和王希天等七位留日学生合影，反映了他们友好相处的形象。

周恩来由于始终关注并积极参与有关“拒约”活动而崭露头角，引起“拒约运动”“主干人物”的青睐。他们委托周恩来与吴涤愆代为议定



周恩来（右一）、王希天（右二）与留日学生在一起

救国团“组织方法”，便不奇怪了。

“竟不以有国者待吾人”，揭露日本政府迫害我留日学生

从留日学生酝酿罢学归国，反对密约开始，日本政府就派出警察，严密监视，极力破坏，以至殴打和拘捕我留日学生。对此周恩来旅日日记中虽记载简略，如5月7日日记中写道：“昨日各省同窗会干事代表聚议于维新号，假宴会为名，选举归国总机关干事。事毕，被日警拘去，旋释。”但查检当时《民国日报》，不仅印证了这则日记的记载，且有较详的说明，如该报5月18日发表的《留日学生被捕真相》中说：

“（日本政府当局）竟不以有国者待吾人。剥夺我集会、言论等自由权，明科暗察，百计防堵，如有违者，立行逮捕。凡此已不下十余次矣，莫不为之裂眦发指。其最大之耻辱，尤以5月6日为最。……忽来日警数十人，负枪携索，形同赴敌，未及入门，而叫骂呼吼之声震撼天地……语未竟，而拳足已交相加矣。吾人因慑于四川留学生之覆辙，亦只得含羞忍痛，以待最后之解决。于是，有以绳捆绑者，有负重伤不能行走者。……盖此次被捕者计三十三人。同胞，同胞：吾人肉体之痛苦不足道，而精神上之痛苦诚难于以笔墨形容也。”

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用造谣诬陷、封锁消息以至挑拨分化等手段。周恩来在5月11日、12日、14日的日记中，便着重记叙了日本政府阴谋软化私立学校的留日学生，挑拨公立和私立学校留日学生关系的事情。

“伤心国事、友难”，关心留日学生归国后的抗争

对于留日学生归国后开展“拒约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密切关注着，真可谓身在日本，心系祖国。例如：

5月10日日记：“往北京先发队寄血书于此间同人。”

5月12日日记：“奉天先发队今早来电，告已抵奉天，促未归国（者）速归。”

5月21日日记：“救国团调查各省归国人数，至月底云可达三千。”

5月22日日记：“救国（团）催留东全体速回。”

5月23日日记：“贵州同乡会催各（本）省同乡速归。”

5月26日日记：“留日学生救国团自上海来信，促此间学生速归，并示在国内所发传单。”

5月29日日记：“晚间独坐斗室，伤心国事、友难，颇不乐，乃至坊间购《留东外史》读之。”

5月31日日记：“上海救国团寄来日刊两份，宣布于青年会。”“广东干事来信，告在香港立招待所。”“浙江同乡会来信，劝同乡速归，干部通信处在上海已成立。”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自王希天等回国后，周恩来同他们遥相呼应，互相配合，据周恩来旅日日记中记载，从1918年5月9日至10月21日，周恩来致信王希天、张蓬仙、吴淦愆25封，接他们来信18封。其中，周恩来致王希天信5封，接王希天信5封。不无遗憾的是，日记没有展开记述他们之间彼此通信的具体内容。但是，由于他们互通音信期间正是王希天等在国内如火如荼开展拒约抗争的时期。可以想见，通报拒约抗争情况，探讨拒约抗争方略，无疑是这些往来通信的主要内容。

“义愤所驱，不忍坐视”，揭露段祺瑞政府压制学生罪行

段祺瑞政府当局对待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既痛恨又害怕，于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并以硬的一手为主，无所不用其极。留日学生既不吃软，也不怕硬，坚持反对签订卖国苛约。这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四次记载和揭露。

5月9日日记：“今日留学生监督集各省同乡会会长、各同窗会会长议阻止全体学生归国，聚讼纷纭，不得要领。监督先退匿，不复出，众乃假其地议联合救国团的事。”

5月11日日记：“诛奸团宣布，段政府以二十万买通留学生，阻止全体归国事。”

5月13日日记：“留日学生监督于前日发布教育部训令，电文语多模棱，无恳切意。”

5月23日日记：“监督处发布教育部来电，嘱学生不得轻举妄动。”

对照周恩来日记，查阅当时国内新闻媒体披露的材料，对于政府当局阻挠、压制留日学生的行径，留日学生为“拒约”而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便有更多的了解了。例如：《民国日报》5月9日报道：松沪警察厅训令各署、所、队，“反对中日密约者，一体防范、查拿。”5月15日报道：驻日公使章宗祥诬蔑“归国学生为受党人煽动”，段祺瑞政府分别致电各省，“嘱严密注意”。5月17日又报道：驳斥章宗祥的诬蔑不实之词，旅沪归国留日学生曾致电教育部称：“生等此次全体归国，纯系爱国至性、义愤所驱，不忍坐视，反对苛酷条件(约)外不知有他。”

再如，据5月27日、28日《民国日报》报道：政府当局为阻挠、压制、诬陷留日学生，教育部总长傅增湘“严令留日学生以六月十日为限，一律照常回校，倘届期不回者，则取消其官费。”教育部还行文警察总监吴炳湘，“希警厅严密监视，并勒令其即行离京。”更有甚者，警察总监吴炳湘收阅行文后，竟发出以武力镇压相威胁的通告：“勒令归国学生速返日本，否则递解回籍，并查除官费。”

政府当局在使用硬的一手的同时，也没忘记使用软的一手。例如，为利诱留日学生，段祺瑞“已飭拨五万元交教育部，令其酌量分给各归国学生，以为东渡回校资斧。”段祺瑞还赞同“抚慰”之说，“已由国务院电章宗祥申饬，外交部亦电章公使，令向日政府设法交涉，改良对留日学生之待遇”等。段祺瑞政府企图以这种怀柔之策来阻止这场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当然也只能是枉费心机，不能得逞。

“大堪研究”，《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极不平等

5月16日，《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后，国内有些报纸登载了协定的全文。周恩来在5月23日日记中不仅记载了此事，而且抄录了这个协定的全部条文，并对其中一些条文作了批注。

笔者将周恩来日记中抄录的这个协定条

文，同收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中日条约全辑》中的这个协定的汉文文本和收入《日支条约》中的这个协定的日文文本对照，发现两个个别文字有出入，没有内容实质上的不同。

周恩来在这则日记中怀疑“协定”的真实性，说“大约是政府中有人主使拿这个骗骗国人的”，现在看来尽管不确，但周恩来对抄录的协定某些条文所作批注可说是一语中的、击中要害的。他对协定第七条批注：“此条大堪研究。”因为，从文字上看，尽管第七条中用了许多“彼此共谋”、“临时协定”、“互相供给”、“互相交换”，看似平等的字眼，实际内容是极不平等的。据此规定，日本政府打着“共同防敌”的幌子，唾手攫取了在中国境内的特权，获得了对中国陆、海军的指挥权，并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铁路交通运输、电信、地图和情报等。显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领土和资源的公然侵略和掠夺。

“愤慨乃就义”，高度赞扬彭翼仲蹈海精神

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多次记载了极少数留日学生中的败类破坏罢学归国、阻挠“拒约运动”的事，虽多为简略提及，但字里行间，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周恩来对于少数败类的憎恶和警惕。

对于与敌人势不两立的爱国志士，周恩来则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给以讴歌。他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月二日，由烟台出港之船，有国人彭翼仲蹈海而死，其绝命诗云：‘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再贪生。’彭君于洪宪帝制时几被诬，此次愤慨乃就义，不顾身家，忿然长逝矣！”

周恩来在这里赞扬的彭翼仲，曾任《京华日报》总理，是北京报界知名人士，旅居京、津间。当他得知《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即将签字，无可挽回时，不胜悲愤，遂于5月2日乘轮船航行至烟台，毅然蹈海，时年55岁。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前数年在三庆园为女学筹款演说，曾有亡国为奴不如投大海等语，不料已成谶语。中日密约成，则奴隶、牛马无不惟命是听矣！二千万之贿赂如此其甚耶。良心痛苦，愈激愈烈，除死无第二置身之道也。”

所幸的是，据报道，彭翼仲英勇殉国未遂。当他投海时，为同船人所瞥见，幸得遇救。惟他死志仍坚，由于同船人看管甚严，不得如愿以偿。他的家属于5月8日接信后，即由他的次子彭凤威赴烟台迎归。

“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在“拒约运动”中参加“新中学会”

周恩来在5月19日日记中记载了他加入新中学会的情形：“早起至冠贤处，入其新中团体。冠贤介绍的，八钟开会，至者有十数人，十钟事毕，留其处午餐。”在这则日记中，他还写道：“我今天在新中会发表我的人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他又说：“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后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思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周恩来在加入新中学会时的这篇讲话，围绕一个‘新’字，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学术传统，并同日本、欧美的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

新中学会这个留日学生爱国进步组织，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集体学习和集体生活。他们在早稻田租赁一处会址，起名“新中寄庐”。每星期日举行学习座谈会，有时讨论国家大事，有时畅谈个人学习心得。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后，按期参加活动。

周恩来在“拒约运动”中加入新中学会这件事，也是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笔者补记：回答编者的两个问题

编者在编辑本文过程中，曾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周恩来既然积极投入“拒约运动”，为何没有罢学归国呢？笔者认为，从周恩来旅日日记看，周恩来虽坚决支持“拒约”，但对留日学生

全体一致罢学归国，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在5月4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各省同乡将以开会，议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事。下午，三数省表决归国。余于斯事持消极反对主义，闭口不言。”这则日记说明，他对全体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确有不同看法，不过，他从大局着想，并不反对，而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在5月7日日记中，他还写道：“今早访冠贤，与论不归国真正之方针及反对派自处之地位。”这则日记进一步说明，周恩来对待罢学归国的事情是很认真的。日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不归国真正之方针”和“自处之地位”的内容，但是从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是决心积极主动投入“拒约运动”的。周恩来积极主动投入“拒约运动”而又未罢学归国，还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一，当时周恩来正在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严格说来，他还没有正式入学，可谓无学可罢。二，提出留日学生全体一致罢学归国这样激进的口号，从宣传动员上讲，是可以的，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则留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就地抗争，国内外互相配合，也是需要的。三，留日学生是否拥护和参加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不能以是否罢学归国为唯一标准。主要是看他思想上是否真正拥护和行动上是否真正投入“拒约运动”。

二是编者还提出：“拒约运动”的结局是怎样的？据笔者了解，“拒约运动”没有取得直接的结果。段祺瑞政府既没有拒绝签约，也没有向国人正式公布条约内容，而由中日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了条约，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实行，日本政府在我国东北境内派驻了一些军队，直到1921年1月两国政府才宣布取消条约。许多参加“拒约运动”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后来陆续返回日本复学。尽管如此，“拒约运动”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翌年兴起的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拒约运动”的意义在于：播撒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火种，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拒约运动”中成立了一些进步社团，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在“拒约运动”中涌现出一批骨干分子，为五四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中坚力量。

（责任编辑 洛松）

1957年 邓拓为什么“按兵不动”

□ 苏双碧 王宏志

邓拓一直在观望

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全国上下在积极贯彻。正在这时，以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及其部下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为代表，表现了一部分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忧虑。1957年1月7日，邓拓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具体地却认为提倡“双百”方针后，“有一些文艺刊物上的一些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一、在过去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二、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三、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不长，全文才两千字，但由于他们对“双百”方针的忧虑，心情急迫，虽然不成熟，也还来不及作深入的理论探讨，“就把问题提出来，抛砖引玉。”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几乎未作任何反应，当时，邓拓怎么想的，现在不得而知。有的论者说邓拓是不知道怎样宣传，不明白怎么“鸣”、怎么“放”，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关键的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知道怎样宣传。邓拓当时确实处于两难境地，他必须观察一段时间。这是因为：

其一，陈其通的文章发表后，一月下旬毛泽东让印发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见黎之：《回忆与思考》，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期）这里明显地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意见是不对的。但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谈话并不止这一次。他在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但在1月21日，毛泽东又说：“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



邓拓

是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细考究，这两个讲话的基调是不一致的。前一次讲话，强调“放”，毒草也可以放；后一个讲话则强调不能让毒草泛滥，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要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把“香花”和“毒草”作政治概念使用，在实际工作中又如何去区分呢？包括陈其通批评过的一些问题，即不主张让“放”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毒草”呢？作为宣传工作者，是很难处理好的。这大约是邓拓不敢轻易“放”的原因之一。

其二，“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影响有关系。党的八大对苏共二十大作了公开的积极的评价。但是，毛泽东本人的实际看法并不一样，他对苏共二十大的批评可能更多些。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出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

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随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18日的讲话中又说：“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又说：“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对这些人他出自内心的反感，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接着，毛泽东痛斥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即：党内对苏共二十大不满意是正常的，满意是不正常的。由此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对于作为苏共二十大的积极后果之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究竟应该怎样看，怎样贯彻？尽管，毛泽东在1月27日的讲话中，他说他反对“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他不赞成“横直是压”。他主张“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问题”。并说这些矛盾大量是内部的，从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很快使人们感觉到，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造成的国际反共思潮，也反对国内附和“二十大”思潮的动摇分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拓在《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上，没有把抓“百家争鸣”，更没有把“放”放在主要地位，便不难理解了。

邓拓在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他静观事态发展。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说：“《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指陈其通等四人——引者）？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3月1日，从读者来信中找出陈辽写的《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发表。陈辽文章批评陈其通等人对贯彻

“双百”方针以后的文艺工作，“作了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估计”。在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之后，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缺乏说服力，“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并说：“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没有把艺术事业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因素两者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去年六月以来的‘百花’中放出了‘莠草’或‘毒草’，‘百家争鸣’，出了怪论、糊涂论，就不加分析地说，‘文学艺术的斗争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是不合事实的。”

4月4日，《人民日报》又集中发表了一组读者来信和各报刊的反映，对陈其通等人的观点进行逐条评驳。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认为，提出“双百”方针以来，“时间虽然还很短，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效果是好的”。说“有些人对于这个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社论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指责陈其通等人对文艺界情况的估计是“一种极端的歪曲”。

凭心而论，在正常情况下，一篇带有错误倾向的文章，经过权威人士的批评、读者的评论，以至党中央机关报刊发社论，其被重视程度也算可以了。但是，由于邓拓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相悖，就难免不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批评，因为毛泽东想写一篇大文章，即用‘放’的方法来领导中国，他在3月12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

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76页）其实，所谓“放”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让大家提意见的方法。可惜，这个方法在党内党外认识并不一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叫好，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易难，以及可能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是不会估计到的。而一些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的人，不习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新的方法，再加上染上一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就往往抱不赞成的情绪，如陈其通等人基本上是这个思路。还有一种人，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观察问题比较透彻的，他们总担心毛主席的设想不能顺利实现，中间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加上实际上毛泽东是在立足于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自由化的同时，来提倡“双百”方针的。“香花”和“毒草”难以分辨，政策的执行者便不得不考虑“鸣”和“放”可能出现的历史结局。从邓拓的思想体系看，对于“双百”方针他是出自内心赞成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看问题高瞻远瞩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不可能不想到如果“鸣”、“放”超出毛泽东设想的框框，“双百”方针受挫，又会出现何种后果。这大概便是邓拓当时行动迟缓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说：邓拓是 “书生办报”、“死人办报”

继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两次批评《人民日报》之后，1957年4月10日，又当面对总编辑邓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也曾参加毛泽东召见的王若水后来写的题为《文章满纸书生累》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追记。

1957年4月10日中午，邓拓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和《人民日报》全体编委以及王若水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去。王若水不是编委，是当天那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的起草者。胡乔木、邓拓、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林淡秋、王若水一行驱车来到中南

海毛泽东住处。当时毛泽东穿着睡衣，靠在床上，盖着毛巾被。见面时邓拓把编委会成员和王若水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随后陈伯达、周扬以及袁水拍也来了。

毛泽东见大家已坐定，就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的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个旗帜……”邓拓汇报工作时，一开始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词尖锐的话打断：“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向毛主席说明：“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反驳道：“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毛泽东非常刻薄地继续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

房间里气氛很紧张，毛泽东显得很恼怒，他对几位副总编辑说：“你们真怪。难道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反对他。我看你（指邓拓）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这段话的份量很重，特别是从邓拓扯到汉元帝，简直不可思议。邓拓听了之后，认为是提出辞职的时候了，于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

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要求。”毛泽东斥责邓拓：“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面对这种劈头盖脑的批评，邓拓实在很难有申辩之力，或许他根本不想作任何解释。倒是胡乔木说了几句，他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看来，所谓“计划”和“组来几篇文章”，也不过是搪塞之词。不过，乔木是代表中央管《人民日报》工作的，如果主席对《人民日报》有意见，首先应该找胡乔木，了解情况再找邓拓。但主席听了胡乔木的解释，却不作任何表示。

随后，毛泽东又谈了“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十八处在中间状态；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又说：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们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让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毛泽东又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方面。

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也缺乏他所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作风。例如指责他对陈其通文章反映慢是“这里有鬼”。要《人民日报》的人起来“革邓拓的命”。说邓拓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为邓拓有这么大的火呢？除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因素外，邓拓在历史上是否有使毛泽东特别反感之处呢？

邓拓原是晋察冀边区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没有去过延安。他在《晋察冀日报》任总编时，曾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有功于党、有功于毛泽东的。

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时邓拓才见到

毛泽东。当时，彭真曾经找过邓拓，要邓拓去给毛泽东当秘书，邓拓几乎没有多考虑就谢绝了，他说：“我长期搞报纸工作，做点实际工作较顺手，当秘书恐怕不合适。”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后来说，邓拓回家后曾对她讲过不愿当主席秘书的事，甚至说了“伴君如伴虎”的话，但邓拓此种心态，毛主席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一定成为二人之间的芥蒂。

倒是邓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反冒进”社论，使毛泽东很不高兴。事情的起因是，周恩来在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报告，提出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否则就很危险。据此写的这篇社论由中宣部起草，经邓拓修改后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阅并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这个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态度。于是邓拓特地在定稿大样写上：“全文明(二十)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不过，这篇被低调处理了的社论，实在是一篇很有针对性的好文章。正如社论指出的：“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又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并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的落脚点在反冒进上：“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那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大简单”。这篇文章在指导当时现实

工作上起过很好的作用的。但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却一直耿耿于怀，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以及后来关于《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中，对这篇社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篇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这是魏忠贤的笔法，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买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据说，他在批评《人民日报》时还说：“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文章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见顾行、成美著《邓拓传》)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样一篇目的是为了纠正偏差指导全局的文章，没有周恩来、刘少奇的指导、甚至直接操作，是不可能出台的。为社论的事，又不便与周恩来、刘少奇直接冲突，而首先迁怒于发表此文的邓拓，就不难理解了。

邓拓说：看来“按兵不动”还是对的

邓拓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报纸当然要有一些动作。1957年4月10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许多篇社论。据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考证，从4月10日到4月26日共发表了六篇社论，“这一组社论，显然是为了向公众广为宣传新方针推动鸣放而发的，它们都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为立论的依据，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录稿中摘抄下来。”朱正考证的目的，是想说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原始讲话和后来正式发表的并不完全一样，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摘用了两个讲话的原始记录，恰好保存了原来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及它的原始面貌。而我想说的，是邓拓一方面积极推出了几篇社论，宣传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鸣”和“放”，但出于十分谨慎，每篇社论一个中心，文字基本上都是用

毛泽东的两个讲话组成的，这样宣传既不失毛泽东原意，又不会给日后留下工作失误的口实。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其他版面，并没有太突出的“鸣”和“放”。尽管毛泽东在批评邓拓那次会上，还给报纸办得好坏排了一个次序，即：《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表示对《人民日报》的不满，邓拓却似乎不太介意。在1957年的春夏之间，他的思想和精力不可能太多的花在版面的活跃上，而是必须及时适应毛泽东不断变化着的思路。

在邓拓受到严厉批评的前一个月，即3月10日，毛泽东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赞赏。他高兴地对徐铸成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这使徐铸成的“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这是徐铸成的回忆。毛泽东还对徐铸成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吗。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片面性较少。”（见《新华文摘》1989第二期，徐铸成文）

毛泽东当时似乎确曾想用“放”的办法来治理中国，他对《文汇报》的赞扬，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致的。他讲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在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啰，而是小民主啰。有一个小字不够，再加上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这一席话激发了会场的阵阵欢笑声，因人们预感到对知识分子不再搞大批判了，而是在和风细雨中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毛泽东在谈到党内要整

风时说：“现在共产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几个东西还相当严重。”他要求“党外朋友帮助”。并说：“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不愿意就不参加。”

毛泽东为了贯彻他的“放”的方针，在组织上也采取了措施。4月1日，《光明日报》改组，由储安平取代党员常芝青任总编辑。储由社长章伯钧陪同，走马上任。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入新的工作，发出一百多封征稿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毫无疑问，他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事实上，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先后到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去讲他的新方针，宣传他的以“放”来治理国家的策略。

4月19日，徐铸成被任命为《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于是，《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在两位老报人徐铸成和储安平的主持下，办得生机勃勃，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富有办报经验和政治经验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除了发表一些大多是毛泽东的话的社论外，却不愿意如同《光明日报》、《文汇报》搞大鸣大放，搞得那么热闹。在当时的气氛下，报社有些人要求《人民日报》如同《光明日报》、《文汇报》一样，搞“大鸣大放”。邓拓断然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见《邓拓传》）尽管邓拓受到严厉的斥责，他还是按照他的原则办事。诚然，他是看到了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对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捉摸不透，他才不敢贸然行事。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指示，标题是《整风运动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强调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又说：“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

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非常诚恳地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决心。

5月8日以后，中央统战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人民日报》从8日起开始摘登座谈会的内容。一个星期后，即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是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消灭它’。”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篇文章不仅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并且基本上有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

为贯彻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这时候邓拓的总编辑位子正在过渡到由吴冷西取代。据吴冷西回忆：6月7日，毛泽东找吴谈话，决定派吴到《人民日报》工作，理由是：“《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并说让吴冷西兼新华社社长。6月13日，毛泽东让吴冷西立即到《人民日报》去，并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

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

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见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见《新闻战线》1988年第45期）

这段话的指向不太明确，吴冷西到《人民日报》工作，可能“遇到最坏的情况”，这是指什么，也不太清楚，甚至可能出现“五不怕”的指向。当然，毛泽东的用意绝不会是故作危言耸听的。随后不久，正式宣布，邓拓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任总编辑，邓拓实际上已无实权。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已不由邓拓领导。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在新闻界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曾经受到毛泽东赞扬过的《文汇报》、《光明日报》，它们的社长、总编辑徐铸成、章伯钧、储安平统统被划成右派，而被毛泽东痛斥过的邓拓，虽然某些权力被剥夺，却没有蒙受太大的灾难。这当然和邓拓敏锐的政治嗅觉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曾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邓拓庆幸的当然不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被打成右派，而是他判断正确，且忍辱负重，避免了更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被划右派的劫难。

（责任编辑 洛松）



《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右1）在1957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小组会作检讨。徐铸成后被划为右派

彭总和我军反腐败的 “八八”指示

□ 冯 征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教训特别值得注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和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讨论过朝代兴衰的周期率问题；新中国建立前夕，毛主席把中共中央迁往北平，比喻成“进京赶考”。目的都是告诫我们，继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力戒骄傲自满，防止因腐败而覆亡。在反腐防变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也的确曾创造出一些经验。建国初期，除了著名的“三反”运动之外，1954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布反腐防变“八八”指示的过程及其成果，也可以算作经验的一例。

50年代初，我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参与了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调查研究和文件的起草。这个文件是经党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毛泽东主席于1954年8月8日签发的。这就是在全军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八八”指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表扬军委及总政治部的这个文件，认为它抓住了当时党和军队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份文件出台的历史背景是：全国胜利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发出要防止糖衣炮弹袭击的警告，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学李自成”。建国之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毛主席又从全党全国大局出发，亲自批准枪毙了历史上有过功劳、但已腐化堕落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批判了党内滋长的追求享乐腐化、不求进取的情绪，号召全党在新长征中务必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转入和平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随着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高级干部中一些人居功骄傲、忘乎所以的情绪有所滋长，追求享乐一时成为风气。七届四中全会揭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面对这个风气，如果听之任之，不认真加以解决，我们的党就难以正确认识和吸取郭沫若在抗战胜利前夕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提出的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也就难以避免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代封建王朝盛衰成败的“周期率”。

“八八”指示的酝酿、起草和发出，前后经历了将近一年时间。1953年7月，彭德怀在朝鲜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发现志愿军某些高级干部有居功骄傲、追求享乐腐化的迹象，曾严肃地进行了批评。但也听到一些同志反映，这股风是从北京刮来的。说中南海组织舞会，选舞伴都要长得漂亮的。人所共知，彭德怀同志勇挑千钧重担，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败了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侵略军为主体的所谓联合国军。彭总在朝鲜前线，响应中央反腐防变号召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三反”运动开始，彭总动员党小组同志对他批评监督。他听取警卫员建议，带头戒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当有关北京的某些传言传到彭总耳朵里，他不免大吃一惊。性格爽直、嫉恶如仇的彭总，7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查询了总政治部为中央警卫局选调女文工团员的电报，发现其中确有“面貌清秀、体态端正”等要求，选调过程中又有因预选对象不合乎标准被退回重选的事，引起部队强烈不满。彭总立即就这一问题当面向毛

主席作了报告，并对有关人员提出质询。经查明，所谓选调舞伴事件是中南海警卫局以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舞会和开展警卫部队文化活动为由而提出，经总政治部批准后以成立文工队的名义而进行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彭总的批评完全同意，责成签发批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和中央警卫局长作了书面检讨。彭总在向毛主席谈心中还反映，文工团到处唱《东方红》，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这和国际歌中的“从来没有救世主”是直接对立的，影响不好。毛泽东主席接受了彭总的直率批评和建议，立即下令撤销了成立不久的中南海文工队，并责成总政、总参裁减数量过大、人数过多的文工团和体工队。毛泽东主席还带头重申了我党我军所有领导同志一律“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地名，“活着的人不上舞台”等规定。党中央同时明确要求：这些都要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做起，自上而下地纠正自我颂扬、追求享乐腐化的风气。

1954年7月20日，彭总又在以他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报告中，共谈了四个问题。他把“自‘三反’运动以后，一部分高级干部仍滋长着个人生活放荡、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作为首要问题向中央提出。他建议，对此“除就事论事、采取严肃态度外，拟于今冬或明春，召开一次全军范围的党的代表会议”，“而后再通过全党的力量，一直贯彻下去，以求彻底改正和克服”。

接着，“八八”指示出台。“八八”指示在肯定当时我军绝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是好的这一主流的同时，指出“也有若干党的高级干部，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在胜利之后滋长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他们“追求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以致蜕化堕落违法乱纪，使我党我军和革命事业招致了损害”。“八八”指示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有些高级干部“由居功骄傲发展到骄横和骄奢”。“认为党和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只适用于一般的人，对于他们是‘无可奈何’的”。对上级的指责、同志的劝告和批评置若罔闻；二是“有些党委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对这些犯错误的，未能及时开展

批评，进行斗争”。“由于缺乏组织监督和批评，使他们的错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八八”指示要求：切实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提高高级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的观念；严肃党的纪律，加强纪律检查，约束党员不正当的思想行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在这一指示中号召全军高级干部要认真接受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的教训，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珍惜荣誉，努力学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八八”指示发出一年之后的1955年10月，总政治部向军委并中央作了《关于执行“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八八”指示发表后，“全军师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了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指示，对团以上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了一次教育，对犯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错误的人进行了检查和揭发，展开了批评和斗争，并按照错误的情节，作了不同的处理。”《报告》评价贯彻这一指示的积极成果是，对居功骄傲、享乐腐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批判，实质上是对高级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据1955年7月统计，在贯彻“八八”指示中，经检查揭发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截止到《报告》发出时统计，已有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并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八八”指示的宣讲和贯彻执行，是一次效果很好的整风。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整顿，成功的扭转了居功骄傲、不求进步的情绪，挽救了一批陷入和即将陷入剥削阶级腐化堕落生活泥坑中的人；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经过活生生的教育，也大大提高了警惕和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政策纪律观念，有力地纠正了“小节无害论”观点和自由主义风气，消除了群众对党的疑虑，密切了党内外团的团结。与此同时，大力表彰了一批德才兼备、艰苦奋斗的干部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倡导了艰苦朴素、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部队面貌和风气为之一新。

（责任编辑 洛松）

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

——忆良师益友胡耀邦

□ 牛克伦

50年代初,在一份自传中,我曾经写过:胡耀邦同志是我在延安工作时期的楷模,今后我还要努力向他学习。如今,耀邦同志已经作古,人民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念起他,想到的常是一些小事。我想,这些“小事”,是不是能够作为对这位伟人革命生涯的一些注脚呢?

我和耀邦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战初期。

1938年3月,我从抗大三期九队毕业,正逢一大队组建,组织上决定我到一大队任宣传干事。当时还没有设立宣传股,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务几乎全部由宣传干事承担,是个很锻炼人的岗位。

一大队住在瓦窑堡,远离延安,有180里路,是个独立大队,干部配备是很强的。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就是胡耀邦。对耀邦同志,我并不陌生,他曾到九队给我们上过课,他在政治课堂上那极具鼓励性的演讲,连同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瓦窑堡是子长县(原安定县)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地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所以这里既有我们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的安定县政府;在军事上,有共产党的保安队,也有国民党的保安队。根据双方协定,县城内的地盘归国民党管辖,县城外归共产党管辖。随着抗大一大队的到来,当地的革命力量自然强大了许多,国民党右派既怕且恨,不断挑起事端。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磨擦专家”,他在群众

中散布谣言,说“抗大害怕日本人,不敢上前线,在后方与民争利”,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借给抗大生活用具,并且怂恿流氓、地痞夜间朝抗大宿舍和过往人员砸石头,围攻、袭击零星外出的抗大人员。

当时的斗争形势,对我们一大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時候,胡耀邦政委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他认真了解了当地的民情社情,并召集我们多次开会,研究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决定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他亲自主持房东座谈会,介绍抗战的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战的真相,宣传八路军的战绩,讲清抗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2、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发动全体人员向人民普遍开展宣传活动;3、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与他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同志们很快地行动起来,军民关系迅速地得到了改善。一天,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对我说:“大队研究决定,由我去见见田杰生,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带枪吗?”耀邦同志笑笑说:“没必要。带支笔就行了,作作记录。”他那轻松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深入虎穴,倒像是要去参加一个普通的座谈会。我知道耀邦同志身经百战,胆识过人,更兼口才出众,田杰生根本不是对手。

路上,耀邦同志向我讲了许多统战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并嘱咐我:要沉着冷静,有理、有利、有节。

田杰生的县政府是个不小的院落，门口懒洋洋地站着两个保安队员。我们连正眼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昂然直入。听说有八路军找他，田杰生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只有两个人，而且没带武器，便又恢复了常态，皮笑肉不笑地钻了出来，一口一声“胡政委”地叫着，敬烟沏茶。

耀邦同志开宗明义地说明来意，指出，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

大概是认为八路军不能把他怎么样吧，田杰生避重就轻，跟我们兜起了圈子，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起自己的政绩。耀邦同志紧紧地把握住主题，问道：“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这些情况你知道吗？”田杰生赶忙说：“我不知道，确实不知道！”耀邦同志问：“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情况也不知道呢？”他的口气看似平和，实则字字千钧，逼问得田杰生说不出话来，他支吾半天，说：“一定调查，一定调查。”耀邦同志严正指出：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最后，他微笑着对田杰生说：“惩治汉奸，恐怕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不同意吧？”田杰生强作镇定，连声道：“当然，当然。”

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说，田杰生这类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既要同他谈，又要准备打。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但是，我们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迫使他们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并且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为一大队初到瓦窑堡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而我，则对耀邦同志又多了一分了解，多了一分敬佩。

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同耀邦同志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要到他的

房间去。经常夜很深了，他还在那里阅读马列经典、历史书籍，或者一个人思考问题。有时我刚一推门进去，他就对我说：“牛克伦，你看我又考虑错了……”其实，他考虑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他往往会指指墙边的长凳让我坐下，告诉我，某件事他是如何按老经验去处理的，认为是十拿九稳，但是效果却不理想。

每当此时，我都会觉得是在面对老师的提问。然而这样的提问是令人兴奋的，深刻而不失轻松。在他面前，我无须顾忌，每每直言。他听了之后，有时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有点水平；有时会说：你呀，和我一样，大错特错！然后，他定会围绕所谈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出一番道理，告诉我正确的结论。如果我想不通，和他争论起来，他也不发火。

陕北的冬夜是寒冷的，耀邦同志的窑洞里有时连炭火也没有；户外北风呼号，室内一灯如豆，但是每一个曾在这里与耀邦同志相对恳谈过的人，大概都无法忘却那种如沐春风的情怀。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我们一大队办起了队刊。采访、编辑、排版都由我负责。我虽然在“一二·九”运动时也参加过“救亡时报”的编辑，但如今要比较全面地负责队刊的工作，真感到有些为难。

一天，我在耀邦同志那里汇报完工作正要走，他把我叫住，取出了一本我们准备出版送他审定的队刊。我心想，大概要挨批评了！谁知，他丝毫没有批评我的意思，而是把刊物摊放在桌上，一丝不苟地评判起来——报头该怎样画；版面为什么显得不够生动；所选文章该怎样取舍；以及怎样采访组稿……点点滴滴，细致入微。那神情，俨然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在上课。

他的指点令我心服口服，同时感到惊异：一位贫苦出身、由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居然对办刊物如此内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在总校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毛主席让我编校刊，我对主席说，我没有经验，编不好。主席说：‘不会可以学嘛！可以向陈伯达学，也可以让各级领导干部带

头写稿子’。今天,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不会可以学嘛’。你是知识分子,基础比我强得多,只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就一定能把队刊办好。”

耀邦同志的话,就像是一把火,烧得我周身暖洋洋的;他的具体指导,又句句都说到点子上,真使我有喜出望外之感。我奔回窑洞,把这期稿件从头到尾,重新编排了一遍。天已大亮,我竟毫无睡意。早饭后,我把改过的稿子拿给耀邦同志,他仔细地翻看了每一页,笑着说:“很好嘛,土别一夜,便当刮目相看!”接着又说:“领导干部都要写稿,我带头!”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他不但大力提倡,亲自把关,还带头写稿,带动了全队的办刊热情,使刊物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不久,他在一大队又倡导发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是苏联的一个劳动英雄),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革命竞赛。为此,耀邦同志连续给队刊写了几篇文章,指导运动的发展,总结群众的经验,一时间,更使队刊成了几千名学员的人人必读之物。我本人,也被光荣地评选为“斯达汉诺夫队员”。后来,罗瑞卿副校长得知了一大队的经验,率领工作组来观摩总结。耀邦同志把我介绍给罗副校长,罗副校长笑着说:“我认识,他是大学生,‘牛克思’!”罗副校长对我说:“队刊办得很好,毛主席每一期都看,评价很高呢!”那晚,大队领导请罗副校长吃饭,耀邦同志让我参加作陪,我从不饮酒,但这一回我开了戒。

事隔三十年,一次,谈起往事,耀邦同志忽然说道:“牛克伦,在一大队,你办刊物办得不错嘛!”我说:“那是因为有你政委带头写稿子呀!”他哈哈大笑,说:“我那也是跟毛主席学的。毛主席让我办校刊的时候说‘不会可以学嘛,’还说‘要各级干部带头写稿子嘛!’我马上就说‘那就请主席写一篇稿子吧!’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啦?’后来,主席很快就送来了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刊登在抗大校刊第一期上,我还写了一篇编者按呢!”

他还告诉我,有两件事情是毛主席特别重



抗大三期毕业证章

视的:一个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个是办报刊,宣传党的路线。在这两个方面,要认真地向毛主席学习。

应该说,耀邦同志说的这些话,我当时是似懂非懂。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重新出来工作,在中央党校的领导岗位上,在高级干部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又充分发挥报刊的作用,勇敢地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时候,我才似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

1938年底,耀邦同志奉调回延安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临别时,他嘱咐我:“多读书,多思考,大胆工作。”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送给我。照片里,他是一个英气勃勃的红小鬼,背后写的是“克伦同志留念”。

1939年春,我随三大队奉命深入敌后,一去数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耀邦同志。1943年,抗大奉中央之命重回陕北,我仍住在瓦窑堡。有一次我到延安开会,便抽空去看他。他住在东山坡的一个窑洞里。虽然几年不见,有很多话要说,但看到他那忙碌的样子,又不好意思打搅他。耀邦同志却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详细地询问我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说,你应该到部队去锻炼,我告诉他,我曾几次申请,都因抗大的工作需要而未得到组织的批准。

建国以后,耀邦同志到地方工作,更忙了。我通常是逢年过节给他打个电话,聊致问候。有时在报刊上见到他的讲话,未经卒读,他那鲜明

泼辣的谈风便扑面而来，仿佛又见延安时代。

直到1974年，耀邦同志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从“干校”回京，尚未分配工作；我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赋闲在家。也算是因祸得福吧，终于有机会常去看他了。几十年不见，历经风雨，他的性情还是那样鲜明豪爽。案头摆着马列著作和古今典籍，屋中经常坐满来听他议论的老战友、老部下。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因言获罪之事仍时有所闻，但听他纵论时政，抒发胸臆，每觉痛快淋漓，受益匪浅。谈到“文革”，谈到许多老同志受到的迫害，他满怀忧愤，拍案说道：“文化大革命，搞得凄凄惨惨戚戚！不能再搞下去了！”这在当时，实属惊人之语。

作为一位革命家，耀邦同志的身上又时刻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使接近他的人深受感染。那时，他的一些应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只能坐公共汽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他说，王震同志曾关切地问他：你是怎么来的？他说：坐公共汽车。然后又用双腿比划着说：我能上能下！说得王震同志等哄堂大笑。大家知道，耀邦是在讥讽对老干部的迫害，彼此心照不宣。我至今记得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哈哈，我把王胡子逗得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和老战友王恒同志一道去看他。耀邦同志说：“今天出去散散心吧，我刚领到工资，请你们吃饭。”他要了车，一行直奔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落座之后，耀邦同志从口袋里取出一瓶酒，一瓶很普通的酒，对我们两个说：“今天喝这个。”我和王恒都摇头，说老领导请吃饭怎能喝这种酒，而且还自己带。耀邦同志摆摆手说：“这酒里有个故事，咱们先讲故事后喝酒——你们知道，我住的富强胡同离灯市口、王府井很近，我经常在那一带的大街小巷走路锻炼，昨天，我走到百货大楼，想去买瓶酒，进去才知道买酒要凭购货证。我说：我没有购货证。售货员说：那你带了别的什么证件没有？我翻了半天，找出一个李昭同志（耀邦同志夫人）的户口本。小伙子接过去看看说：李昭是女的，你是男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胡耀邦，刚从干校回来，还没有本。小伙子说：你就是胡耀邦？我

说，对呀！他又说：你是‘走资派’？我说：对呀！他说：好！你买酒不要本，随便买！”

听到这儿，我和王恒哈哈大笑。耀邦同志也笑了，他给我们斟满酒，举杯说道：“你们说，这瓶酒是不是很有意义呀？要知道，人家敬重的不仅是我胡耀邦，而是所有老干部！这里有人心的向背呀！”说着，他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就像当年给我们交代任务：“所以，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你们要告诉能见到的老战友，不要光在那里发牢骚，要抓紧时间学习，锻炼好身体，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

1976年10月，人民的火山终于爆发了，“四人帮”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耀邦同志身居要津，为拨乱反正而殚精竭虑。我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听说，他家里经常坐满了人，有请示工作的，有诉说冤情的，来自全国各地，排队等着和他谈话；有的，还临时住在他家里，由他自费接待。我完全能想象出那种场面，同时为他的健康担心，决计尽量不去打搅他。

后来，我只和耀邦同志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后，另一次，是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两次都是老战友们相约，登门向他祝贺。没有时间深谈，没有时间叙旧，更没有把酒言欢，甚至连过多的寒暄也没有。短暂相聚，我们的老首长、老教员耀邦同志用他特有的方式，给我们上了最后的两课。

第一次，他说：“我当了组织部长，你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大家都是受到‘四人帮’迫害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搞‘四人帮’那一套，不能任人惟亲。今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但是谁都不要向我伸手要官，要依靠组织。”

第二次，他说：“我当了总书记，还是那个胡耀邦，一个人绝不会因为职务高了水平就高了。你们接触群众的机会多，大家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告诉我！”

这就是我听到耀邦同志说的最后两段话，两段普普通通却又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他与我的谈话是从瓦窑堡的窑洞里开始的，以此成为尾声。

（责任编辑 程 度）

无名英雄不能任其埋没

□ 甘惜分

世界上有数不尽的无名英雄，中国有数不尽的无名英雄，革命战争的牺牲者有大量的无名英雄。在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建设过程中，都有许多死难者的姓名不为人所知。

共产党员是传说中傲游太空的巨龙。我说，他们是山林中的雄狮，他们是俯视大地的苍鹰，他们是大千世界中的最强者。但是，当他们尚处于革命劣势的时候，他们也曾是弱者，他们必须学习斗争艺术。

30年代初，当中国革命尚处于敌强我弱的时候，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重庆、广州、香港这些地方，真是遍街狼犬，张开大网搜寻革命者。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机关还在上海。上海是中共的诞生地，党的领袖人物瞿秋白、周恩来、陈云等人都在上海市内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小街小巷中；他们联系着散布在全国各省市的各级党组织。如果中央领导机关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势必引起一场全党的大破坏。因而千方百计地保卫党组织，不让敌人嗅到半点气味，这是一场多么艰难曲折的斗争。

问题还不仅在于保卫党组织，更重要的是还要主动出击。出击什么？——在敌人心窝里搜集敌人的军事政治情报，以便党采取相应的对策，保存自己，瓦解敌人，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地下共产党人就是钻进敌人内脏的一群孙悟空，把国民党的首脑机关打它个落花流水。

为了对付我们这种革命的秘密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非常庞大非常严密的特务组织系统，如军统、中统之类。为此共产党也必须有自己的地下情报组织，与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组织在上海那个时代称为“特科”。特科的创始人就是后来名震世界的周恩来，他手下有一批最能干的干将，如潘汉年、李克农、陈赓等人，他

们又各自联系着若干社会名流、工商巨子，而更多的是大批无孔不入的，不露姓名的，隐蔽得很深的无名英雄。《无名英雄》这部电视记录片就是歌颂这些为党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无名英雄的作品。

《无名英雄》着重描写了解放前夕南京的共产党员的地下活动，告诉我们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比如说，为什么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那么顺利地渡过了天险长江。南京李宗仁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和谈，中共代表团明确通知对方：和谈成不成我们都要过江，时间是4月20日。如此明确无疑地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日期告知对方，这在战争史上大概无此先例。难道我军不怕敌人作好防御准备而增加我军渡江的难度吗？不，通过我党在敌区敌军的地下活动，我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敌军的江防工事情报，连敌军的江防地图我军早已了如指掌，与敌军将领准备起义投诚者也早有联络。

蒋介石后来说，他们的失败不是败于共产党，而是败于自己人。这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于此也可见中共地下党员的英雄功勋。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军事格言。蒋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岂有不败也哉！

又如平津战役，我军为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向傅作义将军做工作，促其放下武器。傅作义将军的情绪变化，疑惧喜怒，我方都毫发皆知，报告了首脑机关，终于促使傅作义决心放下武器。我军和平解放北平，确是“不战而胜”，中共地下党员在这一战役中立了大功。

中共地下党员，有时乔装打扮，活跃于灯红酒绿之间，看起来他们十分潇洒。其实他们是在刺刀尖上跳舞，外表的倜傥风流掩盖着内心的极

度紧张，他们是在饮酒跳舞之间刺探敌人的机密，这需要多么巧妙的斗争策略啊！他们是真正与狼共舞，一不小心就会被狼吃掉。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不是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而是提着自己的脑袋进入地狱与牛头马面的魔鬼们斗智斗勇。如果说地面战争的英雄们是伟大的，那么这些地下工作者也同样伟大，甚至更加伟大。他们把自己的血和汗流进了建立共和国的巨流中。共和国颁发英雄勋章，不能忘记这些地下英雄。全国解放后，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这一集体中最突出的代表。在这一集体之中，有一部分英雄人物已长眠于地下，他们被蒋介石枪杀，为祖国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有的名垂青史，有的连姓名也未曾留下。

1949年北平解放了，上海解放了，重庆解放了，所有大城市都解放了。那些曾为解放这些城市而献出全部心血而又幸存下来的地下英雄们从地下钻出来，公开站在欢迎解放军入城式的队列中，欢呼自己的军队的胜利。他们的心情是又喜又悲。喜的是多年的残酷斗争结束了，悲的是共同斗争的一些战友不能共庆这个伟大的节日了。

钱壮飞，这个隐蔽在南京特务大头目身边长期充当机要秘书的伟大英雄，当他截获叛徒顾顺章即将摧毁上海党中央机关的紧要关头，以飞快的速度赶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使党中央迅速转移而免遭破坏。这位地下工作者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岗位了，他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共和国的诞生，但他的英名却永垂不朽，他是所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标兵之一。

像钱壮飞这样扬名后世的英雄人物，在千万地下工作者中并不多。绝大多数由于他们处于生死线上，他们之间常常是单线联系，彼此并不知道真实姓名，一旦被捕被杀，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成了无名英雄。

有一些从事地下工作的英雄人物，侥幸活了过来，在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却又充满了坎坷。甚至成为怀疑的对象。

在人妖颠倒的“文革”中，有多少曾在国统区潜伏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诬为叛徒特

务，受尽磨难。

这里还想提一下在日寇占领区的“两面政权”。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游击区的一种非常特殊的隐蔽斗争，这是地下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中国人民的一种创造。现在的青年人不懂得地下斗争，更不会懂得“两面政权”，恐怕连这个名词也未曾听说过。

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广大地区，并且不断从敌占城市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大搞蚕食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周边农村修建军事碉堡，从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逐步深入到根据地内部，敌人龟缩在这些碉堡内，向周边农民征粮征款，收集我军情报。那时我军装备低劣，小米加步枪，没有炮火摧毁这些碉堡。这样一来，我们根据地将越来越小，这对我军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是豺狼到底斗不过“地头蛇”，我军在敌人的碉堡周围发展了“两面政权”，表面上是伪政权，实际上是抗日政权，白天应付敌人，晚上帮助我军抗日武工队进入村内作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把这些碉堡一个一个地“端”掉。这些“伪政权”的领导人大都是我党地下党员，他们为了保卫根据地，保护当地老百姓，不得已而应付敌人，这些“白皮红心萝卜”是我们的自己人，他们为了掩护我军活动吃尽了种种苦头，甚至牺牲了生命。但解放后他们中不少人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革”中不少人被定为叛徒。党的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仗义执言，认为这些“两面政权”中的同志凡没有叛变行为者应予恢复党籍。

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没有署任何英雄人物的名字，它是亿万人民献给为中国革命流尽热血的人物的心碑，也是亿万人民献给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心碑！

再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无名英雄”真是无名到底，任其埋没吗？不能千方百计搜寻史料，或向活着的人一一探询死难者的英名吗？不能在英雄们的家乡树立石碑刻上英雄们的姓名吗？不能为杰出的死难者树立雕像吗？这些地下英雄们以及一切在战争中、在建设中的死难的烈士们是国家的珍宝，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不能让他们永远无名，要让他们名垂千古，他们是中国的骄傲。

（责任编辑 程 度）

徐海东

和他生死相守的妻子

□ 崔向华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赞“红色窑工徐海东”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民间传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九次负伤，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抢救出徐海东的，是一位名叫“少兰”的女子。

1934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三千名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本来这支部队中的七个红军女护士都决定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跟部队走，一片哭声终于惊动了军团长徐海东：“为什么哭鼻子？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决定？”年纪最小的周少兰天不怕地不怕地说：“我们都是逃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我不能再回去当童养媳。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不能没有家。再说，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战士受伤，前线需要我们呀！”徐海东被说服了。

长征途中，周少兰和女伴们舍生忘死，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荫蔽所，及时救护。在陕南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海东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危险。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仍被血和痰堵

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紧急关头，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毅然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一口又一口地将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清吸出去。徐海东得救了！在缺医少药的战争环境里，周少兰四天四夜看护着徐海东，眼不阖拢，衣不解带，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海东感激她的照顾，一次交谈中，建议她将名字“少兰”改为“东屏”，即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不想这一改，竟促成他们日后相知相随几十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徐海东和吴焕先、程子华指挥部队，粉碎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千里，威逼西安，进军甘肃，然后北上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早在北伐时期，徐海东就是叶挺所在的铁四军的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一举冲垮敌人四个炮兵连；1927年麻黄起义后任自卫队长，号称“徐老虎”，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璠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了童养媳，受尽欺凌。1931年3月，13岁的她就参加了革命，任安徽六安三区少先队大队长。1932年10月，她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加入中国

共产党后，任红十五军团护
士长、党支部书记。

1935年9月，这一对战
斗情侣在长征中举行了婚
礼。徐海东指挥的直罗镇战
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
的“围剿”，被毛泽东称誉为
“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
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
一个奠基礼”。

一次交谈中，徐海东向
毛泽东介绍了周东屏，徐海
东说：“她从小受苦，没念过
书，也是个粗人。”毛泽东笑
了，说：“我们今天的革命，
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
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
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
徐海东很高兴地笑了。

抗日战争中，徐海东率部深入华北、华中敌
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伤痕累累，经常发病，
他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大家劝他不听，徐海东老
话一句：“枪声一响，什么病都没有。打仗能治百
病。”周东屏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照料孩
子，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帮助丈夫恢复健康。徐海
东常常感到，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妻子既当战
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对周东屏说：“我们
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
毫无半点怨言，当死神又一次临近徐海东时，她
以惊人的镇静和勇敢，挽救了徐海东的生命。

那是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
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
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
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
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
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
继续率队东进，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重大胜
利。1943年冬，徐海东旧病再发，吐血不止，高
烧昏迷，病倒在战场上。

同志们已经在绝望之中为徐海东准备后事
了，周东屏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她把孩子托



徐海东与周恩来

付给警卫员，天刚蒙蒙亮，便踏上了崎岖的山路
去采药。又请来老中医，终于又一次使徐海东起
死回生。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知道后，电令徐
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40年以后，徐海东积劳成疾，只能在担
架上指挥战斗。又几次生命濒于垂危，这年冬
天，中原地带的雪很大，使通往前线指挥部的电
话中断了。徐海东不知前线战事日夜不安，深夜
他叫周东屏亲自去指挥部联系。生性要强的周
东屏顶风冒雪一步步走到前线司令部，天亮时
带回了前沿的消息和文件报纸。徐海东听读了
文件和报纸，欣慰地说：“只要不死，一天不能和
前线失去联系。”

徐海东很爱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长征中，
徐海东头部负重伤，她一直守护；红军东征时，
徐海东从马上摔下来，又是由她日夜照看。抗日
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
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
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
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这话，生气了，说：“混
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
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

有时病痛难忍，徐海东就吼叫：“给我枪，给
我枪！不能上战场，不如死了好！”他用拳头敲击

着担架喊叫：“快抬我走。我要到前线去！”周东屏跟随徐海东在担架上“打游击”五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徐海东看到中央发来的电报，高兴地对周东屏说：“咳咳！我这个病号，把小日本熬垮了。”周东屏想的是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送进条件好的医院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枪声骤然响起，从华中到山东，他依然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战局发展不利时，使病中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夜里彻夜失眠。许多老战友都知道，对徐海东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战争胜利的消息。每逢前线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前线的战友们，很快派人给徐海东送来战报和战利品。他们有空还会亲自去看望徐海东。1947年9月，中央军委给徐海东的电报，要他和一部分后方人员，速从海上转移去大连。

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东战场。没想到，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迹。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来肺病专家和苏联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



徐海东全家

警卫员和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了。全国解放了，徐海东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徐海东曾充满深情地写下《赠东屏》一首诗：“尊我护我细用心，养儿育女劳其神。宾客来至盛情待，贤妻良母好心人。”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1951年5月3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周恩来紧握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徐海东居住大连九年，周恩来三次专程前去探望。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恩来又来到大连文化街75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话重心长的话，是对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徐海东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病逝，时年70岁。

（责任编辑 刘文）

雇工上将傅秋涛

□ 蒋 杰

放牛娃出身的傅秋涛，十岁给地主当雇工，十五岁当店员，他苦难坎坷的生活经历，促使他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他参加了当地的雇农工会，被选为雇农工会委员长。1927年他参加了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7月，他率领赤卫队参加攻占长沙，1932年4月当选为湘鄂赣苏区总工会委员长，第二年转入中国工农红军。

中央红军长征后，1935年6月，蒋介石集中60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赣苏区进行了层层包围的清剿。已是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的傅秋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把主力部队组织30至50人或50至100人不等的游击队，实行出没无常、飘忽不定等游击战法对付敌人。

到1937年1月，由于与敌作战连续失利和部队一些领导干部叛变投敌，只剩下100多人，游击战争进入更加艰苦困难阶段。

敌人长时间的包围封锁，反复清剿，使红军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生活极其艰苦。据傅秋涛回忆：“1935年到1936年期间，有半年的时间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每天200人吃3斤米，熬米汤喝，有时连米汤也喝不到，只能以野菜野草充饥，煮竹笋就是好饭。没有盐吃，用五倍子花泡水（有点咸味）当盐吃。服装无法供应，靠打土豪搞些衣服和布匹，部队穿的各式各样。住的是草棚和山洞，缺医少药，伤病员只能用草药治病，用盐水洗伤口。”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促进了国共合

作。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傅秋涛率领的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司令员为陈毅）。傅秋涛任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全团共1100人，600多支枪。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傅秋涛率手枪队突出重围。1941年11月，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副师长，不久，被选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5年日本投降后，傅秋涛随陈毅从延安回华中，后中央电令转赴山东。10月华东局决定，傅秋涛任中共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

1947年7月，我军战略进攻开始，根据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9月中旬成立鲁中南支前委员会兼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前方办事处，傅秋涛任主任。支前委员会成立后即全力投入支援济南战役。济南战役历时8天，歼敌10万多人，共动员支前民兵民工50多万人，运送粮食5900万斤，其它军用物资45万斤，确保了战役的胜利。

济南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11月4日，成立了华东支前委员会，傅秋涛任主任。华东支前委员会在“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下，共动员民工225万人，小车41万多辆，大车3千多辆，担架7万3千多付，挑子4万2千多付，牲口9千多

头，建立兵站197个，组成一支浩浩荡荡、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在战役发起前，就动员60多万民兵民工，将1亿8000万斤粮食运到战区。组织群众大力抢修铁路、公路，修通公路300余里，大路95里，桥梁380座，使鲁中南地区交通干线全部畅通；并与参战部队配合架设多条电话线路，沟通了前后方的联系。战役进行中，我军追击从徐州南逃的敌人，粮食一时供给不上，华东支前委员会立即抽调干部400多人和民工积极分子



傅秋涛

4000多人，到附近400多个村庄协助地方政府就地筹粮。在四天之内就筹集粮食300多万斤，并将240万斤粮食加工后赶送到前方部队，解决了当时缺粮的严重困难。为了保证前线部队的油盐供应，还成立了油盐供应总站，从12月8日至17日，调集了800多辆小车，向前方部队运送食油17万斤，盐37万斤。徐州解放后，傅秋涛兼任徐州军管会主任，他在徐州动员商用汽车257辆，在18天内往前线运送粮食430万斤和大批弹药。

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胜利结束，共歼灭蒋军55.5万人。陈毅说：“淮海战役是怎样胜利的？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4月下旬“百万雄师过大江”。敌人为了破坏我军的铁路运输，每天派飞机到南京浦口轰炸，傅秋涛曾数次到浦口车站现场指挥。

上海解放后，傅秋涛任华东军区运输司令部司令员。主要任务是运输上海急需的粮、油、煤。傅秋涛领导全体干部像完成支前任务一样，千方百计完成了运输任务，保证了上海市粮、油、煤的供应，进一步稳定了社会秩序。

建国初期，中央要求军队志愿兵复员一部

分，回乡参加经济建设。为了执行这一任务，中央成立了中央复员委员会（1951年底改为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兼任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兼任副主任，调傅秋涛任秘书长。

傅秋涛到任后，与有关单位共同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制定了部队进行复员教育、确定复员对象、发放各种补助金、医疗费、办理复员手续、进行安全运送、回乡妥善安置等方面的政策和一套比较完整的措施。从1950年7月到

1958年，全军共复员志愿兵483万人，另外集体转业和零星转业的136万人，共计复员转业620万人。他们都愉快返乡，或走上新的岗位，投入生产建设，成为各条战线上的生力军。为此，周总理曾表扬说：中央复员委员会办公室没有编制，不要经费，有关单位派人集体办公，人数不多，但工作效率很高，完成任务很好。

1952年1月，傅秋涛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仍兼任中央复员委员会秘书长）。他拟制了四个对加强我国民兵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其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在全国实行了普遍民兵制度，改变了战争年代长期实行的自愿参加民兵的组织原则，使所有适龄青壮年都编入民兵组织，履行保卫祖国的光荣义务。其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和编制问题的决定》，全国各级都成立了人民武装部，实现了县（市）区人民武装部属于军事系统建制和对民兵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其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组成人民武装委员会，由党委书记兼任主任，更有利于贯彻中央关于民兵建

设的方针、政策，保证了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其四，中央军委、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这是建国后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民兵工作章程，对民兵的性质、任务、参加的条件以及民兵的组织编制、各项工作制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使民兵工作更加有章可循。这四个文件的颁布和执行，使全国民兵工作逐步走向统一，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从而实现了从战争时期向平时期的转变，为建国以后的民兵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开创了新的道路。

在傅秋涛的领导下，广大民兵无论在配合部队作战、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维持治安、抗美援朝和兴修水利、修建道路、植树造林、抢险救灾以及发展生产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3年3月，毛主席签发命令，成立了中央军委兵役法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张宗逊、徐立清、傅秋涛等13人为委员。傅秋涛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中央军委决定从各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兵役法研究室，负责承办兵役法拟草工作。历经三年的反复研究，参考外国的做法，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十四次大的修改，于1954年拟制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兵役法，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志愿兵役制，改革为实行义务兵役制。按照兵役法规定，我军相继实行了军衔制度、军官士兵服役现役和预备役制度、征集退伍和学生军事训练制度等，使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傅秋涛的主持研究下，改革了征兵的做法，在全国建立起定期征集新兵和老兵退伍制度。战争年代我军实行思想动员、自愿参军的做法，这种做法，已不适应建国后的新形势，需要加以改革。1954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征集补充兵员的命令》，决定全国征集新兵80多万人补充部队，这实际上是一次在兵役法颁布之前按照兵役法草案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征集新兵的试验。这年冬季，傅秋涛率领工作组先后到河南、广东、山东等省，深入到城乡基层进行研究试验，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探索出一套征集新兵的新办法。中央军委及时向全国推广了他总结的报告和做法，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次全国试验征集新兵的任务；同时也为以后搞好征兵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兵役法还规定，义务兵服役期满后，要退伍回乡。士兵办理退伍回乡的做法，也是在傅秋涛主持下，不断研究，在志愿兵复员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作了一些必要的简化而制订出来的。直到现在我国每年征集新兵和老兵退伍，基本上还是沿用这些做法。

（责任编辑 仲文）



傅秋涛和民兵在一起(1960)

人民炮兵开创者 朱瑞

□ 高华

现今的人们对朱瑞这个名字已是很陌生，只记得前几年上映的革命战争电影《辽沈战役》中有一个片断：在行进的四野指挥列车上，参谋长刘亚楼向四野政委罗荣桓报告，炮兵司令员朱瑞在义县阵地触雷牺牲，罗荣桓闻之，面色凝重，从不抽烟的罗荣桓点燃起一根香烟，并嘱刘亚楼暂不要将此消息报告四野司令员林彪。

朱瑞牺牲得太早，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朱瑞是那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年代的产儿。像那个年代的许多激进的革命青年一样，朱瑞从广州出发，踏上了赴俄之路。从1926年初至1929年7月，朱瑞先后在莫斯科学习近四年，在他的同学中，有邓小平、左权、傅钟、李卓然这些以后成为中国革命领袖和人民军队将领的知名人物。

1927年夏，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未能立即返国，而是被共产国际分配至克拉辛炮兵学校继续学习。还有一件并非无关紧要的事，1928年夏，经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6人介绍，朱瑞加入了苏共。此米夫，即以后王明的后台，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反面人物”。后来，有人批判他工作失误时，还记下了这笔政治“小账”。

1932年初，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时，他只有27岁，被委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1934年春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层核心“三人团”，为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紧急展开各项部署，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

——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是罗荣桓。红军到达陕北后，朱瑞随红一军团参加过东征战役，以后还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东北军骑兵签订了抗日协定，并在1936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担任过半年的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全面抗战开始后，朱瑞被调离部队，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与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抗战之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面临新的历史转机，1939年6月朱瑞被派往山东，担任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干部。

1939年至1941年，中共在山东已建立起79个县级政权和县级武装，根据地人口约1200万，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占山东全境面积1/5强，115师发展到7.6万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1941年8月，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

1941年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共在华北各根据地的进攻，山东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日寇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极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某些地区的根据地已被敌人压缩到“东西十几里，南北一线牵”。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寇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115师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115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不同争论，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解决高层分歧，统一领导机关的认识已成为当务之急。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今后目标。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返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中中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了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

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乃是对中间势力的“抗敌自卫军”的过分热心。对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机械僵硬。他未能接受罗荣桓、江华等的意见，而是去帮助某些进步人士组建军队，供给经费和武器，使其成为在根据地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组织。



朱瑞

在这个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朱瑞确实犯了大忌。

朱瑞在山东是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他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的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小时的动员报告。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中央立即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

1943年3月，延安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格局。各大战略区的一元化体制也相继确立：晋察冀——聂荣臻；晋绥——贺龙；太行——邓小平；山东——罗荣桓；华中——饶漱石。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两年的时间。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成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对自己一生的经历作了严格的解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七大上，朱瑞未当选为中央委员。

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之被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某种消极性的背景。在某些同志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

投降主义”挂上勾,至于善作“自由婚姻”一类的大报告,正可证明“教条主义者”具有的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特征。

抗战胜利,中共又面临新局面,此又是用人之际。在延安的各路战将秣马厉兵,纷纷奔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总部没有忘记还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中共七大后,本拟任命朱瑞为军委副总参谋长,渴望再赴疆场的朱瑞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愿望获得了满足,被派任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延安炮校乃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摇篮。在八年抗战中,因长期游击战争的限制,延安炮校偏居延安远郊,训练、生产、垦荒,又因炮校许多同志曾在苏联留学,或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党内大奸康生插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

多数同志被打成“特务”、“奸细”。朱瑞在短时期内就将炮校恢复,将人心理顺,继而率学校奔赴东北战场,实在并非易事。

在东北,朱瑞发出了生命的最后光华,这位当年的大战略区的第一把手,现在成了林彪的麾下,他以延安炮校500名骨干为种子,仅仅三年,东北野战军就发展到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受一切的磨难,艰辛,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价值,个人荣辱皆可全抛。朱瑞触雷阵亡,也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善。

是年,朱瑞43岁。

(责任编辑 刘文)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羨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订购较多的书籍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季羨林人生漫笔	季羨林	21.00	3.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19.50	3.00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徐 葵 张达南 译	28.00	4.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世纪三伟人	龚育之等六人	28.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4.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毛泽东最后十年	陈长江 赵桂来	17.00	3.00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与故事	许启贤	23.00	4.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的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记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原上草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六月情	牛汉 邓九平	25.00	4.00
荆棘路	牛汉 邓九平	23.00	4.00
(购买全套《记忆文丛》邮费7.00)			
海 丝	杜明明	28.00	4.00
龙文化与民族精神	鲁諝 王才 冯广裕	20.00	3.00
红墙回忆	纪 学	48.00	5.00

《李锐其人》通过李锐的一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而从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背景来看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知识分子的李锐,才能更看清他“这一个”最早一批走出个人迷信、闯入“左”的禁区的共产党人。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红墙回忆》红墙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红墙内是共和国领袖的住地。这里,有波澜起伏的政治风云,有领袖人物的真实人生,有领袖们的感情生活……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邮编:100007,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编者按：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同志，曾长期在广东省东莞县（现改东莞市）工作。这篇文章，是他近日访问东莞有感而专为本刊撰写的。确凿的材料，再次证明了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理论的无比正确。江泽民同志也说过，只要把蛋糕做大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作者用东莞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从东莞腾飞看邓小平理论的无穷威力



□ 林 若

一踏上东莞（市）的公路，就为这里的繁荣景象所吸引。到处是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一派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东莞有 13600 多家外资企业（含“三来一补”企业），7200 多家私营企业，5400 家集体企业，1500 多家国有企业，此外还有 11 万多个个体工商户，组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一万多家外资企业中有 22 家为世界 500 强的跨国公司办的企业。在这一大批企业群中，属于高新技术的占 53 家。

这些充满活力的企业，每年为社会生产大量财富，1999 年出口总额为 151 亿美元。以市为单位计算，仅次于深圳和上海，居全国第三位。去年为国家提供的外汇顺差达 27 亿多美元，我相信没有多少地方可以与之相比拟。

东莞 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为 412 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17.9%，居广东“四小虎”之首。他们对外商独资企业，只算工缴费、管理费的收入，不算产值。如果按产值属地统计，生产总值估计不下 1000 亿元。还有几个庞大的数字：去年用电量达 123.4 亿千瓦小时，仅次于广州、深圳，居全省第三位。程控电话与移动电话用户达 111.9 万户，一年增量达 35.6 万户。邮电营业

额达 51.6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 1040 亿元。年末人民币存差 516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6%；外币存差 6.9 亿美元，增长 85%。城乡居民存款达 616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 82.6 亿元。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东莞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蛋糕越做越大，而且连续几年，都大体上保持这么好的增长势头。

东莞市本身人口 160 多万人，由于工商企业的发展，吸收外地劳工达 200 多万人，形成庞大的劳工市场。有的乡镇本身人口只有三几万人，而外来劳工则达十余万人，乡镇之间形成梅花形结构并且联接起来，与中心市区之间形成纵横数十公里的卫星城市群落。他们自称为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

东莞经济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格局，有其特别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发展模式。它处于广州到深圳两个大城市之间；拥有水陆多条交通线路，几个小时就直达港澳；在香港有几十万东莞同乡。东莞在改革开放前是广东省有名的农业大县，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经贸大市。他们一贯重视发展实业，不尚空谈，不唱高调，默默耕耘，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东莞一没资金，二没技术，

只能从“三来一补”开始，艰苦创业，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当时在广东省的“四小虎”之间，被认为是一种较为落后的办法，被人看不起眼。当时的“三来一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也低。但是东莞人并不嫌弃这些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扩大，一步一步地升级换代，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加工业，出现了现代城镇的雏形。涌现出远近闻名的虎门服装市场，厚街家私市场，大朗毛衣市场等。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一个镇大体上相当于一个小城市。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看准了就大胆去闯去冒。对外开放，对内放宽政策，对下放权，让市（当时是县）、乡镇、大队（行政村）、小队（自然村）、个人一起上，形成一种满天星斗的发展态势。表面上看来有点乱哄哄的样子，实则把压抑多年的积极性，一下子释放出来，形成势不可挡的发展局面，把全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国营、集体、民营、外商，各种经济成分都在中央允许的政策范围内放手发展。经过20多年的努力，形成今天这种蓬勃发展的规模。从这里可以看到，是一个积极性好还是多个积极性好？是一枝独秀好还是百花盛开好？过去有些人把引进外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看成是搞资本主义，说什么姓“社”姓“资”，什么公有私有。东莞人在80年代初期，通过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切身体验，内外对比，早就抛弃了这一过时的论调，放手发展各种经济成分，放手发展对外加工贸易。他们从历史对比中深刻认识到：只要生产力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拘泥于僵硬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自以为正确，实则是思想僵化。经济不发展，无论唱什么调子都是无济于事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广东掀起一场大发展的高潮，多数地方在取得明显的建设成就的同时，一时间不看需要与可能地引进外资、搞开发区、搞房地产等，一时间到处开花，四处冒烟。这些现象东莞也出现过，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家大业大，管理混乱、家底不

清。有的乡镇和部门不顾经济效益，盲目举债，甚至高息集资，乱上项目；有的地方奢侈浪费，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以致开支越来越大，债务越背越重，还本付息能力越来越弱，金融债务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市政府不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而是敢于从实际出发，在没有上级部署的情况下，不顾一些乡镇干部的反，坚持清产核资，加强管理，消除隐患，使企业有健康发展之路。1995年抽调1200多人，从市属到乡镇、村全面进行清产核资。1996年又结合镇区换届进行届终审计，要求每个乡镇领导都要填写好交班任务书，防止责任不清。在此基础上，对财务收支和还本付息能力进行分析，批判那种“有钱花晒（用光），无钱靠贷，还钱靠下一届”的不负责任、吃大锅饭的思想。1996年换届工作一结束，全市迅速开展了加强管理、增收节支、减债降息的工作。当年就节省行政经费1.04亿元，压缩非生产性开支3.3亿元，并清理了高息集资。通过增资、减债、降息，全市这一年减少利息支出近10亿元，从而使金融债务风险得到及时防范。

在清产核资中，发现万江区（镇）和二轻集团公司资不抵债，财务管理非常混乱。市委以此为典型，组织全市五套班子、机关部委办局一把手和各镇委书记共200多人，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要求每个人都要通过解剖典型、写出有深度的调查报告，挖出资不抵债的根源，找出应吸取的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成功之举极大地教育了中层干部，也为近几年来东莞经济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防止挥霍公有财产或化公为私、贪污挪用的滋生。他们致力于制度建设，其主要措施有：在执法和行政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推行一个窗口收费，委托银行代理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实行征、管、用三分离；加强集体物业的管理，对政府和集体的物业统一回收，造册登记，重新估价招租；加强区镇和农村的财务管理，实行民主理财，定期公布收支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大力推行农村会计委派制和财会电算化。

这些措施一环紧扣一环,使市各部门以及乡镇村之间的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起来,有效地堵塞漏洞,有利于廉政建设,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东莞市委、市政府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包括物业投资),而排除在竞争性企业投资(福地彩管厂是惟一的例外,由于及时对其采取混合经济的模式并顺利上市,已排除了险情,出现了生机),对镇区及农村基层等,也基本采取这一投资取向。因而避免了像别的地方那样走了一段弯路,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现在不改革就办不下去,并背上一笔不小的债务。而东莞则在这20多年中依靠物业建设,积聚了1000多亿元的集体经济资产,巩固了集体经济地位,增强了人们对集体的凝聚力,更好地解决了共同富裕的问题。

东莞市委、市政府一贯致力于营造投资环境。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不断改善硬环境的设施,提高软环境的服务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镇两级政府,致力于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发展壮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政府为企业的申办、厂区建设、招工、后勤服务、直到投产后一个窗口收费等,提供周到的服务,排除了部门干扰。对出口报关、举办展销会等都大力予以协助,真正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严格执行政策规定,使内外商在东莞办企业感到放心、顺心。他们用不着到香港招商,各地客商慕名而来。近几年,新来客商络绎不绝,而原有客商则增资扩大生产规模。光去年即新增投资14.3亿美元,其中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就占43%。而省内有的地方只重视硬环境建设而不

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或者不重视政府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外商便对到他们那里去投资,多数裹足不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多么重要。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至1999年底,东莞市已有2800多家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厂家,年产值770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1%,电子产品出口总值66.8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44%。已有22家跨国公司在这里投资设厂,参与电子信息制造业,如IBM、诺基亚、朗讯、三星等,而国内有名企业如清华同方、北大方正、联想集团等也纷纷前来设厂。可以预料,用不着很长时间,东莞将一跃成为中国的IT名城。

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思想观念的更新,推动着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改善了。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5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117元。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1999年财政税收达70.7亿元,其中国税39.68亿元,地税15.69亿元,海关关税10.59亿元。这再次证明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理论的无比正确。

东莞经济的发展也再一次地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多么重要。一个地方不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不能把本地的事情办好。东莞市委头脑清醒,当发现有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该抓什么就抓什么,不断探索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如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当看到许多新办企业向“国营”趋同时,他们便改变投资方向,着重发展物业生产,退出在竞争性企业的投资。当发现政企不分导致管理混乱、

资不抵债的时候,就主动进行清产核资,建立制度,堵塞漏洞,促进廉政建设。这些举措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对工作没有高度的负责精神也是做不到的。陈云同志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永远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

(责任编辑 杜晋)



广东四大名镇——东莞石龙镇风貌



□ 卢 荻

香港招商局 “第二十九代掌门人”

袁庚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青年时代，日军侵华，国难当头，他投笔从戎，参加了东江纵队，担任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处长。1944年，盟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东江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派袁庚负责筹建联络处，和美国派来的情报组合作，向盟军提供情报，得到盟军的赞誉，被认为对美国战略部队“有决定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袁庚又和驻港英军谈判我党领导的华南游击队撤出香港以及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事宜。1946年6月，袁庚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曾任作战科长、炮兵团长，先后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南下，后又参加广东战役，他率领炮兵团参加了解放珠江口外的伶仃、大铲和万山群岛的战斗。50年代初，袁庚随陈赓抵达越南北方，成为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袁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他为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文化大革命”中，东江纵队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袁庚更因抗战时曾与盟军情报组合作被打成“国际间谍”，关进北京秦城监狱，“铁窗戏蚁”达七年之久。

1974年，袁庚的老上级曾生的冤案平反，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袁庚也从监狱出来，到交

通部外事局局长。他因业务关系再次赴香港。故地重游不禁大吃一惊，他看到香港一改50年代的落后景象，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商品琳琅满目，一片繁华。但每每从电视里看到偷渡到香港的大陆年轻人，戴着手铐被遣返回内地的镜头，心里便很不是滋味。不久，他回到老家深圳大鹏，只见满目贫瘠荒凉，许多乡亲家徒四壁。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不啻有天壤之别，深圳河两岸的强烈反差，深深刺痛这位共产党人的心。他想，香港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么繁荣，香港人都能做到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

袁庚这次是奉交通部部长叶飞之命，到香港招商局调查经营情况的。招商局是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筹备建立起来的我国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其业务远及南洋及欧美西方各国，后来经营范围扩展到钢铁、煤炭、纺织、金融等部门，解放后，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袁庚在招商局深入调查研究后，为重振招商局雄风，加快经济发展，他代交通部起草了一份报告，即《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要改变经营方针，冲破束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等。10月9日，交通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这一报告，三天之后，中共中央五个正副主席都圈阅了报告。

交通部以中央关于“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的批示作为经营方针，10月28日，决定由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调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成为招

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

创办中国大陆 第一个出口工业区

袁庚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寸土寸金，难以扩大业务，因此，就想要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发挥国内的有利条件。找来找去，他们认为蛇口最合适。1978年11月22日，袁庚到广州找到主管广东省革委会工作的刘田夫，向他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曾生、刘田夫、袁庚是解放战争时期两广纵队时的老战友，建国后他们仍经常来往。

刘田夫听了袁庚的介绍和构想，认为和广东建立出口基地的设想不谋而合，当即表示：“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12月18日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以及袁庚等抵达广州，和刘田夫等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刘田夫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等，凡是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广东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双方经过实地考察和比较选择，最后确定在蛇口兴建工业区。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驱车前往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当说到在蛇口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时，李先念以浓重的湖北口音爽快地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彭德清和袁庚喜出望外，壮壮胆子要了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地方。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说，袁庚当时应该顺口从李先念那里将整个南头半岛要下来。袁庚后来回忆说：“当时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



袁庚向邓小平汇报蛇口工业区情况

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李先念还在报告上作了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具体落实事宜，批准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开发，在宝安县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的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1979年炎夏7月，袁庚率领一批拓荒者踏浪而来。当时的蛇口，一片荒滩野岭。海面上时常漂浮着令人痛心的被大海吞没的偷渡者的尸体。袁庚他们在蛇口点燃了第一响开山炮，蛇口工业区从此诞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跑点，袁庚也随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风云人物。但在那时，招商局内部不赞成办工业区的大有人在，交通部也有人说袁庚不务正业，甚至有一位负责人警告袁庚：“到头来，你们会在蛇口人财两空，鸡飞蛋打的！”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确实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蛇口是中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当时外商虽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但因被西方称为的“铁幕”刚刚拉开，加之投资法规尚未建立，很多外商都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投资蛇口。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招商局利用企业留成利润，注入将近1亿元资金，移山填海，开出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又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搞好了“五通一平”。接着，袁庚大胆从香港银行引外资，到1984年，借

来的15亿港元(流动资金不算在内),兴建了80多个工厂企业和一批生活服务设施,开通了国际微波通信和直通香港的客货运码头。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纷沓而至,不出几年,就将8平方公里的荒滩秃岭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小城,数百家三资企业平地而起,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蛇口员工的工作准则和座右铭。不要国家拨款,自筹资金,自担风险,高速度地发展工业的模式,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

蛇口—— 改革的“试验场”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宦乡曾说袁庚对计划经济一窍不通,所以才搞出一个蛇口工业区来。袁庚过去活跃于军界、外交界,确实不懂经济。1975年,他陪丹麦B&W公司的总裁参观上海的造船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经济管理。从上海造船厂与B&W公司的造船厂的对比中,他开始醒悟到,中国的国营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企业变成政府有关部门的附属物的严重弊端。因此,一开始经营蛇口的时候,袁庚就意识到,如果照搬计划经济那一套,将难以摆脱旧框框的桎梏。工业区的成败,将取决于能否冲破条条块块的行政干预,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所以,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探索改革的道路前进,他在蛇口这块几平方公里的荒地上,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尝试。

袁庚说:“蛇口的实践,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改革的试验。”他在一次对中外学者的演讲中说,“要移植、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建起一个繁荣城市不难,难的是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来适应这种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进步的人,进步的社会,是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因此,在蛇口造就进步的人,创造一种进步的社会环境,是袁庚孜孜以求的理想。

后来,袁庚多次对人说,蛇口所以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这并不是我们特别聪明,特别有远见,说穿了,这些改革是由我们的资金来源方式和我们的经济地位逼出来的。蛇口的开发资金,除回收的钱之外,都是从香港

银行借来的。招商局和我本人都下不了台,都要负法律责任。”因此,还贷的压力迫使袁庚他们十分重视经济效益,这种“先天性”的带有按市场机制动作的企业本位功能,迫使他们不得不一开始就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采取一系列政策,为发展经济和生产开路。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工业区成立若干个职能机构(办公室、企业室、总会计师室等)、13个专业公司(房地产、港务、劳动服务公司等)和若干个公用事业单位(公安局、医院、学校等)。职能机构属行政编制,13个专业公司属企业性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政、企分工的管理体制。外商进来洽谈项目,从土地、协议、项目、规模、供水、供电、电讯安装、劳动力招聘、职工住房租卖,均可以在一座大楼之内数天之间获得解决。

在干部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真实的事例给袁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起初,蛇口的干部都是从交通部系统抽调来的,有些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国际基础常识太低,难以胜任对外开放工作。有的人甚至以为英国剑桥大学是学建桥的大学,有的人问美商:“英国用英文,不知美国用什么文?”

袁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1980年他们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打破传统办法,改由通过考试从全国招聘人才。这个报告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大力支持后,袁庚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骑自行车到清华大学,钻进宿舍,同素不相识的学生对话、谈心,大谈蛇口的创业与前景,感动了一批清华园的“少年郎”,他们结伴南来。袁庚他们先后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理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中,经过考试招聘了一批人才,经过分期培训,加以考察任用(国家机关直到1994年才在有北京户口的人员中公开招考公务员)。有一位留学日本的企业管理硕士,主动要求到蛇口工作,无奈关卡重重。袁庚知道后,两次给对方领导写信,请他高抬贵手,转让人才,终使这位留学生如愿以偿。蛇口通过招聘途径,使一批有各种专长、有潜能以及怀着振兴中华理想的“冒险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头半岛,陆续走上蛇口的管理层,成为

业务和管理的骨干。

针对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有些人可能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弊端，袁庚决心搬掉领导干部的“铁交椅”，干部进退由人民投票决定。1983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蛇口，袁庚等人谈到，搞改革就是要全方位进行，这一主张得到了胡的赞同。袁庚等人在蛇口区试行直接无记名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和进行信任投票的办法，让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群众心中十分亮堂。果然，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有志之士当选。任满一年时举行一次群众信任投票，凡是有过半数不信任票的立即更换，严重失职、渎职者可随时撤换。这样做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小干部真正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葆其旺盛的青春。管委会还定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群众输送施政信息，接受质询。蛇口推行民主试验之后，社会道德风尚有很大的进步。

袁庚他们还在劳动体制、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他们立志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取消干部原来的工资、行政级别，其收入取决于个人才能与贡献；管委会下各专业公司的干部、经理实行聘用制，能上能下；职工实行合同制，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住房商品化；大力倡导政治改革，提倡政治透明度和人民的知情权，保护职工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使群众敢于批评任何一位领导，制约特权和淡化官本位……这一系列的改革以及它所带来的“蛇口模式”、“蛇口观念”，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许多发祥于蛇口的经验、观念，已辐射到内地，产生广泛的影响。

“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他们一点权力”

1978年10月，中央在批准交通部的请示报告时，给了招商局一点权力，可以审批500万美元项目，可以向国外银行抵押贷款。此外，再加上在所属企业、工厂经营管理上有一些自主权。袁庚他们就凭这一点权力，大刀阔斧地改革，开创“第一个吃螃蟹”之举。

创业阶段为了鼓励员工多劳多得，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要给他们多发些奖金，国家许多部门不同意，袁庚他们一级一级请示，一直写报告到国务院才得批准。后来随着工业区的发展，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样说他们都不同意。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袁庚一再地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发展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袁庚和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用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

同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南方。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车来到蛇口，先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邓小平看了工业区的全景模型后，走到窗前，居高临下，俯瞰工业区的景色。他指着附近的码头，询问建设情况。袁庚回答说：“工业区开发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兴建码头，花了一年的时间建成了600多米的码头，现在已经使用4年了，可停泊3000吨至5000吨的货轮。”邓小平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接着，袁庚就工业区的建设以及工资、人事、住房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向邓小平等作了全面汇报。邓小平听得十分认真。邓小平视察了蛇口工业区后，指出：“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随后，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合资企业华益铝材厂。接着应袁庚的邀请，来到“海上世界”作客。“海上世界”是由一艘豪华油轮“明华轮”改装成的酒楼宾馆。邓小平兴致很高，登上九层，欣然就餐，并参观了船上游乐设施。离船前，应主人的请求，邓小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4个字。邓小平这次南巡，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分别为特区题词。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邓小平这次南方观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划上句号。”

“在蛇口决不允许发生以言论罪的事情”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来自北京等地的三位闻名全国的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近70名青年出席了这次座谈会。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专家展开了激烈论战。争论的焦点：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有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二是对个体户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教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无端占用他人的劳动的“左”的残余。青年教育专家对此大为不悦。有人起草了《“蛇口座谈会”始末》，整蛇口青年的“材料”，并对蛇口青年的态度和一些言论提了批评。袁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在蛇口，决不允许发生以言论罪的事情！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2月1日，《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为题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多家报刊相继作了报道或转载，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次争论持续了半年多，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

事隔10余年，袁庚对记者说：现在回过头看，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理解。它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市场

经济讲的是公平合理，计划经济讲的是服从和无私奉献。这个社会应该做到公平合理。合理的才是道德的。当然，个人的道德修养另当别论，就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而言，离开公平合理讲无私奉献是带强迫性的道德要求，只会造就另外一批占别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蛇口青年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他们不愿意接受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准则，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另一方面，在蛇口，人们已经习惯地、公开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讲错什么，也不担心祸从口出，再说这样的争论在蛇口也司空见惯。所以，“蛇口风波”虽然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蛇口本身却很平静，大家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袁庚建设民主政治、保护言论自由以及提倡各种新观念、进行社会变革的一种尝试。

袁庚曾到过世界上许多加工区考察过，他对蛇口工业区的发展目标很明确，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外资投资为主，产品外销为主”的建设方针。袁庚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工业能创造最大的财富，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促进商业、旅游和服务行业的持久繁荣。因此，当别人靠商业贸易、房地产或者东“倒”西“倒”大发其财的时候，蛇口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个为主”的方针，眼睛始终盯着国际市场，扎扎实实打好基础。20个年头过去了，蛇口已由一片荒滩秃岭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袁庚接手招商局的时候，总资产为1.3亿元人民币，到1992年他离任的时候，招商局总资产已达200亿元人民币，其中蛇口工业区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袁庚不仅是一位执著追求、充满革命激情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身体力行、敢冒风险的苦干实干家，他在花甲之年到蛇口导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开放活剧，使默默无闻的蛇口一度成为一方热土，而他自己也因此迈向革命生涯的颠峰，赢得了海内外的如潮好评，闻名遐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责任编辑 仲文）

文艺界的『老黄牛』

——怀念原文联秘书长、著名书法家陆石

□
露
菲

一大早接友人电话，告知陆石同志去世了，惊得我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真是太突然了。前些日子去看他，还好好儿的，那天他谈兴很浓，谈到胡乔木、田家英、何其芳、周扬等很多老领导、老朋友。他慢条斯理，话语中充满了深情。我离开时，他还送了我一册《陆石诗书集》。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当我赶到陆石同志家时，他的夫人赵中同志，一位自控力极强的资深编辑，已悲痛地说不出话来；女儿雪梅也泣不成声，陆石同志平日坐的沙发也空荡荡的了。

这是1998年的事，现在想起仍如昨天一般。

我认识陆石同志是文革结束后，他由公安部调到中国文联工作的时候，开始他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后中央任命为中国文联的党组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他是著名书法家，曾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他又是作家。五十年代他和李文达合著的小说《双铃马蹄表》改编成电影，片名《国庆十点钟》。是一部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影片。

提到陆石同志调中国文联的事，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当时那些被“四人帮”砸烂的单位，都在恢复和组建中。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文艺界是重灾区，需要重新组织队伍和恢复原有的建制。文艺界不少同志心有余悸，不敢再沾文艺界的边儿了。因为开国以来多次运动都是先拿文艺界开刀的。而陆石却服从调动心甘情愿地到了中国文联。

好干部，得力的干部谁也不肯放。陆石所在单位公安部也是如此。文联主席周扬亲自给公安部长赵苍壁同志打电话，要求将陆石调到文联工作。赵苍壁部长说，陆石是位有能力的干部，为人正派，公安部工作需要他。周扬同志则说，陆石是延安鲁艺的学生，写过不少作品，是老文艺战士，对文艺界也熟悉，文联需要一位有组织能力、行政能力的领导干部，请求给予支持。

两位领导几经磋商，陆石同志终于调到了中国文联。文联主席周扬同志找他谈话时说：“文联总该有个地方办公吧，不能老呆在防震棚木板房里办公，文艺界的同志被扫地出门，没有地方安身，我心不安。”陆石同志立下军令状说：“周扬同志放心，我一定尽力解决。”

周扬同志还告诉陆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界有了一些新作品，出现了一些新人，旧的矛盾少了，新的矛盾产生了，不论有什么矛盾，一定要当促进派。一要抓文艺为人民服务，敢于解放思想，也要敢于抵制错误思想。二要抓繁荣文艺创作，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的环境。三是抓团结抓作风，文联要搞五湖四海。

这些话深深印在陆石同志的心里。

他来到文联办公地点，正像周扬同志说的，大家果然在四面透风的防震棚木板房里办公，冬天炉子生起来满屋烟尘，有的同志无住房，就在这样房子里过夜。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一头扎进了“先造窝儿”的基建工作中。他带领刘宗学、刘广志二同志，跑地皮立项目，向上打报告申请资金，在文联正副主席周扬、阳翰笙、夏衍同志支持下，文联办公厅的同志们群策群力，盖大楼宿舍，为全国文艺界修建文艺之家。陆石同志作为党组成员和书记处书记，还分管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带团出访，接待外宾，同时参加筹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事情。那个时候，他是超负荷的工作。我曾问他，你放弃业务、放弃文学创作，从公安部到穷文联作这些繁杂的行政工作后悔不后悔，陆石同志回答说“后悔啥子嘛，来文联就是为文艺界服务的。”

他真是文艺界的老黄牛！

二

陆石同志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对年轻人的教育乃至批评，都是满腔赤诚。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好多年，深为他这种爱护后辈的精神所感动。我们做事常常有些马虎，字也写得了草。他教育我们好好练字，中国的方块字要写好也不容易。他说写公文，字要写得工整。他还告诉我

们，称呼人不要直着嗓子大叫大嚷，更不要没大没小的直呼其名，要加上同志，要讲礼貌。他是手把手地教育和指导我们这些晚辈、部下。在讨论一些问题时，下边同志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有争论也有交锋，同志们敢于同他争论，他从不以势压人，也不给人“穿小鞋”，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为年轻人说公道话。在陆石同志领导下，同志们心情舒畅，有安全感。我们有什么苦恼都敢向他吐一吐，有高兴的事也愿向他说一说。所以陆石有许多同龄的朋友，也有许多忘年之交。

有一次，上级机关召开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陆石自然也出席了这个会。大家都畅所欲言地谈论问题。有位权威人士讲着讲着，讲到了当前年轻人的思想问题，他批评这不好那不对，无一不是。甚至想去香港也是大逆不道。陆石同志听着觉得不对味儿，忍不住的冒了火，他仗义执言反驳对方说：“你说年轻人这不好那不对，你了解他们的困难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你官大工资高，不愁吃不愁穿，应该帮助他们，而不是指责他们。你这样作对吗？”他还批评对方待人平等不民主，奉劝对方不要搞封建家长制。

陆石一席话，使全体与会者瞠目。

不久这事传到了大画家黄永玉耳中，黄永玉觉得陆石敢于直言碰硬，胆子不小，便想认识他。中央美院的劳丁同志认识陆石也认识黄永玉，由劳丁介绍，他俩就认识了，后来成了好朋友。1983年春节陆石去看黄永玉，黄永玉正在作画，陆石进门时，他的画笔刚落。陆石走近一看，画的是一位长者，盘腿而坐，手指前方像在说什么。只见画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说说做做做做说说不做不说说了就做说了不做不如不说做了不说等于说了。”

黄永玉说这几句话是他的座右铭。

陆石觉得这几句类似绕口令的话很富有哲理，意味深长，很有意思。

“你喜欢吗？”黄永玉问。

“喜欢。”陆石答道。

“你喜欢就送给你吧。”黄永玉马上提笔落

款：陆石兄年喜，癸亥春日。这画就挂到了陆石家的客厅里了。

陆石确实做得很多，但他从不说自己。

三

经过几年努力，文联有了十几层的办公楼，随之修建了设备齐全的演出礼堂。为全国文艺界修建的几处文艺之家也运行了。这种交流经验，繁荣创作的场所深受艺术家们的欢迎。陆石同志看到同志们不仅有了办公地点，还解决了一些同志的住房问题，他心里舒坦了。

陆石同志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和尊敬。他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1939年入党，曾在中共南川特支（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后来他去了延安。1943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康生诬陷四川党组织是“红旗党”，陆石被说成是“内奸”，停止了他的党籍。陆石在这种情况下曾以诗言志：“人生天地间，无私则不辱，其柔在其血，其刚在其骨。”由此可见他的铮铮铁骨。李克农同志知道他被冤枉，乃设法分配他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两年后，陆石同志才得以平反。在被诬陷的九年中，他顶着压力，仍然笔耕不辍，写了《动员起来》秧歌剧，曾获陕甘宁边区一等奖。《赶猪》演出后，曾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赞扬。

不料，60年代“文革”又起，林彪、江青一伙砸烂公检法，公安部也成为砸烂的对象。陆石成了黑帮，被批斗关牛棚，1969年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落户，真是难见天日了。然而陆石并不悲观，他写道“落户笔架山，冰雪冻三月，苍松暖人心，草木知冷热”。

过了几年，他奉命回到了公安部，老友李国璋约陆石、赵中夫妇去他家观画，画的是四只螃蟹，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们心照不宣，老友请他为画题诗，陆石即席赋诗一首：“李君胸怀荡荡然，嬉笑怒骂披心肝，三人冷眼斥螃蟹，看你横行能几天。”

从这里看到了陆石对“四人帮”的愤怒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念。果然，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打倒“四人帮”的胜利。

四

最近几年，他退居二线，仍以书法家协会顾问的身份关心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他以惊人的毅力用书法艺术抒发胸怀赞美祖国。他的夫人赵中为他铺好宣纸，他用手摸摸大小，悬肘书写，挥洒自如，写出的字如行云流水，舒展飘逸。在这时刻，你怎么也不会相信他已经双目失明了。

我有幸得到他赠给我的一幅字，由于我知识浅薄，不知他书写的诗出自何处，便电话请教。陆石同志说：“它的出处你是找不到的，那是我自己写的。”接着他用浓重的四川腔念了出来：“翰海汇百满，霜毫行云边，万类多风采，留意写江山。”

电话里当然还要讲点别的。最后他说：“你就留意写江山吧！”

没想到这是陆石前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这年的九月九日，当陆石同志安卧在鲜花丛中时，我真切地感到这位德高艺深的前辈走了，不觉潸然泪下。

在陆石同志遗体告别会上，来了那么多人，告别厅内外挂满了挽联，吊念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国内外不少团体和友人打电报发传真吊念，他们为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而悲痛。

著名书法家沈鹏悼念陆石同志的诗，足以说明了陆石同志的人品和他的晚境：

老马玄黄笔未停，目盲书迹播心声。

混茫颠倒千般事，历历胸前战士情。

（责任编辑 致 中）

更正

本刊七期 27 页邝继勋照片说明有错，应“曾任红六军军长，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1933 年 6 月被错杀于四川通江洪口场”。

编辑部

中国第一位 女导演王苹

□ 李秀清

一

1984年4月6日，首都文艺界在新侨饭店集会，纪念已故作家宋之的70诞辰。作为亡者的夫人和纪念会讲话的主角之一，王苹手扶话筒，话刚开了个头：“我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下边的话便戛然而止，惟有细细的抽泣。霎时，台上台下的夏衍、艾青、张光年、冯牧等诸多文艺界名流和数百名各界人士，都屏声静气，整个大厅为之凝固，好像一部电影正在“定格”。

我是作为新华社记者来报道这个纪念会的。我望着这位白发老人，疑惑了：这个创造了一个个艺术奇迹的女强人，为什么竟会在肃穆的大庭广众之中唏嘘难持？难道，在她事业的巨大成功的辉煌里也埋藏着浩如烟海的凄凉？

我猜测，我不解，举着手中的笔久久难落。

为了解开我脑海里化不开的谜，在那一天我写完了报道之后，便有了追踪采访的行动。

二

时至晚秋，一个有云的上午，我按预约的时间准时摁响了王苹导演家的门铃。

进屋后，我打量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住宅：屋在八一厂一座三层宿舍楼的最高处，会客室兼

吃饭、看电视多用，天花板上装有普通灯管，地板是普通水泥铺就，沿墙放着两个简易旧沙发，一个折叠圆桌，一个70年代初的廉价酒柜，酒柜上一个暖瓶、几个茶杯，墙角里一个立式电扇，旁边有台罩着套的普通电视机，靠南窗的墙上挂一幅国画，画下是一盆君子兰。一间十六七平方米的房子，好像话剧舞台，那些摆设只不过是几件道具，留下了充分的表演区。睹此我不必问就知道，王苹老人是一位不愿为生活所累而把生命的空间尽可能多地腾给事业的人。

开篇伊始，老人就把我带向了她的家乡秦淮河。

三

秦淮河，石头城，被古往今来的诗人唱了千万遍，总是美的。王苹说，她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女岁月。

她生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小康之家。她原名不叫王苹，而叫王光珍。因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排行老四，但乳名不叫“四”却叫“毛五”。日夜不息的秦淮河就在她家的窗下流过。当卖汤圆或卖酒酿的小船欸乃划来，她和姐姐便打开窗户，用竹竿挑出一个篮子，里边放上足够的钱，一坛子美美的酒酿或香甜的汤圆就提上来了。接着，姐妹几个嘻嘻哈哈，分而食



1975年王苹在长城

之。

她家，除了哥哥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两个姐姐都从业较早，一个是幼稚园的音乐老师，一个是小学的体育教员。王苹受姐姐们影响，文艺体育皆有所长。因此，体育运动塑造了她健美的体魄，艺术爱好培养了她表演的灵性。当她上中学的时候，就与瞿白音、舒强、水华等一批左联剧盟分会的青年成员悄悄展开了进步话剧活动。

1934年，她从省立南京中等师范毕业，应聘到市立兴中门中心小学当教员，月薪40元，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到了新年，为了避开熟人的耳目，她隐去王光珍的真名，而以“王苹”为艺名，在南京市中心的陶陶大戏院公开演出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扮演了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意想不到的，这样一个反抗旧势力的外国女性的艺术形象，竟在封建主义统治的旧中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小学校长闻讯专门购票看了戏，回来便怒不可遏地以“有伤风化、不能为人师表”为由，坚决地辞退了王苹。紧随其后，国民党教育局严词指令南京各校，今后一律不准录用王苹。刚刚迈入社会就被逼得退到家庭的王苹，又被忠于旧礼教的父亲锁进了小阁楼，不准离家一步。为了尽快消除“家门之不幸”，父亲又硬逼着才19岁的王苹嫁为商人妇。双倍的打击，上了重锁的禁闭，没能使王苹屈服。她拚命尖叫，用头去撞墙，不吃不喝，以死来抗争。

消息传到社会，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和广

大群众或写信或发电或登报，纷纷声援王苹，并在各报纸上展开了“娜拉与妇女自学”的反封建大讨论。王苹被群众的支持所鼓舞，勇敢地在南京《新民晚报》上发表了致南京人民公开信，坚定宣告：“我失业了，但是我的意志已经加倍坚强起来……我将永远地在戏剧的舞台上及人生的舞台上学习！”

当1935年新春的鞭炮点响的时候，王苹从囚禁的小阁楼里被放了出来。接着，王苹学娜拉出走的榜样，趁大年初一的茫茫大雪，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了家门，逃离了南京，游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大海。

四

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无处不张着黑暗的陷阱，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孤零零地如何谋生？

王苹冒雪进了深山。借朋友之助，在一个叫铜山的地方谋得一个教书的位子。阳春3月，朋友们决定在南京重演“娜拉”。然而早已闻讯的反动当局包围了大家聚会的太平路环球饭店，抓走了瞿白音、舒强等一批艺术青年，而水华等乘乱逃脱。这次幸免于难的王苹又跑回了山村，从此时起，王苹就学着如何巧妙地跟各种反动势力周旋了。

秋凉了，北雁南飞，而王苹却离南北去。经左联介绍，她去北平找宋之的，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工作。

早晨的前门火车站是清冷的。当站台上的人被秋风吹光了，举目无亲的王苹才出了站，要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石驸马大街旅馆。她推门而进，见宋之的还在床上熟睡，房里的一切乱糟糟的。

宋之的，大王苹2岁，河北丰润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同乡，农家子弟。中学时爱唱京剧，被誉称“小梅兰芳”。17岁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积极从事左联戏剧运动，曾因参加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抗日而坐牢。性格豪爽，待人纯厚、兼演员与剧作于一身的宋之的，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无限生涯》，当时的西北影业公司要拍，王苹就是被推荐来任其中女主角的。同

时担任角色的还有后来都成为艺术明星的蓝马、田方等人。

王苹与宋之的是第一次艺术合作，但他俩并非初识，当宋之的几次南下沪宁参加艺术活动时二人就已熟悉了。他们很快联络了戏友，离北京去了太原。几经周折，拍了不少外景，但因阎锡山搞白色恐怖，电影被迫停机。影业公司发不出薪水，阎锡山又天天抓人，大家不得不离晋南返。电影夭折了，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却成熟了。就在1936年春节，大家离开太原的前夕，王苹和宋之的在旅馆里简单地摆了一桌酒席，请几个朋友一聚，二人就算结婚了。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王苹开始了她的电影艺术生涯，而年仅22岁的宋之的一挥而就创造了他的成名之作《1936年春在太原》，引起了轰动，至今仍成为纪实文学的范例。

夫妇二人到了上海，仍以戏剧和电影活动为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王苹生下第一个孩子才半年。她与宋之的满怀抗战救亡的爱国激情，把孩子托咐给无锡的一个保姆，便参加救亡演剧队到内地宣传抗战去了。一路风餐露宿，饥寒无序，宋之的任副队长，王苹又演出又自告奋勇管伙食，一直演到西安，演到武汉。不久江南大片领土沦陷敌手，他们的儿子和奶妈从此再无消息，不知死于敌寇屠刀之下，还是别的变故，直到解放后回江南苦苦去找，也未找到。后来宋之的写了一本书，名为《赐儿集》，纪念此事，以倾失子之痛。

五

王苹、宋之的参加的演剧队结束了宣传，齐集武汉，有两条去向供他们选择：一条去延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条去重庆，那是国民党政府即将去定居的陪都。

后来成为艺术大家的崔嵬等人高兴地去了延安，再后来的冼星海也到了延安，并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巨作《黄河大合唱》。王苹和宋之的也是想去延安的，但是周恩来从革命宣传大局考虑，建议他们去重庆，到抗战的大后方开展进步戏剧运动。

执行党的指示，王苹、宋之的等一批年轻人去了重庆。从此王苹就开始了她长达十年之久的“国统区”、敌战区的严酷斗争生活。

重庆的进步戏剧运动正蓬勃地开展着，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向共产党人开了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王苹与这批文化人不得已悄悄地撤出重庆，去了香港，想在那个“牢固”的后方继续开展进步戏剧运动。

不想，就在这一年的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疯狂至极的日本侵略者又攻占了香港。包括王苹在内的香港一大批文化人，又不得不撤离香港。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香港文化人大逃亡”。

其时，王苹的大女儿才一岁多，丈夫宋之的正害着重病。炮火下逃亡，尽可能轻装，但王苹

背上要背着女儿，双手要扶着颤颤欲倒的丈夫。所幸的是，她的一家三口与邹韬奋、茅盾、丁聪等作伴，趁着茫茫夜色，坐租船偷渡过了海，又混在黑压压的逃难人群之中，越过了深圳河，终于进入了我东江游击队的活动区。

遵照党的指示，她与宋之的离开东江，又到了重庆。抗战胜利了，又回到上海。

内战爆发在即，中国的命运将见分晓。1946年夏天，宋之的潜出了上海，去了新四军。为了掩护自己和孩子，王苹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与宋之的离婚的假声明。但她却暗地里支持着宋之的的工作，为新四军购物买药。随



1935年王苹演娜拉时剧照

着蒋家王朝的覆灭之日临近，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在1948年冬天，当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再一次“大逃亡”的时候，上了反动派黑名单的王苹这一次决计彻底抛弃“后方”的生活，不去香港，而去华北解放区了。

由组织给她买了去北平的飞机票，并与北平的地下组织做好了联系。上飞机之前，她特意买了华贵的皮衣服，把自己打扮成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而把两个女儿打扮成阔小姐。但到了北平，由接应的同志安排，第二天母女三人又脱去了皮大衣，擦去了脂粉，换上了从天桥买来的破棉袄，到天津换了“良民证”，便坐火车直奔陈官屯。当时她的大女儿宋时才9岁，二女儿宋密才6岁。两个孩子不解地问王苹：“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为什么一会儿那么阔，一会儿又这么穷？”王苹严厉地嘱咐她们：“我带你们去演戏，到时候不要说话，只管跟着我走！”

火车到了陈官屯，下车去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带路的交通员嘱咐她们：“尽量少说话。”出境的百姓都排着队，鱼贯而行，国民党兵凶神恶煞地挨个检查。轮到了王苹母女，那兵伸手把王苹手中的网兜夺了过去，“嚓嚓”就是几刺刀，把网兜里的棉被子豁开，只见破布烂絮，一无所有。王苹忍不住庆幸地多说了几句话：“老总，说你不信，你看就是一床破被子，什么也没有。”那兵听了把眼一翻，抡起巴掌照着王苹腮上狠狠地一搨，“啪——”。牵着妈妈衣角的两个孩子吓得“哇”一声哭起来。

王苹身材高大，又有一张不同于一般劳动妇女的过于白皙的脸，还有文化人的那股特有气质，但是我们不知道她靠一身破棉衣，用什么演艺技巧骗过了国民党兵的严密检查，不露破绽地带领孩子闯过了鬼门关。当时带路的交通员和同行的《大公报》记者杨刚都为她母女捏着一把汗。

过了封锁线，雇上马车，连夜赶路到了已解放了的华北重镇石家庄。母女三人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又脱下了破棉衣，换上了中山装，还戴上了解放帽。这时两个孩子又都高兴地唱起来了。接着由于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照，王苹立

即到华北大三部去工作。不久，随东北野战军到了天津的宋之的听到了消息，便赶至石家庄，分别了三年的一家子欢乐地团聚了。

六

新中国成立，一切从头开始。

解放前王苹是戏剧和电影的两栖演员，像《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许多著名电影里都有她扮演的形象。因此，建国后党选择了她当导演，开辟电影事业。

从此，事业的辉煌和命运的致命打击始终伴随着这位善良而坚强的女性。

《河川进攻》，是王苹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内容是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人民解放军的三军联合实弹大演习。虽然故事性弱，军事教育的内容多，然而由刘伯承元帅亲自指挥并在其中担任角色，场面宏大，调动着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千军万马，这对于没当过兵，也没打过仗的王苹来说，其困难不亚于泰山压顶。但王苹以她好学的精神，坚强的毅力，竟然指挥着20个摄影队，山山水水追逐着演习的战车和炮火，圆满地完成了拍摄和制作任务，受到了刘伯承和总部的高度评价。谈及这部“处女作”，王苹老人今天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她说：“那时我才30多岁，第一炮打响，还受到了表扬，为我以后当导演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她被调去，接手了八一厂开天辟地第一部故事片的任务。然而这部叫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电影刚刚露出成功的曙光的时候，王苹个人命运的黑暗却蒙头扑来，几乎断送了她刚刚展开的电影导演的艺术生命。

1956年春4月，王苹与宋之的结婚20周年刚过，王苹正在外景地赶任务，突然传来消息，说宋之的病危，要她赶紧回京。但是当她赶到北京医院的时候，宋之的早已停止了呼吸。

宋之的患的是肝癌，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去世，只42岁年纪。他身后是4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几个月。20年患难与共的深情，照料儿女的家庭重负，中年丧夫后的人

生之旅，这一切都压在了王苹一人的肩上。王苹不掩饰当年的悲痛，凄然地对我说：“这是我一生遭遇的第一次致命的打击，我真有点不想活了。”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她或者不吃不喝，把房门关紧，把窗帘拉上，整日在黑屋子里哭泣；或者丢了魂似地一次次地跑到八宝山，坐在宋之的坟前，对着墓碑，一遍又一遍说着让死者听的话。那墓碑上有她请人制模烧铸的铜像，像模由她精心地保护着。“文革”中曾有人把铜像毁掉了，她又铸一个挂上去。

停转了的电影摄影机，谁能让它转起来？沉浸在苦海里的王苹，谁能把她救上岸？王苹老人从过去的痛苦里抬起头来，捋一下头发，对我说：“那时有人救。”

当时她还住在城里和平门一带的一个四合院里。一天，八一厂厂长陈播来了，推门进屋，见了哭哭啼啼的王苹就大吼：“王苹，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王苹抬头回答。

“是？是就跟我走！”

说罢，不由分说，陈播架起王苹，推进了吉普车，一溜烟拉到了正在紧张拍摄的摄影棚里。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的呐喊，就使王苹和她的第一部故事片都“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走上了胜利的坦途。紧接其后，第二年王苹就完成了至今还常映不衰的《柳堡的故事》。继此，马不停蹄，王苹玩命地一路呼啸，鞭梢上甩出了一串串艺术之花：《江山多娇》、《永不消失的电波》、《勐垵沙》……

七

当老人向我讲述了她如何冲过了人生的“第一次致命打击”，她在胜利的兴奋里还没有完全静下来，我便接话茬问道：“老人家，你说的第二次打击是什么？”

可能是我问的不是时候，也不清楚老人患有严重心脏病。当我的提问一出，我看老人那原来格外白净如雪的脸膛立即涨得像一张红布，两眼喷“火”，浑身发抖，“呼”的一声从沙发上站

起来，像一头怒狮要拚咬突然而至的仇敌。我非常吃惊。我深怕有个什么意外，忙站起来想去搀扶一下老人。但老人挥一下手，让我坐下，她没有发怒地吼叫，也没有像惯常盛怒者那样拍案子打板凳地发泄和狂走，而是急忙把桌子上的药瓶子打开，狼吞虎咽地吞下几粒药丸，接着又仰头喝下一杯水。

老人终于慢慢镇静下来，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我再也不敢正面去问这个“第二次打击”的事了。我猜知，那肯定是老人比失去了亲人还要致命的打击。古稀之岁，高血压心脏病，老人再经不起狂喜和狂怒的刺激了。

以后我又继续访问过老人两次，每次我都把时间限制在一个小时之内，以免老人劳神，而且决不提老人伤心的事。

就在插三插四、漫不经心地交谈中，老人还是向我透露了她所受的“第二次打击”的大概。

事情的严重性因“红都女皇”江青而起。

1936年王苹随宋之的到了上海，不久就认识了也在演艺界的江青，但没有更多的交往，只不过同台演过那么一出替人顶班的戏。这戏就是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话剧《大雷雨》。本来剧中的婆婆卡巴诺娃由舒绣文扮演，但她病了，便由王苹顶上。当时名叫蓝苹的江青扮演其中的女主角——卡巴诺娃的儿媳卡捷琳娜。同台演出的还有赵丹、郑君里等人。在剧中，王苹与江青组成了婆媳关系，媳妇被婆婆折磨得死去活来。想不到，这场舞台上的假戏，在30年后却成了生活中的真戏，在政治运动中变成了“小媳妇”的王苹，险些熬不过“婆婆”的真实的棍棒交加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最后她虽然保全了一条生命，但留下了一身疾病，烤白了原来一头浓密的黑发。

1966年“文革”一起，王苹与一切有成就的文化人一样成了最早的一批受罪羊。她开始还在农村搞“四清”，很快被“揪”回来批斗，什么“二流堂成员”、“黑线人物”、“反动权威”、“三名三高鼓吹者”等等，一件件黑袍加身，把她打入了生命的第二次“黑牢”。而要她命的是，她的一本日记被抄家的人抄走了。那里记着她导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时见到江青的一段

话。她本来很淡地写道：江青做了主席夫人，跟过去不一样了，仅此而已。但是如获至宝的“造反派”就一下子把她升级为反对“文化革命旗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加强了严酷的“专政”。而江青也公开点她的名陷害：“宋之的在苏州坐过牢，是叛徒。王苹是叛徒的老婆。”从此王苹作为“黑帮”，被关进了八一厂原来洗印保密片的终日不见阳光的黑房子里。这样一关就是三年。每顿饭只是一个粗粮窝窝头。别人可能吃不饱，而愁苦的她一天只能吃一个，剩下两个吃不了。一次她不小心，把吃剩的窝头扔了，被“造反派”看到，立即遭一顿毒打。以后吃剩的不敢扔了，风干了，又搓成末子泡进水里再吃。除了无休止的羞辱人格的“批斗”，还要“劳改”。她是不吃猪肉的回民，却硬逼她去喂猪，另外还让她干一些妇女难以胜任的重体力活。黑牢里使她最揪心的还有，她的才9岁的小女儿宋昭，从小没爸，妈又在坐牢，哥哥姐姐又都上山下乡，抛下她一个人东游西逛，饥寒无人管。就在这样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折磨下，王苹原来146斤的体重，很快减到了99斤，只是一身骨架，血压却升到了200多，而一头黑发变如霜雪。此时50岁刚出头的王苹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谈到这里黯然心伤地说：“我第一次受打击还有人救，这时没有人来救了！”那时当年曾“救”她的老领导老战友也都被关起来了，还有的就跟她一样被关在黑房子里，也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受羞辱。

谈到“文革”的灾难，我怕老人再激动引起血压升高，或发生不测，我除了及时把话题引开，还故意说句笑话，化解一下情绪。我说：“王导演，您比伍子胥强，他沉不住气，一夜就愁得白了头发，您老人家3年才愁白了头发，您气量比伍子胥大。”老人听了果然轻松地一笑，说：“我性格特别好强。我不服气，我想不通。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怎么会反党呢？我总想，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她又说：“看我当时的样子，好多同志认为我过不了这一关。但我后来想开了，也不愁，也不怕了。后来被拉到山西高显农村去‘改造’，我能吃能睡，竟能用小推车推一

千斤重了。后来又被拉回北京，不让进家，只住棚子，参加工地监督劳动，我又学会了锯木头、油漆、种茄子白菜了……”

道家的鼻祖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又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万物得一以生……”当年，19岁的王苹是以必死的决心砸开禁闭她的铁索及封建主义的。而30多年后，步入老年的王苹是以大彻大悟的不枉死的决心战胜了几难抗拒的“第二次打击”，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然而，毕竟历史的灾难在她身上割下的伤口太重，她那颗艺术家的心脏总是容易激动，以致于我没能够也不敢让老人去详详细细讲透她受的那场灾难，和那段战胜自我终于死里逃生的心理历程。要想详细了解老人，只能以待机会了。

八

我所等待的机会还没有来，因为任务的转换，我为老人写的文章也还没有写。1990年12月底，突然看到了王苹老人去世的消息，我懵了。急惶惶给八一厂熟人打电话，说遗体告别仪式早已举行数日了。

老人去世时才74岁。我知道，如不是那场提起来就使她气得发抖的“第二次打击”，论她天生的体质，凭她旺盛的精神，她的生命绝不会停留在74岁这个常人寿命的平均值上。后来我知道，老人对此也是不甘心的。她在病榻上，对来看望她的一切老战友老姐妹都表达着这一不甘心的痛苦。著名女作家凤子去医院看她，她含着眼泪，撕心裂肺般地说：“凤子！我走得好苦啊！”闻此，凤子哭了，大家哭了。

王苹老人，我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一位不屈不挠地拼搏了一生的革命艺术家，像天上的一颗巨星，像西下的满月，闪着耀眼的光辉，带着彻骨的痛苦，无可挽回地殒落了。听说，她的小女儿宋昭又不畏艰险走上了影视导演的岗位。但愿她能女承母业，再托起一颗明亮的月亮。

（责任编辑 致 中）

来自无锡的经济学家陈翰笙

□ 邓加荣

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张锡昌、王寅生、孙晓村、秦柳方、陈洪进等人皆是无锡人。其中，陈翰笙被称之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薛暮桥、孙冶方被称为我国经济学界的“四大名旦”（另两位是许涤新和于光远）；钱俊瑞因在农村经济调查方法方面有过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曾两次就此问题找他谈过话；王寅生、孙晓村、秦柳方、张锡昌等人也都是经济学界的巨擘。

这种奇迹的出现并非偶然，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自然资源优越，社会经济开放早，米、布、丝、银四大市场早已闻名于世。时称小上海。

由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教育培养这方面人才便成为客观的急需，当时，发展这项教育事业最有力的便是荣氏家族。荣德生先后办起了公益小学和公益工商中学，就其规模和教学质量来说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不仅开设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应用力学、制图学、机械制造原理等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课程，而且还附设工厂、商店、农场、小银行等，以便于学生实习。小学制六年，中学制四年，收费低廉，适合于平民子弟入学，几十年来，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薛永辉、孙冶方、钱伟长、徐仁峰等都曾求学于这里。此外，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实业中学、马可中学、辅仁中学等也都属此类教育机构，秦邦宪、薛暮桥、钱俊瑞、张锡昌、王寅生等皆毕业于这些学校。

从历史的机遇来看，创造这个成因的关键性人物是陈翰笙。

陈翰笙，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在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因受到李大钊和蔡和森的影响，立志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经李大钊的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国际，经常为共产国际的刊物写些经济评论文章。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有人认为第三国际没有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因而没有能够制订出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才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邀请陈翰笙到莫斯科工作。

在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里，集中了一大批有声望的专家学者，像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沃斯涅辛斯基、瓦尔加·魏道夫，匈牙利的马季亚尔等，这些学者精通马列，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惯于从书本里来到书本里去，做概念推导式的理论研究，而不注重实地调查。他们认为：“在20世纪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后，中国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农村也是资本主义的农村。”匈牙利的马季亚尔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名词——“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时间，人人都在谈论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名词。

为了破除这一理论误区，陈翰笙与马季亚尔进行了一系列的争辩，虽然从理论上做出了某些评述，但是陈翰笙深感自己对于中国农村情况只限于一般的了解，缺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在莫斯科只住了一年，便毅然返回中国，下决心

补上实地调查研究这一堂课。

回国后，他便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担任社会学研究所副主任（主任由蔡元培兼），他找来许多进步青年，一边为他们讲解和辅导《资本论》，一边组织他们去农村做社会经济调查。在这些进步青年中，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王寅生、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张锡昌、姜君宸、秦柳方、张稼夫、孙晓村、吴大琨、千家驹、陈洪进、徐雪寒、骆耕漠、狄超白、冯和法、石西民等人。

1929年春，陈翰笙在家乡无锡县的东吴塘、小房巷、龚巷等22个自然村，选择1204户农家作为调查对象，参加调查的45人分为五个小组，由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刘瑞生分别担任组长，陈翰笙担任调查团长。他们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挨门挨户进行浩繁的调查工作，这在当时文化落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创举，经常遇到一些土豪劣绅和顽固分子的刁难、阻挠。当时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特地下乡来采访和报道了此项活动。

无锡调查后，他们又进行了保定调查，选择了清苑县10个自然村1578户农家作调查对象；1933年11月—1934年5月，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在广东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农村经济调查，选择了番禺县69个村庄10321户作调查对象，还用通信方式调查了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等38个县335个村庄。

后来，他们依据这些大量的实地调查材料，在陈翰笙的组织下分头写出了一系列理论文章，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科学地、准确地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指出当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陈翰笙所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所产生的强烈反响，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注意，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将陈翰笙等人从中央研究院里排挤出去。陈翰笙重新集聚力量，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利用这个民间组织作为阵地，继续开展中国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研究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中国农村》，编辑部由薛暮桥、张锡昌、陈洪进三人负责，后来，孙冶方也进来协助并主持工作。

《中国农村》从1934年10月创刊起，一直到



102岁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陈翰笙

1943年5月止，共出版发行了近百期，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里发行时间最长的、影响颇大的一个理论刊物。这个刊物发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而且，也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用革命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有许多人就是由于阅读《中国农村》而参加了革命，走进了经济学领域。

由于《中国农村》的影响日益增大，吸引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里来的会员越来越多，为了更进一步地扩大理论研究阵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他们又创办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和“文化资料供应社”，还编印出版《中国经济年报》和《中国经济半年报》。此外，他们在《中华日报》上，又定期地出刊《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和《世界经济情报周刊》。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们又自己筹资开办了“新知书店”。新知书店出的书很多，很受读者欢迎，常常是一本书刚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解放后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读书书店合并，组成了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三联书店。

就这样，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根据地”，结成了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团体，起名“X”团体。这个“X”团体，便成了我国当代经济学家的摇篮。

（责任编辑 仲文）

蒋介石三度 拟出兵朝鲜

□ 张明金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南北朝鲜的双方军队，在三八线上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日上午6时，朝鲜人民军大举反击，在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对瓮津、开城、议山、春川等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并在江陵以南施行两栖登陆。上午9时，守备瓮津、开城的南朝鲜步兵第一师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后，放弃瓮津和开城，春川也陷入重围。南朝鲜总统李承晚马上通过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向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发出紧急求援的密电。

6月25日中午，蒋介石获悉后，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陈诚、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张群、吴国桢、俞大维、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等人，召开紧急军政会议。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紧急备战。台湾当局还动员居民普遍构筑防空掩体，安置防空窗帘，设置对空监视警戒岗哨，实行灯火管制，进行防空预习，使本来已经人心惶惶的台湾，一下子变得更加恐慌动荡了。当时许多有钱的人家，纷纷把他们的资产向外国转移，并举家外迁。

针对朝鲜战况的发展趋势，驻日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交给杜鲁门总统。该计划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 1、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
- 2、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
- 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
- 4、保卫日本的安全。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请求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派出1个军驰援南朝鲜。

6月25日中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后，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彭孟緝、肖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人再次到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等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参战这是反攻大陆的一个天赐良机，到时可以借助美军的力量，由南朝鲜北进大陆，先在东北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在东南沿海相机发起反攻大陆的作战。因此，蒋介石等人根据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的请求，决定派遣其王牌第五十二军3.3万人前往增援南朝鲜。

6月27日晨，周至柔、孙立人、肖毅肃、刘玉章、郭永等人继续开会研究向朝鲜半岛出兵的实施方案。当天下午，孙立人在台北陆军总司令部小会议室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蒋介石关于派第五十二军前往参加朝鲜战争的指

示，并决定由郭永任军长，王楚英任参谋长，并具体负责做好第五十二军准备派往南朝鲜参加朝鲜战争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一幅朝鲜半岛的大挂图前，孙立人用指示杆在地图上向与会的人员说明朝鲜半岛的当前的态势：目前北朝鲜已投入了9个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步兵师，在苏制新式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进攻瓮津、开城地区，歼灭了南朝鲜第一师，在春川、江陵击溃了南朝鲜第七师，现正集中3个师猛攻汉城，另以诸兵种联合纵队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汉城、春川之间的杨平附近击溃了南朝鲜第六师，正强渡汉江南下，企图夺取水原，切断汉城的退路；在东线的北朝鲜军约3到4个师正向原州围攻，此刻正在柳洞里、长坪里、平昌之线激战中。南朝鲜政府已由汉城向大丘撤退，金浦机场已被北朝鲜军炮火封锁，汉城可能被迫放弃。守卫汉城的南朝鲜第三、第五师已陷入重围；南朝鲜的第二军主力正在竹山里、长湖院、忠州、丹阳、莱州之线赶建第二线阵地。看来汉城、原州将不保，其第二线阵地恐怕也难阻挡北朝鲜军的进攻。

孙立人在分析南朝鲜招致这样迅速惨败的原因时指出：一是战前，南朝鲜只有7个师共约8.5万人，既缺乏坦克和炮兵，更无空军，战争爆发后制空权一直掌握在北朝鲜人的手中；而北朝鲜军战前已达20余万，三倍于南朝鲜，且装备着苏制新式的坦克和重炮，部队训练有素，官兵政治信念坚强，士气高昂，作战勇敢，不但兵员数量远远超过南朝鲜，而且火力和士气也占绝对优势。二是北朝鲜军在作战中善于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利用南朝鲜兵力分散和空隙多的弱点，使用钻隙迂回的方法，各个包围南朝鲜分散孤立的部队，予以各个击破或者就地歼灭。三是北朝鲜在南朝鲜的后方，进行着威力强大的游击战，在汉江以南，锦江及洛东江两岸，游击队十分活跃，给南朝鲜的交通、通讯和军需补给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使南朝鲜军队时时处于前后受敌之中。四是美国的支援很不及时，且很不得力。

在谈到此处时，孙立人便当着所有与会人员的面，极为不满的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

美国政府拿朝鲜人的生命进行政治赌博，是一种最愚蠢的可耻的儿戏，但是我敢断定这绝不是麦克阿瑟和五角大楼（即美国军方）的主张。最后，孙立人传达了蒋介石对朝鲜战争及台湾出兵朝鲜的五点指示，其内容要点如下：

基于台湾对“大韩民国”的义务和共同利益的需要，应李承晚总统的请求，决定派遣第五十二军前往增援。其第十三师已由马祖启航回台归还第五十二军建制。该军应于两日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并先以一个团集中于松山机场待命出发。

第五十二军到达朝鲜战场后受麦克阿瑟将军直接指挥，并受他派驻南朝鲜的代表的节制，特派侯腾、陈麓华、侯程达、王楚英四人组成“先遣参谋团”即日飞往釜山，同美、韩双方商定第五十二军参战的有关各项问题。

“联勤总部”应立即向第五十二军提供军需物资，要求补给到连。“国防部”应向第五十二军补充急需的技术人员和作战官兵、政工干部等。

28日下午，五十二军军部召开营以上的军官会议，传达了蒋介石、孙立人等人的指示，并请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介绍了朝鲜战场情况。

费尔德说：南朝鲜目前残存的部队不足5万人，而北朝鲜军已有10余万人，兵力超过南朝鲜三倍，火力和士气更占优势，如果没有台湾军队的及时增援，又不能从日本调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南朝鲜的下一步局势将是悲观的。



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美军第七舰队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6日在布莱尔大厦召集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开会，研究有关朝鲜半岛战争局势。会上杜鲁门第一次听到关于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部署考虑，都积极主张总统杜鲁门接受麦克阿瑟的建议。杜鲁门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美国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我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建议联合国发出这样的号召并组织这样的行动。”

但是，迟迟不肯表态的国务卿艾奇逊，在总统表态过后却发表了坚决反对的意见：“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对此，麦克阿瑟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不顾中共的极力反对，决定派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去保卫那个岛屿，现在怎么反而叫这个岛上的受保护者跑到别处去保护别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比南朝鲜的军队强到哪里去。即便是让蒋介石的军队去，也还需要我们给他们换上全套装备。这样做莫不如把这些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

国防部长约翰逊当然要站在麦克阿瑟的这一边，他马上进行辩解：“阁下的意见我不能苟同。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阵容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小看我们的这位盟友。况且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第五十二军是台湾的最精锐的部队，也是蒋介石在满洲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因此，我认为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抽第五十二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

对此艾奇逊毫不退让：“这恰恰说明了阁下的短视，只是看见了朝鲜半岛的局部利益，而没有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战备格局考虑问题。如果说总统阁下批准了福摩萨（即台湾）出兵参加朝鲜半岛的战争，将有可能激怒人口众多的中国，引发新的战争，到那时我们美国将会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同时面临两个地区的战争，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的解决，而且极有可能危及福摩萨的安全，岂不是正应了中国人的一

句老话：逐两兔者难得一兔。”

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6月27日，正在南朝鲜战场上视察的麦克阿瑟，目睹了南朝鲜军队一败涂地的惨状，便再次致电杜鲁门，请求批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但是，大胆的艾奇逊却将麦克阿瑟的电报擅自扣压，不仅没有及时向杜鲁门报告，反而继续反对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和“特使”胡适，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请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进一步游说有关国民党要求出兵朝鲜半岛战争的问题，并面交了蒋介石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的副本。

对此，左右为难的杜鲁门面对军界和政界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意见，对国民党派来的“大使”和“特使”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是表示他十分欣赏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进一步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6月29日，麦克阿瑟从朝鲜战场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求从速采纳蒋介石派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建议。当日，由东京回到华盛顿汇报朝鲜战争局势的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

6月29日晚，杜鲁门再次召集国务会议研究关于是否批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问题。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第五十二军，迅速出兵南朝鲜，以遏制北朝鲜军队的攻势作战，而不想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而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现役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下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

可是，大胆而又固执的艾奇逊和国务院的那帮人却坚决反对。艾奇逊用不容置疑的情绪提醒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我提议总统先生和诸位阁下，请你们要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在我们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6月2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声明所发表的声明)。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威胁,而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再说我们美国如果把扭转朝鲜的局势放在蒋介石军队的身上,也将会有损于我们美国在盟国中的地位 and 形象,这是违背美国的传统和民众意志的愚蠢做法……

在艾奇逊的坚决阻挠下,杜鲁门总统最后否决了麦克阿瑟的建议。

当晚,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后,使一向以老自居的麦克阿瑟大为不满,立即致电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斯塔诺德和第十兵团司令官阿尔蒙德等人做好坚持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并用极为不满的语言愤怒地斥责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朝鲜半岛的战争局势的重要,不敢动用国民党中国的武装力量,这是怯懦和愚蠢的表现。他们简直是在讨好共产党,屈从共产党的意志,这是很可耻的。杜鲁门总统曾主张在每个地方狠狠地打击共产党,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现在共产党正在狠狠地打击我们。

麦克阿瑟建议的被否决,导致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于9月20日的愤然辞职,并由此引发了美国国会中一些议员和美国公众猛烈抨击杜鲁门政府,并要求撤换艾奇逊,以谢国人的轩然大波。

6月30日晚上,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最高国策会议,他当着陈诚、王世杰、俞大维、叶公超、吴国桢、周至柔、孙立人、桂永清、王叔铭、黄镇球、彭孟緝、蒋经国等人的面,谴责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华盛顿那帮可恶的东西,显然是患了恐共症和软骨病,完全是在重演当年张伯伦的故伎。美国人肯定要为他们这种愚蠢的作法付出代价。既然他们不肯让我们出兵,那就让他们去吃共产党的苦头吧!”

7月7日,无可奈何的麦克阿瑟又通过约



逃往台湾后的蒋介石不忘复辟梦

翰逊、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陆军部长佩斯等人,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在朝鲜设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派往部队”的决议。在此基础上,7月12日,美国任命第八军军长瓦尔顿·沃克中将建立了联合国军前线的司令部,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

8月初,美国派往朝鲜战场的地面部队已达7个师,另外还有南朝鲜的3个师、英军的1个旅和土耳其、菲律宾、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等国的地面部队共约15万人,由联合国军前线司令部指挥官、美军第八军军长沃克中将统一指挥。

9月15日,美军陆战第一、第七师在仁川登陆,美军第八军的骑兵第一师等部队同时由釜山发起反攻,于9月26日在水原附近会师,9月28日又夺取了汉城。与此同时,美军第十兵团在阿尔蒙德少将的指挥下,由东海岸元山登陆。

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的登陆作战,拦腰截断了北朝鲜人民军,使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开始发生了逆转。

在此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于10月3日发出了严正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

八线,继续北犯,中国将不得不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共同打击侵略者。

麦克阿瑟却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公然发表了“通牒”,要求“北朝鲜立即投降”。随后,麦克阿瑟命令美军第八军沿着朝鲜西海岸线一路北犯,于10月9日侵占了平壤。同时,第十兵团在东线于10月2日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越过清川江和长津湖,兵锋直逼中朝两国边境的界河——鸭绿江,并派出飞机到中朝边境先后炸毁了安东(今丹东,以下同)达新义州、长甸河口达清城郡、上河口达清水镇等几座横跨鸭绿江上的铁路和公路桥梁,并深入到鸭绿江下游的重镇安东和长甸河口等地进行狂轰滥炸,使许多中国平民遭受无辜的伤亡。

在此严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于10月下旬开始与美军展开了血与火的较量,首先在云川给孤军冒进的美军第八军骑兵第一师以迎头痛击。第八军在遭到重创后,仓皇退守清川江一带,东线的第十兵团则龟缩在咸兴、庆兴里地区。

为此,麦克阿瑟在11月28日发给杜鲁门的告急电报中惊呼:“我正面临一次全新的战争,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一切希望都不存在了,中国人简直要想把我的部队全部加以消灭。”

麦克阿瑟为了遏制中朝两国军队的进攻,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的伤亡,再次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 1、紧急从台湾空运一个军增援第八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十兵团向兴南突围;
- 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
- 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大陆,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麦克阿瑟在致电杜鲁门的同时,还致电蒋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第五十二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八军之围,并说明他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舰艇装载着补充第五十二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11月2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

的电报后,不由得喜上心头,略做一番谋划后,当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蒋介石的情绪特别好,他先是洋洋自得地自我吹嘘一番:“我早就说过,美国人必将为他们愚蠢的做法付出代价。今天的处境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以后,才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现在根据麦克阿瑟的请求,我宣布仍然由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

同时,他指派的侯腾、陈麓华、郭永和王楚英四人“先遣参谋团”,于11月29日凌晨飞往汉城。

美第八军副参谋长介绍情况说:目前联合国的兵力不足10万人,而中共进入朝鲜的军队目前已达30余万人,投入战斗的已有26个师,另在东北境内靠近朝鲜边境还集结了20多万人的预备兵团,以满洲为基地的中共各式苏制飞机达300余架,对美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造成了严重威胁,北朝鲜军队的残部已退入满洲进行整补。27日晚东线第十兵团分三路到达清津附近的镜城、白岩和惠山、丰西、长津江附近,即遭到埋伏在那里的中共军队的猛烈狙击,陷入重围,现正沿着东海岸及摩天岭东西麓向咸兴和兴南突围,进展速度甚慢。第八军于28日清晨,分别在狼林山西麓的江界、朔州和盐州等地遭到中共军队的强有力的抵抗和反击,旋即次第被围,经过艰苦的突围战斗后,部队伤亡损失较大,现已退守清川江一线,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整个战局对‘联合国军’不利,急待‘友军’前来增援。”

侯腾等人向柯尔介绍了第五十二军的编制、装备、人员情况、部队素质和战斗经历等,随即就下列问题进行研究并达成协议:

- 1、第五十二军的作战地区在清川江以北,应以一个师空运平壤集中,其余部队海运可在南浦、海州、仁川登陆;
- 2、第五十二军抵朝后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由美方派出联络军官进驻团以上指挥机关,由中方派参谋军官5人参加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工作;
- 3、第五十二军抵朝后的补给由美方负责,按常规办理;
- 4、第五十二军的作战行动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行之,其内部统率管理、指挥调度、部队编组、人事调

动、官兵奖惩由该军长按台湾的规章自行处置，非因作战需要的行动，联合国军事司令部不加以干预；5、第五十二军所需译员自行配备，享受联合国军作战人员待遇。

柯尔和侯腾等人商定的这五条协议，当即得到了联合国军参谋长诺斯德中将的同意。当晚9时，“先遣参谋团”在柯尔的陪同下，由釜山乘飞机到达平壤，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里见到了第八军军长沃克。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侵略朝鲜的美军正在新安州、顺川、新成川、阳德一带进行着激烈战斗。平壤已能听到前方的炮声，街上时有坦克、大炮和运输车急驶而过，市区时有枪声和爆炸声，气氛十分紧张。沃克在他的指挥所里很仔细地询问了第五十二军各方面的情况后，用极其简洁的语言结束了会谈：“你们到朝鲜时，空运和海运着陆地点暂不决定，临时以电报联络，其他的情况按照你们的部署办。”这时已是11月30日凌晨一点了，先遣团便立即飞返台北。

蒋介石在听取汇报中，还详细询问了中共参战部队的番号、有无原国民党投共的军队、现有多少共军战俘、东北境内的兵力情况，美军的现状、南朝鲜二线兵团情况、美方是否同意对第五十二军保持团、师级建制使用等等问题。

散会前，周至柔拿着一封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报告总统，现在已有7艘运输舰、3艘货船开进基隆港，另有30架C-47型运输机已在新竹和松山着陆。第五十二军现在是否可以移师出发。”

蒋介石当即决定：

1、第二师随郭永、王楚英及军指挥所一道空运赴平壤，其余由程、李副军长率领到基隆准备上船；2、由联勤负责接收武器装备并及时向第五十二军换发；3、驻联合国军的参谋军官应包括海空军各一人，由孙总司令选派。

这次麦克阿瑟也是为了蒋介石能够出兵下了大本钱，从日本运来了装备有各种车辆200余辆，各种口径的火炮约千门，各种枪械器材工具约两万余吨，足可装备两个军。第五十二军经过这样一换，装备是彻底美式化了，跃居于台湾各军之首。但是，从12月1日到6日，第五十二

军虽然日夜处于整装待发之中，却迟迟得不到美国方面“恩准”。

原来，这期间在美国方面又为台湾是否出兵南朝鲜一事闹起新的矛盾。

11月28日上午，当麦克阿瑟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消息再次传出后，当日下午，杜鲁门立即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挽回朝鲜半岛败局的问题。

在这次国务会议上，国务卿艾奇逊率先发言表态：我的意见依然没变。现在国内虽然已经无兵可派，但也不能同意蒋介石的军队入朝参战，其理由不再多叙，并建议总统先生，指令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先稳住战局，在军事上守住一条可以守得住的防线，以待美国通过联合国进一步谴责中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本来倾向于蒋介石出兵的杜鲁门，这时又在艾奇逊的提案前妥协了。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这时也害怕在此败战的局势下，再动用蒋介石的军队会由此引起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便开始站在艾奇逊的一边，反对国民党军出兵朝鲜。因此，麦克阿瑟的这次提议又被否决了。

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2月中旬，侵朝美军经过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打击后，美国国内的决策者对朝鲜半岛上爆发的战争已经不再抱有胜利的希望，他们认为，从战备的观点出发，日本列岛的安全比朝鲜半岛更为重要。因此，决定美第八集团军所指挥的30余万部队，一旦朝鲜半岛战况再度危机时，应迅速带上装备撤出朝鲜，全力保卫日本。

麦克阿瑟认为这种结果将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一旦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将会有损美国在联合国中所拥的领导地位，并将由此导致遏制共产党政策的大失败。因此，麦克阿瑟这个反共的“斗士”，为了挽救朝鲜战场的败局，再次提出国民党军增援朝鲜问题。

12月30日，他从日本的东京再次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美国应就力所能及的范围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其中包括封锁中国海岸和从台湾国民党部队取得增援，进一步加强美

军在朝鲜的力量。随后，麦克阿瑟私下邀请国民党“战备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到东京会谈，继续策划利用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增援美军以及稳住朝鲜半岛的战争态势等问题。

1951年1月上旬，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将美军赶到“三八”线地区。

在此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9日给予麦克阿瑟如下答复：

报复性措施已作了慎重考虑并将继续予以考虑，采取这些措施必然考虑多种利害关系，但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从国民党在福摩萨的守卫部队中取得增援朝鲜的兵力，这是由于考虑到他们不可能对朝鲜的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倒很可能有较大的用处。目前，应首先坚守现有阵地并重创中共军队。

远在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接到这个答复后，对着身边的人员气恼地说：“这就是五角大楼的阁员们费尽心机做出的杰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麦克阿瑟对大洋彼岸的五角大楼充满鄙视，但是对于他们的指示还是不能不去执行。1月下旬，美军开始实施全面的反击。2月11日，他拟定了一个彻底消灭志愿军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提出：如果我获准使用国民党中国军队，那么由于他们的增援，同时美国的增援部队也即将开到，我将在北朝鲜北端东西两岸同时进行两栖登陆和空降登陆，从而就扣紧了一张巨大的罗网，这样中国人不久就会挨饿，否则投降。没有粮食和弹药，他们就会变得毫无办法了。这种景象有点像仁川，但规模要大得多……

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海岸，调动台湾的第52军增强在朝鲜战场的联合国军。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美军来保卫日本……

麦克阿瑟这份振振有词的电报依然遭到了华府的断然拒绝。麦克阿瑟对此彻底失望了，也彻底恼怒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朝鲜半岛的战争将是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当然不想以朝鲜半岛战争的失败来结束他“最勇敢无畏”戎马生涯。因此，麦克阿瑟开始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样子，不仅对杜鲁门关于“禁止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用现有的

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禁止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的命令置若罔闻，反而分别向美国的著名民主人士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并进而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攻击杜鲁门的政策，特别是先后发表3月20日给马丁的信和3月24日的声明，使杜鲁门极为恼怒，于是在4月9日杜鲁门以发表总统广播讲话的形式，出其不意又干净利落地下令将麦克阿瑟撤职，由麦克阿瑟的学生、陆军参谋长助理李奇微接替其职务。

麦克阿瑟被解职，这是麦克阿瑟长达52年军旅生涯的重大打击，但他在辞职演讲中仍然高傲地说：“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慢慢地凋零。”

到了1952年4月，随着美军远东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往欧洲，遗职由美军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克拉克的继任，又刮出一阵“调第52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声。

原来，5月中旬，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国内自卫队的7.5万名警察外，竟无美国的地面部队，他感到非常吃惊，于是，这位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遂再次向五角大楼和华盛顿提出要蒋介石提供两个师的部队入朝接替美军的防务，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3个师的美军去防守日本。此时的蒋介石心里清楚，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难以实现。

这一天，蒋介石以为机会终于来了。

1952年11月5日，杜鲁门下台了，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他在正式就职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在12月2日至5日秘密视察了朝鲜战场，旨在兑现竞选总统时的允诺，并力求使新政府和五角大楼达成共识，早日全面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视察后，明确表态：“新政府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反对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化。因为，理所当然也反对蒋介石的军队介入朝鲜战争。”

至此，蒋介石三次企图出兵朝鲜战争的预谋才算彻底破灭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五千多年了。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一书还要早，这是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举世周知，我国史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部《二十四史》就有3219卷，4500多万字，加上数不清的私史、野史、杂史和各种史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卷帙浩瀚、博大精深的史书？建造这样一座蕴藏丰富的历史宝库，正是历代史家辛勤劳动的结果。

然而，当人们在这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中吸取丰富营养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世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遭受了多少厄难？！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

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瘴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篋，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史官的厄难

□ 刘野

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瘴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载有秦赵二主鼓瑟

击缶的故事，很有意思。在“完璧归赵”以后，秦王怀恨在心，连续两次伐赵，杀了两万多人，然后又要与赵国和好，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趁机羞辱赵王，便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以牙还牙，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以相娱乐。”秦王怒，相如进缶跪请。秦王仍然不肯击缶，相如便威胁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立刻要赵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样，我为你鼓瑟，你为我击缶，双方就扯平了。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

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二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歪曲历史的暴虐者，他们生前的万般风光是以死后接受历史的审判为代价的；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他们生时遭受的厄难却常常获得历史赐予的花环。

“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传为美谈的两个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两位先驱者。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净，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左传·宣公二年》载有这段故事。于是，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有人提出问题，董狐之“书法不隐”固然值得称赞，但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

刘知几说：“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

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史通·直书言》）

按照刘知几的说法，董狐擅名今古，有赵盾成其良直，是为于可为之时。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凶多吉少了，这似乎有点道理。史官的直书其事，确实需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客观环境和让人说话的条件。不过，尊重客观事实，直书其事，是史官的责任。在“不可为之时”，是不是就不为了呢？

齐之南史，就是在“不可为之时”而为之的怕死的史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杼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杼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杼弑其君”。崔杼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杼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杼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太史“身膏斧钺”的事迹，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有了董狐、南史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真正秉笔直书的史官并不多见。因为任何一个帝王，即使是极英明的帝王，也不会喜欢像董狐、南史这样的史官，不会允许史官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记录在案，传之后代。他们手中的权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为，决定史官的命运。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蹇，就像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然而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

三

在史官的厄难史上，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

司马迁。

司马迁是董狐、南史这类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厄运的磨难。司马迁的时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样的汉家盛世，司马迁却因为替人说了几句好话，便蒙受一场千古冤狱，遭受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历时十余载发愤著书，写出了涵盖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鸿篇巨著《史记》，可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史记》却被视为“谤书”。现实对司马迁是不公正的，历史却对司马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刘向、杨雄称司马迁为史之良才，鲁迅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终于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一心要写一部继孔子《春秋》之后记录“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写《史记》，不幸到了公元前98年，写到第七年的时候，一场大祸突然落在他的身上。

当时，在与北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大将李陵奉命率领五千步兵出击，直捣匈奴单于的大本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匈奴方面增加八万多骑兵将李陵部队包围，李陵在没有援兵、孤军奋战、矢尽弦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满朝官员都指责李陵辱国。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意见时，司马迁直抒己见，认为李陵转战千里，英勇奋战，实在是因为敌强我弱，后无援兵，不得已才暂时降敌，相信他会寻找机会再立一份与其失败相当的功劳来报效朝廷。退一步说，即使他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干成，那么以前他的赫赫战功也足以抵罪了。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以为他是“诬罔主上”，下令将他关进监狱治罪。第二年，谣传李陵帮助匈奴练兵以对付汉军，汉武帝信以为真，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处死，司马迁也被判为死刑。汉朝的法律规定，死刑可以出七赎罪或者改为宫刑。司马迁两袖清风，没有钱赎罪，但他要活下去，只好接受残酷的宫刑。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他所遭受的宫刑，不仅使肉体蒙受了巨大痛苦，也

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耻辱。由于宫刑是对人体那个神秘敏感的器官施刑，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看待的酷刑，所以受宫刑也就因其人格受辱而为人们所不齿。何况司马迁是为了活命而主动请求改为宫刑的，这就更加遭到当时很多人的鄙视和辱骂。然而那些看风驶舵、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们哪里知道，司马迁是为了完成一部恢宏的历史著作，为了实现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才忍辱负重的？这是司马迁心灵上一种难言的隐痛。

司马迁的受辱，本来就是一桩冤案，可是当这个冤案永远也无法平反的时候，他心里该蒙受多大的委屈和痛苦呢？当年，司马迁为李陵辨诬，如果说这只是一时蒙冤，日后还有希望说清楚的话，那么随着人们的推波助澜，司马迁蒙受的已经是不白之冤了。因为无论如何，到后来李陵毕竟是“投降”了。这个“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辨诬是“错”的。可是，李陵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投降”的呢？李陵被俘后，汉武帝立刻把他的全家下了狱，在听到传言说是李陵为匈奴训练部队时，又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李陵全家通通杀光。到后来查清为匈奴训练部队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时，已经被杀的人还能再活吗？直到这时李陵才深感汉武帝刻薄寡恩，一气之下“投降”了匈奴。从此，李陵留下了骂名，司马迁的冤案也就再也说不清楚了。这桩历史公案的罪人究竟是谁呢？

这种不白之冤和巨大耻辱将司马迁逼向了死亡的边缘。但是司马迁不能死，他发现了一个辉煌的“重如泰山”的人生目标，他决心以最大的隐忍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可是，隐忍比耻辱更加痛苦。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几乎每天都在痛断肝肠地想着这种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终于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当时关于“君子不生于大辱”的观念。他从历代前贤发愤著书的事例中汲取力量，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用同一段话来激励自己。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

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身上，中国史官的坚毅精神又一次大放异彩。

不错，司马迁的厄难，不是因为秉笔直书，而是由于忠言直谏；不是导源于著作《史记》，而是起因于李陵事件。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是忠言直谏的净臣；李陵事件的因果，磨砺了一个史官的人格。司马迁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蒙冤受辱之后把一切灾难、耻辱、痛苦和困厄转化为发愤、抗争、信心和力量，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他所面临的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这样，他的人格和精神就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升华，《史记》的主题和内容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司马迁的心灵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在他的人格经受巨大考验之后，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诞生了。

四

司马迁去世 500 年以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 450 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在史官的厄难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崔浩，字伯渊，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 429 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后来，太武帝又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务。但是，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了。崔浩被杀的原因就是：“实录”。

在太武帝命崔浩修撰《国书》、综理史务的时候，他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话虽如此说，到了真正“实录”以后，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崔浩却是很认真的，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竟然有失检点，同意著作令史闵堪和郗标的建议，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 130 步，让人们自由浏览。在这部史书中，崔浩实录了拓跋部的早期历史和入关前后的经历，甚至把拓跋人自己都秘而不宣的事情也实录了下来。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

把本该忌讳的历史在显眼的地方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崔浩的“备而不典”究竟是什么呢？据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研究，崔浩的《国书》实录了前秦苻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拓跋氏祖先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国书》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圭。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媳妇。苻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圭当作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孙子变成了儿子，闹出了大笑话。其实，北魏拓跋氏皇室的婚姻关系并不像汉族人那样重视伦理秩序，公公娶儿媳妇的事本不足为奇。但是，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渐受汉族文化影响，乃讳言其事。崔浩撰写《国书》，要秉董狐、南史之笔，一一实录，结果招来杀身之祸。

崔浩死得很惨。临刑前，他“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号嗷嗷，闻于行路。”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据史家考证，这次杀戮共死了2000多人。难怪事隔300多年以后，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作为史臣一想到崔浩的《国书》血案，还心有余悸，感叹直笔太难（《答刘秀才论史书》）。

像这样的史学大案，在清朝还发生过一次，这就是清初牵连最广、杀戮最惨的“庄氏史案”。

顺治十八年，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双目失明的富户庄廷铨有感于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也想效法前贤，著书立说，正好他的邻居家中藏有一部明代天启年间做过内阁大学士的朱国桢草拟的明史稿本，他的父亲庄允诚便用1000两银子买下来作为儿子著书立说之用。庄廷铨招募宾客，在朱国桢原稿基础上，增补内容，润色文字，编成《明史辑略》一书。庄廷铨不久去世，其父为实现亡子遗愿，决定刻印此书，同时又聘请了十多位名人参与校

阅，以示重视，由于朱国桢的原稿在明亡后颇多犯忌之处，满清皇朝得到此书如临大敌，严加惩处。庄氏一家被满门抄斩，已经死了的也被掘墓戮尸。除此以外，凡是与此书有涉的人，包括作序者、校阅者、资助者，就连刻字、印书、卖书、买书、藏书、读此书者都一并处死，有人根据祸及700家的记载推算，认为被杀掉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

清初诗人陈恭尹有诗云：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

可怜庄氏并非史官，却也遭受到了史官的厄难。

五

应当说明的是，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能秉笔直书，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史官都会遭受厄难。

刘知几说：“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在刘知几那个时代，他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却如披沙拣金”，所以一再感叹“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史之不直，代有其书”。为什么？刘知几认为，追根究底是因为孔夫子在称赞董狐书法不隐的同时，又提出了“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谬论。刘知几指出：“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正，而名教存焉。”

有了“子为父隐”的伦理观念，有了“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君亲讳”的道德标准，那些曲笔阿时的利禄之徒就有了歪曲历史的理论根据。他们或者“舞词弄札，饰非文过”；或者“由首臆说，威福行于笔端”；或者“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诬人之恶，持报已仇”。刘知几认为这些人都是“记言之奸贼，载事之凶人”。应当“肆诸市朝，投畀豺虎”。

对于曲笔阿时者，刘知几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们还说什么呢？

（责任编辑 程 度）

黄梅戏著名演员 严凤英之死

□ 柏能驹

32年前，1968年4月8日清晨，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含冤而逝。她还没有度完第三十八个春天，就惨死在安徽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病房里。噩耗传出，即使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下，各界人士也都义愤填膺，纷纷以各种方式向高喊“继续革命”的所谓“红色政权”提出询问。他们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为了显示他们的革命性，硬将“黄梅戏”改名为“红梅戏”）的代理人回答得倒也干脆：“畏罪自杀”，而且还要加一句：“死有余辜”。严凤英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自杀”？真的是“死有余辜”吗？当时成了一个谜。

十年之后，1978年8月21日，重建的安徽省文化局虽然为严凤英召开了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在当时有些问题还是很难说得清楚。今年是严凤英诞辰七十周年，作为她的朋友和“同案犯”，我以为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严凤英之死的前因后果如实写出来。

严凤英，祖籍历史名城桐城罗家岭，1930年4月19日诞生于安庆市。她家境贫寒，幼年失学，回到故里，生活更为艰辛，后来学戏唱戏也是备受凌辱。1953年她经朋友们的举荐，参加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很快成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黄梅戏艺术家。她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共产党，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她主演的《天仙配》、《女附马》和《打猪草》、《闹花灯》等剧在五十年代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黄梅戏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安徽走向全国，由海内传到海外，完成“三级跳”

的历史性大发展，严凤英是主要的开拓者之一和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上山下乡，深入工厂、连队，为工农兵演出，她总是走在前列，而且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排演现代戏，歌颂英雄人物，她更是争先而上；努力拓宽和充实黄梅戏演出剧目，认真继承、大胆革新和丰富黄梅戏唱腔艺术。她在旧社会唱了几年戏，但她没有旧艺人的不良习气；她是名演员，却保持着平常人的心态。她绝没有想到，当她一心一意遵循党的教导，一言一行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之际，厄运竟向她迎面扑来。

“文革”初期，她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文批武斗”的折磨，甚至她在旧社会被侮辱被伤害的悲惨命运也被翻将出来，当着她亲人的面，在群众大会上当作罪状，肆意进行攻击。具有大家风范而又耿直、倔强的严凤英怎么也想不通：为群众演戏有罪，受到群众欢迎也有罪？在旧社会受压迫有罪，在新社会要求进步也有罪？而且硬要她承认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她当然不承认，结果遭到加倍的打击。1968年3月，严凤英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这在当时是死罪，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是她的解释当权者根本不听。因为当“文革”进入第三年，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这就需要再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严凤英和一大批民族精英一样，也就在劫难逃了。



严凤英

严凤英本来和什么“革命样板戏”毫无关系。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北京举行。安徽没有剧目参演，只派出一个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七人观摩小组。当时，我在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工作，因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很想到北京看戏，副局长江枫表示同意，说换个环境也好。他告诉我，省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严凤英、王少舫和省庐剧团主要演员鲍志远也想去观摩，要我们一道去，并要我负责安排好。特别要我关照严、王二位，不要出任何差错。我们到了北京，会演第一轮演出已经结束。会演大会秘书长、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要我们另找旅馆住，不要参加观摩组活动。第二天晚上，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要我转告安徽同志，认真看戏，不要乱发议论，实际上是打招呼。出于好奇，听说陈毅副总理招待马里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智取威虎山》，我们想方设法搞到几张票去看个究竟。当时剧中人少剑波由著名老生纪玉良扮演，杨子荣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在看戏过程中，我们议论过“纪玉良迈着八字步，不像解放军指挥员”，“李仲林演得像武松”，“纪玉良是票友出身，没有功底，跑圆场不

行”，“戏有点松”等，既没有涉及到那场争论，更没有提到“江青”两个字。看完戏我们就一道回到大栅栏附近一家叫做春林旅社的小旅馆，如此而已。不久，严凤英、王少舫因为排戏先回合肥了，我于7月1日听了彭真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也就回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次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却成了一件大事，竟然成为一项“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

1968年初春，从北京掀起的所谓“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的黑风恶浪，很快涉及到合肥。于是当年安徽省观摩组和我们一行等人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而严凤英则是重中之重。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红安徽报》（安徽两大造反派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机关报”）一位汪××找到我家，要我交待这段情况。我一再向他说明，我们四人到京后，围绕《智取威虎山》一剧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内情。我还带汪××到当年观摩组成员、安徽剧团副团长刁均宁家里，刁均宁首先承认是他在小组讨论会上对《智取威虎山》在艺术处理上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与其他人无关。“他们（指我们四人）是后来去的，更没有关联。”在当时情况下，刁均宁敢于如此实话实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以为事情已经澄清了，没有想到4月5日出版的《红安徽报》，由汪××等执笔写的“社论”中竟然置事实于不顾，信口胡说“1965年，以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什么‘代表团’，伙同戏剧界的牛鬼蛇神严凤英等丑类，在北京疯狂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这段文字可以作为“文革”时期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横加罪责的代表之作：一，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它任意写为1965年；二，安徽的“观摩组”也变成了“代表团”；三，个别人对戏的艺术处理在讨论会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成了“疯狂围攻”；四，严凤英和我们是后去的，另住一地，她根本没有和观摩组徐味等人见面，如何“伙同”？如何“围攻”？又如何成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

命事件”？

这期《红安徽报》出版的第二天（4月6日），团外团内的造反派“提审”严凤英和王少舫，“勒令”他们认罪，严凤英据理反驳。造反派把她押到二楼走廊，那里新贴了一张王少舫在造反派逼迫和授意下写的大字报，说严凤英看了《智取威虎山》，说“不照”，还说纪玉良圆场都跑不好……并且说他和严凤英没看完，中途就退场了。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造反派想要获取的“要害”材料。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王少舫施压，一方面勒令严凤英着重揭发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安徽省“代表团”徐味等如何指使他们反对“京剧革命”的。严凤英知道是想通过她，打开缺口揪出省委一大批人来。她无从说起，造反派就不许她回家吃饭。僵持到晚饭后，因为是星期六，他们也想回家休息，便叫她回家写材料，星期一上午交，否则后果自负！她回家后怎么也想不通。7日晚，她找出当时的演出本，发现少剑波跑圆场只有一处，即小分队上山，戏已到最后一场了，怎么可能“中途退场”？便冒着“串供”的风险到我家来。（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一幢楼的东西两侧）。我说，该说的都说了，他们硬说我们是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甚至是省委派去的，追问给了我们什么指示，这显然是另有目的，只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将来总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时在我家的省文化局同志刘国琨、完艺舟、童兴德等人也劝慰她说，现在讲不清楚，将来定案还是凭证据的，有那么多人，还怕讲不清楚吗？我还说江枫同志叫我和你们（指严凤英和少舫）同出同进，我记得我是看完了的，看来看完没看完不是关键，关键是挖“后台”。她一听明白了，坐了一会就走了，在门口她对我爱人李琦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后来据王冠亚告诉我，严凤英回家之后对他说了这些情形后，说：“不写了（指交待材料），明天还是照实说，看他们怎么办？”严凤英患过卵巢囊肿，手术后有肠粘连等后遗症，又患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疼得晚上睡不着。那天夜里，她又呻吟起来，王冠亚以为她又痛起来了，要给

她按摩。她噙着眼泪说，不用了，你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王冠亚感到不妙，立即起床跑到桌前，看到严凤英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内容说自己有缺点错误，革命小将批斗她，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所以她拥护；后面还写着“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王冠亚大惊，顾不得看另一封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只求速死。王冠亚叫起两个孩子（大的十四岁，小的十岁），叫大孩子速找大院省文化局医务室的医生，她们很快就来了。王冠亚主张送医院，这时医院也都在闹文化大革命，只有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忙去找一位军代表求救，请他打电话给部队医院，并把严凤英给全团“革命同志”的信交给了这个军代表，军代表叫王冠亚先回去。过了一会，他带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他们在房内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怒斥“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王冠亚求他们赶快送医院抢救，他们置之不理，对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严凤英，轮番念《语录》，骂大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可怜的严凤英这时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泪流满面，直到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这伙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者”发现情况有变，才扬长而去。王冠亚去找板车，造反派就是不借！王冠亚又跑到同院的徽剧团，找一个舞美师傅借板车，这位师傅起床披衣推出板车。王冠亚拖着板车跑回家，这时严凤英已神志不清了！王冠亚抱起严凤英下三楼，当时有一位徽剧团的青年演员主动上前帮忙。事后王冠亚对人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徽剧团的这两位大恩人！

王冠亚和两个儿子拉着板车跑向医院，一个小解放军，一个造反派跟在后面。挂了号，送进急诊室，因是“现行反革命自杀叛党”，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拒绝接收（“文革”初期，中宣部文艺处长、著名诗人袁水拍不堪受辱，愤然服药自杀，幸被家人发现，送北京医院抢救。因系“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下作反

面教员”，才被抢救过来。这说明那个年代，没有组织出面，哪个医院也不敢接收的)。王冠亚呼救无门，又不能离开严凤英一步，大儿子王小亚跑步回剧团，叫起那个军代表，军代表找来了“大联委”头头，开了介绍信，王小亚跑回医院，医生检查后叫送住院部！门诊部在市中心，住院部在郊区，又要找救护车。到了住院部，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王冠亚央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病床。护士长悄悄说：“等他们走了(指造反派)，再给她换”。造反派走后，护士长找来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王冠亚求他们洗胃，他们态度很好，讲不行再说。这时旁边有一位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袖章在扫厕所。王冠亚上前求他帮忙，他讲：“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这两位年轻值班医生抢救很辛苦，满头大汗，但不见效。王冠亚求他们让那个戴袖章的老医生来救救！他们不敢做主，一位年轻医生下楼找办法抢救。等他赶回来，严凤英已停止了呼吸！时年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她只活了三十八岁。“文化大革命”终于使一代骄子含冤含恨而去。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自己尊严；她用自己的热血控拆了“文革”的极左路线！只是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严凤英惨死在急救室里，那位军代表和一些造反战士仍不放过。他们当时大权在握，不乏掩盖自己罪责之术：一是散布严凤英是“畏罪自杀”，开会声讨，利用手中报刊造谣中伤；二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谎言，嫁祸于人，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为自己开脱。首先他们想嫁祸王少舫，硬说是他的大字报促使了严凤英的自杀，他们忘了王少舫的大字报正是在他们逼迫下写的。其实他们对严凤英是“定罪在前”(有《红安徽报》社论为证)，有没有那张大字报都不会影响他们要“彻底打倒”严凤英的“既定方针”。其次他们想嫁祸王冠亚，硬说是他贻误了抢救时间。但是当时由于医院对“牛鬼蛇神”看病作了规定，抢救也要找领导“出面”，而头头来了，却又在床前批斗严凤英半个多小时，究竟是谁贻误了抢救时间，不是明摆着吗？最后他们还想嫁祸值班医师，说他们没有经

验造成死亡。床前批斗失去了半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是他们没有临床经验，还是你们没有起码的人性？严凤英生前好友、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在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告诉我一件事：那位军代表看着被开膛剖腹的严凤英无动于衷，还对众人说了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是流着泪对我说的。当时我真想见见这位把人命当草芥，“继续革命”的“革命者”，遗憾的是他早已被保护性地调到外省去了。从医院将严凤英拉到火葬场，用的板车也是王冠亚从一位老红军家里借的。严凤英的艺友查瑞和与胡根杰要帮王冠亚拉板车去火葬场，那个军代表还警告他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们说，人已经死了，他家只有两个小孩，叫他怎么办？军代表只好作罢。王冠亚回到家里，看到桌上严凤英写的另一封信，信中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她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她说，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另外希望他带好两个孩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又叫孩子听爸爸的话，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严凤英死后，那个军代表不失时机地召开全团的声讨大会，批判严凤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白林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立即被那个军代表申斥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同时那个军代表又派造反派到王冠亚家把第二封信也抄走了。“文革”后，为了落实严凤英的政策，专案组专程去找那个军代表，问他为何迫害严凤英？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是的，他们是奉命行事，御用工具罢了

事实证明，和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民族精英一样，是“文革”这场浩劫夺走了严凤英的生命，严凤英之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这场浩劫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去铲除孕育“文革”的种种根源，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能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程 度)

友谊关谈史

□ 孟凡夏 刘振贵

友谊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的凭祥市边境。它始建于汉代，初名雍鸡关，后改名界首关、大南关，明初置镇南关，1953年更名睦南关，1965年更用今名。

友谊关是我国现存古代关隘中的九大名关之一。九大名关指嘉峪关、山海关、剑门关、娘子关、雁门关、居庸关、紫荆关、平型关和友谊关。当地民间对友谊关美称为“南关第一关”，或简称为“南关”。它是我国由陆路通往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南大门。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曾多次进出友谊关。不过那个年代国内政治形势因“四人帮”干扰，风云莫测，我们也无心观瞻。前不久，应邀去广西参加一个会议，才抽暇到友谊关游览，一睹雄关面貌，了却多年心愿。有凭祥市“活字典”之称的市志办公室主任李若檀先生，热情陪我们作南关之游。李先生通古博今，对友谊关的过去和现在了若指掌。在他的引导下，我们先来到关前的广场上。广场开阔，阳光普照，国旗招展；有三层楼的雄关，巍峨雄伟，宏丽壮观；拱形关门上方，是陈毅元帅题写的、镌刻在莹白大理石上的“友谊关”关名横扁。登上关楼远眺，周围层峦叠嶂，丰树茂林，云蒸霞蔚，气象万千。322国道经关下到关前零公里的中越边界线终止。边界线那边，便是越南一号公路的起点。关楼两面，左弼、右辅两座山，如两支铁臂，向东西方向延伸开去。西面的金鸡山拔地而起，镇北、镇中、镇南三座炮台，雄踞在这座山的三个峰顶上，居高临下，气势威严。更有伏波山，大、小青山，白云山，孙明山拱卫左右和后方，山上几十座炮台相互呼应。真是：万山环障一门通，据险筑关气势雄。两辅凌空如虎踞，群峰拔地似蟠龙（广西师大张一民教授作）。

李若檀先生说，友谊关岂只是山险关严，在关前关后，还散布着许多令人感叹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友谊关是古今许多重大历史和中外交往的见证，是一部中华民族抵御内忧外患的史书，也是一座露天的古军事博物馆。

关前隘中法之战

“这是关前隘中法战争的战场”，李先生指着关下一块小盆地。原来，清代末年统治者腐败无能，国势衰微，列强侵袭。法国也依仗它的坚船利兵，乘机侵入中国的邻邦越南。当时的越南封建王朝政府，两次遣使来中国要求增加援助力度，帮助他们抗法。清政府上层官僚在要不要援越抗法问题上分为战和两派，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举棋不定，以致“战议不坚”，造成了当时驻守在越南北部的清军节节溃败，

不战而逃。法国侵略军得寸进尺，进而袭扰中国领土。1885年2月23日，法国侵略军攻占了镇南关以及关旁不少阵地，声言他们要在印度支那和中国的滇、桂、川这块相连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东方法兰西大帝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才不得不起用落魄在家、年已七旬的爱国将领冯子材为军务帮办，领兵抗法。当时的广西提督苏元春，也是一腔报国之志，他不以自己官位比冯子材高而傲慢自居，而是以国家存亡大局为重，推举冯子材为前敌主帅，自己主动与冯配合协作，率兵作战。关前隘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关前隘这个地方，并不在关前，而是在关后，也就是在关之北，距中越边界线5公里的中国领土的一侧。它两面高山，夹着一条狭谷，狭谷南端隘口处，是一小片群山围绕的开阔地。开阔地之南，有一排小石山，好像一扇栅门，与镇南关的官道相通。法军如经此路穿过小石山，进入开阔地，他们的枪炮就难以发挥作用，而我方正好“关门打狗”，可以发挥长矛和大刀的威力，让侵略者有去无还。战前，冯子材和苏元春调集了十多个营的兵力，又组织了一支由当地村民

蒙大率领的敢死队，一起埋伏在数千个突击挖好的梅花坑里和深草茂林中。1885年3月23日，在我边境连连得手的法国侵略军3千多人，另有三个炮队，在主将尼格里的亲自指挥下，倾巢而出，大摇大摆地经官道和石山之间的道路通过“栅门”，直扑关前隘开阔地。他们以为此次又像以前那样，可以不费力的取胜。实际上，他们如同瞎子一样，进入了中国军民为他们准备好的“口袋”，冯子材先让他们在“口袋”里瞎打了一阵，打得阵地前弹飞如雨、炮声震天。等他们耗尽了弹药、食品和精力，冯子材一声令下，军民们一起从梅花坑和树丛中跳出来，冲入敌阵，与敌开展肉搏战。我军士气大振，战场上只见刀砍矛棚，敌首纷纷落地。直杀得敌军落花流水，横尸遍野，活着的抱头逃窜。这一场大战，杀死敌军官63名，擒获两名，消灭敌兵2300多名，连尼格里也因受了重伤而毙命。军民们收复了镇南关和多处阵地，缴获了大量军械，保卫了南疆国土。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创造了中国军民用长矛大刀战胜用枪炮武装起来的侵略者的奇迹。法国侵略军的这次大败，导致了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

我们现在面对这个中国人民抗击外侮的战场，惟见树草萋萋，群山雄峙，风过树梢，沙沙作响，耳中似乎听到了百年前军民们同仇敌忾、威武雄壮的喊杀声。心中几多豪情，几多感叹！李先生说，抗法战争胜利后，苏元春在此经营多年，修复了被法国侵略军毁坏了的镇南关关楼，增建了几十座炮台，金鸡山上的炮台，也是那时所建。另外还增建了大连城边防指挥中心，平公岭地下营垒等许多边防工程，今天所见的这些军事设施，大多是当时所建。这些设施在今天虽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要求，但它们却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文物。

孙中山和镇南关起义

友谊关关楼的第二层，是关史陈列室。其中以相当大的面积，用历史文物和图片，介绍了孙中山先生领导镇南关起义的史实。

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孙中山先生一生出生入死，奔走呼号，唤起民众，推翻腐败无能、祸



作者在友谊关前

国殃民的清朝统治。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他亲自领导了镇南关起义。这年年初，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党人，到越南河内策划这一义举。他们几次秘密潜至镇南关附近中国一侧进行调查，并到一个叫做渠历的山洞（后人将这个洞称做中山岩）里开会，研究起义步骤。他们的计划是武装起义，占领镇南关，再攻向南宁及两广，然后向北直捣清廷。方案制订后，孙中山派起义骨干黄明堂等人到凭祥发动群众，一大批热血青年志愿参与起义，连当地的土司李佑卿和守关清兵头领都积极响应。

光绪三十三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1907年12月1日）深夜，由孙中山委派的镇南关都督黄明堂、镇南军司令冯祥、副司令李佑卿、支队长何伍等率领革命军一百多人，身佩短枪、马刀等武器，抄小路从越南境内出发，经镇南关到达金鸡山下埋伏下来，二十七日凌晨，革命军登山袭击金鸡山的三座炮台。首先翻墙进入镇北炮台，守台清军立即响应起义，接着向镇南、镇中两炮台发起进攻，到二十七日下午，三座炮台全为革命军占领，控制了制高点，镇南关和关前关后，全都在三炮台炮口的控制之下。

革命军控制三炮台后，附近农民纷纷前来投军，参与起义的人员一下子发展到500余人。孙中山先生得到捷报，立即赶到金鸡山炮台，巡视阵地，鼓励将士，他在山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感谢大家奋勇举旗起义，我们要同全国同胞一起，把满清皇帝及民贼推翻，建立富强的共和国，让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的主人，享受独立自主的幸福……大家一起奋斗，把革命革成功！”

镇南关起义，使清廷大惊失色，很快调动20多个营的兵力，围攻金鸡山三炮台。正在山上的孙中山先生亲自指挥起义军向清军回击。这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惟一亲自参加和指挥的一场战斗。有一发清军的炮弹打上山来，炸伤了一名士兵，孙先生亲自为伤员包扎，并派人将他送下山去。战斗紧张时，孙先生还亲自指挥，向清军发炮轰击。他对大家说：“反对清政府20余年，今日始得发炮击清军耳！”

为纪念这次战役，孙中山先生还豪情满怀

地赋诗一首，《镇南关之役马上吟》：

感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征马中。

漠漠东南云万叠，铁鞭叱咤厉天风。

清廷调来近万兵力围攻金鸡山炮台，起义军寡不敌众，加上经越南转运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被法国占领军扣留。为保存实力，起义军主动撤退，摸黑由山间小路进入越南境内。孙中山对大家说，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镇南关三座炮台，数百人与清军奋战七、八天，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

镇南关起义，虽然未能达到原来预定的目的，但却震撼和动摇了清廷统治，激励和鼓舞了无数革命者。从此，革命起义不断，仅4年之后，1911年的武昌起义，终于使清王朝覆灭！

班夫人的故事

友谊关周围，不仅遍布各种固境保民的军事设施的遗迹，还流传着许多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们就在关下听到了爱国将领冯子材的故事和苏元春的故事、抗法英雄蒙大的故事、王老虎“虎克羊”（洋）的故事、杨玉科为国捐躯的故事，凌炳杰大义灭亲收拾汉奸父亲的故事……一个个故事，将边民们对抵抗外侮的英雄们崇敬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其中最动人的要算是班夫人的故事了。

传说班夫人是一位没有出嫁的壮族姑娘，她姓班名都娟，汉代人。那时交趾郡有人反叛，叛军打到雍鸡关一带，危害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班都娟所在的班村也深受其害。朝廷派伏波将军马援率大军前来平叛，可是，由于行军太急，粮草一时接济不上，大军无法继续前往，驻扎在班村一带。班都娟知道了这一情况，串连了村里的许多姑娘，捐出了自己的“姑娘粮”。那时壮族有一种习俗：女孩子到了十来岁，家庭就要给她们分“姑娘粮”，以便出嫁时置办陪嫁品，姑娘们总共献出“姑娘粮”三百担。在班都娟和姑娘们的带动下，村民们又向大军出售粮食一千担。这些粮食救了大军一时之急。马援向班姑娘表示感激。班都娟说，我们不要感激，只希望大军早日获胜，干戈平息，保国安民。

在百姓们的支援下，大军开上了前线，攻克了被叛军占领的雍鸡关。然而，从北方来的士兵，在南疆水土不服，许多人病倒了。班都娟听说，连忙背了许多土药到军营，很快治好了士兵的疾病，不日大军扫平叛乱，活捉了贼首，使南疆恢复了和平与安宁。

班都娟在这场战争中立了大功，伏波将军马援要奖励她，她坚决不受。后来，马援将班都娟的功绩禀告皇帝，皇帝说，想不到南疆竟有如此美德的巾帼！于是封班都娟为太尉一品夫人。此后，这一带人都尊称班都娟为班夫人。千百年来，人们崇敬班夫人，在友谊关周围的凭祥、龙州、崇善等地，立了多处纪念班夫人的祠、庙和墓，每到班夫人的生日，边民们纷纷前去烧香祭拜，求她保佑边民平安，五谷丰登，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友谊关下说友谊

在古代，友谊关曾经有过许多名字。其中的“镇南关”关名，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阶层一种蔑视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3年，中国就将关名改称为“睦南关”，12年之后的1965年，又更关名为友谊关，充分反映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邻邦睦邻友好的美好情意。

已故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曾引用古诗称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以笔者的看法，中国与南边的越南等邻国，可说是“群山绾结”的兄弟。站在友谊关关楼的五星红旗下举目远望，不远处便是边界那边的越南金星红旗，越南国土上来往的车队，成片的香蕉林和村村寨寨，都历历在目。从历史上看，两国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友好相处的。中越两国曾共同抗击过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曾一度将越南作为革命的基地；抗日战争时期，越南的爱国者也多次从中国出发，穿过边界回国抗日。正如胡志明主席说的那样，中越两国是“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关系。

这次重游友谊关，在从凭祥到友谊关的路上见到了一段三条轨道的铁路，甚感稀奇。李若

檀先生说，这是在援越抗美最关键的时刻，为不影响越南窄轨火车来往中越之间，运送兵力和军火，专门为他们修建的。

近些年来，两国边贸越来越红火。仅在友谊关的中国一侧就出现了浦寨、弄尧、平而、米七、渠历、油隘六个边贸点。李若檀先生特意陪伴我们去弄尧、浦寨两处边贸市场观光。弄尧是一条不很宽的山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镇南关起义，革命军将士就曾经弄尧到金鸡山。弄尧是早些年的一处边民自发形成的市场，越南边民靠肩挑手提和自行车携带，运一些土特产来这个市场，换一些中国日用品和工业品回去。因为沟深路窄，交通不便，这几年已不能满足两国边民贸易日益扩大的需要，凭祥市人民政府又特地在地面开阔、交通方便的浦寨设立了规模宏大的边贸市场。那天我们于上午十点多钟到达浦寨边贸市场，在未进市场大门时，我们的车就被运货的大小卡车堵在门外，约半个小时左右才入场内。原来这里已建设起许多永久性的店面，形成了几条商业街，俨然一座商业城。市场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据说，来此经商的我国商人除西藏以外，哪个省区的人都有。这里的商品既有中国北方的苹果、鸭梨，也有华东、中南各地的空调器，电冰箱，服装，机械，化工业产品，台湾、香港的商品也不少。越南过来的则是农产品、工艺品、工业原料等商品。我们在一个专卖越南百货的商店买了几把国内少见的牛角梳和红木筷子作纪念。据凭祥市的一份调查报告介绍，凭祥市去年边贸进出口总额已达十多亿人民币。目前边贸已由传统的民间以物易物为主的方式，转为货币流通的贸易为主；经营者由单一的边民转向企业、公司、个体户的多层次的单位经营；交易商品除季节性互补的农副土特产品和日用工业品、小五金外，更增加了原料、电子产品、大型机械设备，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商品也已不断的增多，整个市场已由过去的地缘、亲友、民间信誉关系向现代国际贸易靠拢。

友谊关是巍峨雄伟的关隘，又是和平与友谊连接的金桥。

(责任编辑 方 徨)

二百里山川 五千年的书

——炎陵县巡礼

□ 魏亦青

炎陵县原名酃县，位于湖南东南边境。一个山川纵横二百里、人口不足 18 万的边远山区县，却因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而闻名遐迩。

城西 17 公里一个叫鹿原陂的地方，群山环抱，洙水绕流，中华农耕文化创始者的杰出代表炎帝神农氏就安葬这里。

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她崇拜祖先，崇拜为民族生存和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人。炎帝便是以炎黄子孙自谓的人们所崇敬的人文始祖之一。

炎帝的功绩及其葬地，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只能以口碑传世；周秦以前，即有祀五帝之说，炎帝为赤帝，主南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设茶陵县，茶者，“山谷生茶茗也”，陵者，即炎帝陵；晋代皇甫谧著《帝王世纪》，称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这里所说的长沙，指汉代以前的长沙郡、长沙郡国；宋代罗泌广泛收集古史和民间传说，并实地考察，著《路史》一书，详述炎帝安葬之地：“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之墓者”。

为纪念这位“天下共尊”、“民共仰之”的“文化英雄”，在鹿原陂这个地方，西汉时建炎帝庙，唐代继为奉祀，宋乾德五年（公元 967 年），宋太祖下诏，建殿立庙肖像而祀，“三岁一举，率以为常”。

炎帝陵历经沧桑，有史记载的大修葺 17 次，道光十七年（公元 1837 年）形成帝王陵殿格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炎帝陵殿为

“五进”。一进午门，正中有江泽民题写的“炎帝陵”汉白玉石碑；二进行礼亭，庑殿式，上悬周培源手书“中华始祖，光照人间”扁额；三进主殿，殿中厝放着炎帝神农氏的金身祀像。大殿门额高悬陈云题写的“炎黄子孙不忘始祖”的匾额；四进为墓碑亭，亭中立汉白玉墓碑，“炎帝神农氏之墓”为胡耀邦手书；亭后为墓冢。

炎帝神农氏的至尊地位，所以能跨越时空，世代不变，就是因为她是我国农耕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兴始和统一的象征，开拓、创新、奉献精神化身。

《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这是说他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太平御览》引用《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这又记下了他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发明了冶陶。

《帝王世纪》说，炎帝“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被尊为“先医”。当地的人们说，鹿原陂山顶上有终年不肯干涸的“洗药池”，陵西北 10 余里有“药湖”，峽阳岭上还有“尝药鼎”等等，这些说法固有附会之嫌，但世代相传炎帝走遍天下，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最后误食“断肠草”而亡，是应该信而不疑的。

《易经·系辞》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交易的产生，满足了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分工和技术进步。过去我只知“日中为市”之



炎帝陵

说，却不知在炎陵县赶场逢墟，相沿成俗。《炎陵志》引《二斋堂丛话》说，“鄙邑多墟。墟者虚也。商贾交易，朝实暮虚，殆日中为市遗风”。

肇始于炎黄的悠久文化，有比血缘更为强大的凝聚力。海内外炎黄子孙，魂牵梦绕的便是中华情。

1993年8月，国家体委和全国侨联举办“炎黄杯”世界华侨、华人龙舟系列赛，在炎帝陵和黄帝陵同时点燃圣火。人称“杂交水稻之父”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在炎帝陵区的圣火台上，庄严地点燃了手中的火炬。

80年代以来，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炎黄胄裔，远渡重洋，前来寻根问祖。素有尊崇炎帝之风的祖国宝岛台湾，岛内有140多家（一说四百余家）炎帝庙宇、堂所，供炎黄子孙祭拜。近八年来前来谒陵祭祖的台胞200余批万余人。其中多批专程前来为台湾新建神农大庙的炎帝

圣像开光分灵者，截止目前，已迎回炎帝神农金身祀像12尊。最早迎回的一尊“神农金身”安放台中县雾峰乡圣贤宫神农大庙的消息，一时轰动台湾岛，广大民众争先恐后前往接驾并敬“头香”。1995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台湾省第一任民选省长宋楚瑜率文武官员及民意代表至此，恭祝炎帝诞辰，祭文赞神农“光昭中华，为民造福”，“以农立国，名垂千古”，而后发感慨曰：“朝代变换，有兴有废，此其自然规律。五千年来，历史巨轮，不停推进。”海峡两岸文化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炎陵县不仅名胜古迹众多，也有多处革命遗址。土地革命时期，炎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来到炎陵县，在洙泉书院的左厢房内，研究部署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随后才有了两部在宁冈的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这便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人们却很少知道（或称很少注意到），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震撼20世纪中国的巨人的第一次见面地，是在炎陵县城东26公里的十都。毛泽东在县城南28公里的水口镇叶家祠，主持六名战士的入党宣誓，以亲自实践他的“把（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著名主张。在县城南50公里的中村，共产党领导了第一次土地改革在这里插牌分田。井冈山红军八大哨所，有两所在炎陵县与宁冈县交界处。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走遍了炎陵县的山山水水。县里的领导同志对我讲：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三万余炎陵人为求解放献出生命，血沃这方热土，演出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你能说其中没有五千多年前炎帝创业与献身精神的传承吗？

从炎帝时代直至今日，数千年的积淀，造就了这里的深厚的文化底蕴，请君能到炎陵来，这里的二百里山川，一沟一壑，一草一木，处处是歌，处处是诗，处处是浓缩了的中华文明史。

今年的九九重阳，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炎陵县人民政府将在这里联合主办龙年祭祖大典，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读史的机会。

“图文并茂”——老一代报人在根据地朝思暮想而不能及。

根据地人民当权，但技术落后，无制（铜）版技术。个别“大报”用麻纸印制，铅字排版，有些标题的大字还得用木头刻字。“小报”只能石印或油印。

抗日战争中后期，我在太行山根据地偶尔看到《晋察冀日报》登载过铜版照片，非常羡慕。晋察冀根据地离北平近，秘密工作好，通过地下渠道获得一些在当时说来是先进的技术，太行根据地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制版技术就用木刻代替。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区，号召力大，许多著名木刻家到太行区工作。罗工柳、彦涵、华山都在。党中央发表重要宣言，常常印发毛泽东主席木刻像。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号召

全民御侮，印发斯大林木刻像。斯大林头像庄严、威武、愤怒，出自名记者华山之手。华山当时主要作时事木刻，暇时才写文章，《鸡毛信》等是以后写的。

《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长期用木刻代替铜版，充分说明我们当时技术艰难。1946年5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想请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头。他在延安，我们在邯郸，云天阻隔，中间有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只好采用集字木刻的办法，集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写的字，然后木刻。取《共产党人》杂志的“人”，“为人民服务”的“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新中华报》的“报”，从右到左，合成“人民日报”四字。不能制版，只好木刻。

现在看1946年5月15日到1946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谁也不会认为那是集的毛泽东的字。〈一〉四个字，来自两种报刊、两条标语，气势难说顺畅、统一；〈二〉当时有的报纸已是从左到右排版，《人民日报》还是从右到左直排，为求统一，报头还是从右到左。这个多数人不满意的报头一直用到1946年6月30日。

1946年6月下旬，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从延安开会回到邯郸，带回毛泽东专为《人民日报》写的报头。由于不能制锌版，还是由老工人精心木刻。这个字型失真的报头，一直用到1948年6月14日。

石家庄解放，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及时撤销晋冀鲁豫、晋察冀两个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作为华北地区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撤销原两个中央局的机关报，组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请毛泽东重新题写《人民日报》的报头。这时中央所在地区平山能制锌版，听说毛泽东对这个锌版报头比较满意，一直用到现在。

抗日战争后期，《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尚未成立，此为太行根据地第一大报）开展了一个“通俗化运动”，探讨如何把报纸办得更“便利读者”，除了研究如何使文字更加通俗以外，对改进标题、版式下了较多功夫。当时报纸读者多为县、区干部，有中等文化水平就不错了，大家不习惯版面花花哨哨，都欢迎文字紧跟标题；一条新闻加标题拼成一个“豆腐块”；标题字不能过小过大，字型不能也无条件变异，绝对不能出现标题字歪放、倒置等异常

说报刊的「图文并茂」

□ 李庄

现象。这样的版式使人感到严肃、大方,活泼、变化却非常少。

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向青年同志说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据地,技术条件还曾这样艰难。我们应该十分珍惜今天的工作环境,不能因为追求“出奇致胜”而随心所欲。

现在我国报纸琳琅满目,编者日有创造,读者耳目常新,我这个退休报人也深受教益。我们长期向往“图文并茂”而不可得,现在报纸林林总总,令我目不暇接。当然,作为一个终生从事报纸工作的退休人员,对于某些现象也难免产生某种想法,有的是自己跟不上某种潮流,有的也难说没有一点道理。

总的说,“图文并茂”的问题解决了,好!有的报纸本是人们平常说的日报,却有向画报发展的趋势,走向另一极端。登载照片过多、过大,

令人感到“喧宾夺主”。当然,一幅新闻图片的作用有时超过一篇新闻;适当多登些图片,读者非常欢迎。

但凡事总有个限度,如果把日报办成画报,总不是正常现象。有的报纸登照片,报头像放得比拳头还大,尽管图中人是登龙的球星,或唱红大江南北的歌手,我总觉得有些过分。排版,有人故意把三行文字倒置,把一个标题分段、放歪,其效果不是为着读者便利,而是给人家添麻烦了。

“图文并茂”是为了提高宣传效果,为了美化版面,而不是给读者找麻烦,给读者添乱。我总认为报纸应该朴素大方,长短有序,便利读者,择精选刊。当然,这是我这个逾八老人的一家之言,就正于同好。

(责任编辑 程 度)

关于周作人研究的一封信

□ 舒 芜

《炎黄春秋》编辑部:

顷见贵刊2000年第6期上所载吴江先生《从胡适说到周作人》一文,对我殷殷见教,非常感谢,至请代达。但所教也有几点未能透彻领会,还想再请教一二。

吴先生文中,提了两个问题:

一、周作人研究,和为周作人翻案,二者是什么关系?

二、舒芜对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第一个问题,可能的答案有种种:可以说“研究不等于翻案”,也可以说“恰恰等于”,或者说“基本上等于”,或者说“客观上等于”,可以说“研究并不导致翻案”,也可以说“必然导致”,或者说“有可能导致”,可以说“研究与翻案并无联系”,也可以说“大有联系”,或者说“有一定联系”……如此等等,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几年来争论不休,今后还会争论下去。吴先生的主

张属于哪种,我对之看法如何,都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暂不详说。

第二个问题上,吴先生肯定舒芜并不是“也想翻周作人汉奸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吴先生的信任,我很感谢。但是,吴先生说“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对此,我只想请吴先生找一找拙著《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看一看其第一篇《概观》的第15和16两节,专论周作人从反对抗战到叛国附敌问题,最后是这样几句:

周作人自己将自己从英勇的战士和高雅的隐士的形象,变成这么丑而又丑的汉奸形象留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当然也就永远对国家民族欠下了这笔债,不是他自己的种种辩解和别人帮他辩解所能抵折的。

不知道吴先生觉得这是看轻了还是看重了?我作出这个断语之前,已举了周作人当汉奸

期间的种种罪行丑行，包括吴先生所举的周作人身着日本式军服检阅“青少年团”，随从汪精卫去庆贺伪满“建国”十周年，等等。其实，周作人这些罪行丑行，凡是谈得上从事周作人研究的，没有人不了解不熟悉的。因为，几部奠定研究基础的著作，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特别是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次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增订新版），都已经将这些罪行丑行一件一件一条一条开列在那里，这几年所有谈周作人罪行丑行的，包括吴先生所举，没有超出这几部书之外的。吴先生如果能找这些书来看看，当能看出，研究周作人者并非对这些一无所知，才研究周作人；也不是以为读者一无所知，可以替周作人掩护隐讳。

要为周作人翻案的，确实是有的，但并非出于研究周作人者。如1986年，即有一种新异之说，出自研究者之外，说是周作人当年出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是接受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策动，等于打进去做地下工作，而且他干得还可以，云云。1986年11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单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与会的研究者对此新异之说，大概都不轻信。我提出了长篇论文《历史本来是清楚的——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论证了周作人出任“督办”与所谓策动无关，论证了周作人当时干伪职很起劲，毫无“地下”气。前一方面不说。在后一方面的论证中，我没有着重周作人那些罪行丑行，因为持新异之说者已经说了：“如果出任，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这道理是说得通的。所以我着重论证周作人当时的生活和心态，干高级伪官干得津津有味，患得患失，活得安富尊荣，如鱼得水，特别是他在伪官场一度受到排挤，由“督办”改为闲官，他在日记里那样咬牙切齿，排挤他的人不久病死，他在日记里又那样大书特书，幸灾乐祸，“这哪里是清雅脱俗的知堂老人？这是老舍笔下的冠晓荷、蓝东阳一流人物了。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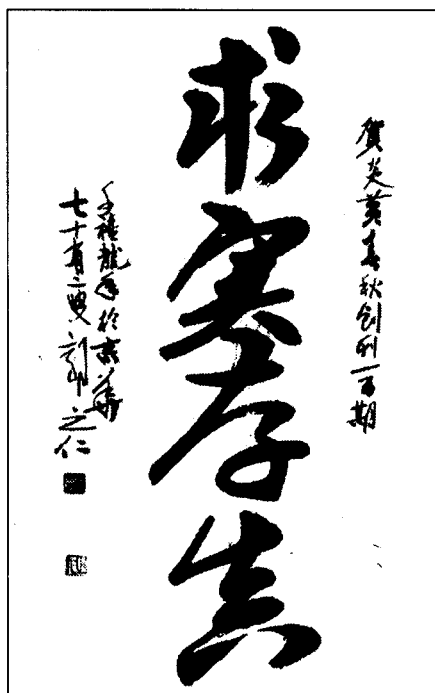
族大节一亏，就能堕落到这样的程度！”我这是以周作人本身上的“内证”，来证明他身上实在没有一点“地下”气味，才可以与持新异之说者针对辩论。此文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后因牵涉著作权问题，未能编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但最近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收入此文，希望得到吴先生的指教。

末了，关于我“把周作人与胡适相提并论”的问题，这里只简单说几句：我只是说，现在，谈胡适，已经可以不需要每谈一个具体问题，都得先说或者后说一番“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等等，这是好事，我完全赞成。那么，谈周作人也应该如此，现在我还是这样看。至于我对胡适的政治评价，与吴先生有同有异，这里且不详说。

以上略陈鄙见，愿借贵刊篇幅向吴江先生和广大读者求教。

专此布达，顺颂
编安

舒芜上 2000.6.7



我是贵刊一老友，期期阅读，受益匪浅，……对历史、特别是现代史的名人、大事作到求真存真，秉笔直书，很是不易。现呈拙作一幅，以表心意。

郭之仁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革命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炎 黄 春 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您若错过了邮局2000年期刊的征订日期，欲订《炎黄春秋》杂志，请直接
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4日出版，16开本，内文80页，60克双胶纸；彩封，157克铜版纸。每期售价4.80元人民币。

欢迎订购《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及近年合订本



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本刊编辑部组织力量，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

全套116.10元。另加书价的10%的挂号邮寄费，欲购请直接汇款。

(因存书不多，恕不拆套分卷出售)

请购1996年至1999年合订本

1996年合订本：

简装：49元； 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

简装：49元； 精装：54元

1998年合订本：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

简装：51元； 精装：56元

(一律挂号邮寄，不另加邮费)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
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电话：(010) 64072452 邮编：100007

题赠炎黄春秋杂志社

求实存真
言之有物

程思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程思远先生，在繁忙的国家公务之余，一直关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以及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不久前，研究会几位副会长前往程老寓所探望他时，他精神矍铄，热情问及研究会的工作。当谈到《炎黄春秋》时，他握着研究会副会长兼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的手说：“《炎黄春秋》我很喜欢。《炎黄春秋》求实存真，言之有物。”杜导正同志说：“谢谢程老的鼓励。”几天后，程老又应本社副社长宋文茂之请，题写“求实存真，言之有物”八个字赠炎黄春秋杂志社。

为纪念《炎黄春秋》出满百期，特将程思远副委员长的题词发表，以资庆贺。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袁庚

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忆良师益友胡耀邦

人民炮兵开创者朱瑞

中国第一个女导演王苹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

ISSN 1003-1170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581/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